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

北京大学哲学系
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室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试用教材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

北京大学哲学系
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室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201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70千字
1983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统一书号：2209·22 定价：1.20元

编者的话

本书是北京大学的试用教材，它是在我室给本系学生讲授《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内容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导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实际运用等四部分。在编写中，我们力求做到实事求是地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一些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表明了我们的一些看法。本书的章节安排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是适应某种体系的需要。书中对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未用专章进行阐述，这待有机会时再行增补。

本书是由宋一秀主编，教研室的同志集体写成的。各章执笔者如下：第一章：宋一秀；第二章：冯国瑞、王桂英；第三章：许全兴、陈葆华；第四章：张文儒、陈战难、陈葆华。其中，各章分担统稿的是：宋一秀（第一、二章）、许全兴（第三章）、张文儒（第四章）。最后，全书由宋一秀同志修改和定稿。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和材料不足，这本不成熟的教材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北京大学哲学系
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研室

一九八一年五月初稿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定稿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1）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1）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19）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43）
第二章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64）
第一节　实事求是……………………………………………（64）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88）
第三节　认识过程的辩证法…………………………………（104）
第四节　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23）
第五节　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131）
第三章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145）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145）
第二节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156）
第三节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170）
第四节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理论…………………（179）
第五节　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190）
第六节　肯定和否定的辩证法………………………………（202）
第七节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论………………………………（215）
第四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236）
第一节　军事学说中的辩证法………………………………（236）
第二节　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266）
第三节　党内团结的辩证法…………………………………（283）
第四节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辩证法………………………（302）
第五节　工作方法中的辩证法………………………………（315）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① 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但无论就它的内容和形式来说，都具有它自己的显著特点，这不仅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

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该时代经济政治的产物，是该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79页。

时代客观世界矛盾运动的反映。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①。因此，要准确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必须弄清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

在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的大地上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其中包括哲学思想），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现代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的发展出现了新特点，提出了新问题。世界历史的发展如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不平衡的。在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首先进入了资本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英、法、德等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加剧。无产阶级已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怎样使无产阶级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这是时代向革命者提出的一个伟大任务。

生活在这一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人类思想史上优秀成果，总结了当时英、法、德等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把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贡献给了无产阶级。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未最后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还处于准备时期。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成为一支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在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此时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是时代向当时的革命者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工人运动中心在西欧，西欧的无产阶级走在世界历史的最前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向东方，当时的俄国成为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是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成了革命的中心。列宁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领导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划分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十月革命大大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此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已不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列宁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寄于无限的希望。他说："东方觉醒之后，现代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①，又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②

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何进行革命呢？这是世界革命史上从未遇到的一个新课题。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有过许多论述，列宁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证实。

然而，东方的革命却是另一种类型。这个革命如何革法是没有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3页。

现成答案的。关于这一点，列宁曾对东方的共产党人说过："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① "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②

列宁和斯大林对这样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从未遇过的"困难而特殊"的崇高任务，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包括中国革命）是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如：关于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等等）。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地解决时代提出的这一新任务。这是因为，他们缺少解决这个任务的客观实践，他们不是生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是生活在无产阶级已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他们直接面临的不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而是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这个任务只能由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

为什么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这个时代提出的新任务呢？

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处于各种复杂而又激烈的矛盾之中，成为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

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③ 而中国又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大国。从鸦片战争起，特别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最激烈

①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04、10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4 页。

的一块肥肉。帝国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极为奇特的图画。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高潮必然到来时指出："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① 毛泽东进一步生动地指出，伴随着上述矛盾的发展，反动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反动政府与士兵之间、反动政府与青年学生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化。认识和把握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于怎样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到来。中国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燎原的烈火。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难道不正说明中国是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吗？难道当时东方国家中还有比中国更为集中、更为激烈和更为复杂的矛盾吗？没有了。

拿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就成了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来说吧！印度人民长期遭受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印度人民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他们也进行过多次起义和反抗，印度工人阶级的数量比中国还要多些，列宁也曾对印度的革命抱有很大的希望。但印度一直是英国一国的殖民地，不象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激烈争夺的对象。因此，印度不存在象中国境内存在着越来越激烈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不存在象中国那样整个中国几乎是所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生死搏斗的战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98页。

也不存在象中国境内各个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军阀之间一天比一天激烈的混战。印度社会的矛盾远不是象中国那样是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

十月革命后，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理想变为现实。时代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另一个重大新课题是，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如何建设新社会，亦即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此有一系列深刻的论述。但列宁在革命胜利后七年就去世了，他没有能来得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当然也就不可能完全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训，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后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斯大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事业。但由于实践经验的不足和其它的因素，斯大林也没有能完全解决如何建设新社会的任务。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极其宝贵的新经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为解决时代提出的第二个重要课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然，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因此需要我们继续大胆的实践和探索。

总上所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对时代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虽然没有能完全解决，但也为解决这一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思想(包括哲学思想)正是在回答这个历史性的课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思想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而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①对此，毛泽东自己也讲过多次。如，一九四五年党中央政治局讨论要不要在七大修改的党章中写上毛泽东思想，大多数同志主张写上。毛泽东则表示，你们一定要写毛泽东思想，我也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他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那里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又如，在一九四八年复吴玉章电报中，他不仅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而且还指出，"'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再又如，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他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

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呢？

首先，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杰出的领袖。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下子做到的。中国共产党人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把毛泽东推举为自己最杰出的领袖的。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

早在二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参加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参与了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发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领导了秋收起义，与朱德等同志一起创建了红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后又领导和建设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虽然也曾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就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但此时，他还没有成为整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正确路践和主张并未为当时的中央所接受。相反地，他受到党内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只是在长征途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处于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才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曾推举过陈独秀为自己的领导人，实践证明不行；推举瞿秋白、李立三，也不行；共产国际把王明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更是不行。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比较，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才推举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周恩来同志说得好：毛泽东"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①

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2页。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毛选是用血写成的。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宝贵财富。毛泽东同志有关政治、军事、党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论著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决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重复，是对外国哲学教科书的“抄袭”。这两篇著作凝结着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把这两篇著作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更可以看出它们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没有亲自参与并领导中国革命的人，没有同陈独秀、王明等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杰出的哲学论著的。

从党诞生以来，毛泽东同志长期参加并领导了中国革命，他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同党内的错误路线、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抵制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某些错误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对矛盾学说和认识理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进行说明和发挥。中国革命实践也为解决上述理论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所作出的哲学概括和总结的卓越典范。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其他哲学著作也无不如此。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所谓“政治家”。他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他阐明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正是说明他自己的理论来自群众，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本人把社会调查看作

是向群众学习、了解社会情况的好形式。他的许多论著是在革命实践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许多讲话、报告、指示、重大的决策是依据下面来的调查报告、情况反映等作出的。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又为群众实践所证明了的科学真理。

共产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革命经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总是紧紧依靠党，依靠集体的智慧。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是作为党的文件发表的，其中有的是经过集体讨论，由毛泽东起草写成的；有的文章虽然不是作为党的文件写的，但是他也经常把文稿先在党内外一些干部中传阅，征求大家意见，然后修改定稿的。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当然主要是他个人的辛勤劳作，但也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辛勤劳动的丰硕成果。

最后，中国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和著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长期艰难曲折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产生的领袖并不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一批领袖人物。毛泽东同志只是其中最杰出的、最卓越的代表。中国革命的其他领袖人物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过程中，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的理论和著作，同样也不仅是他们个人思想的产物，而是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产物。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它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一致的，同属于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而决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特殊的思想体系。因此，任何想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的企

图都是极其荒谬的。然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的重复或机械的搬用，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了新问题，概括了新经验，增添了新内容。因此，任何想抹煞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贡献的做法也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 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逐步广泛传播开来。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开始运用唯物辩证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说到自己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时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② 一九二一年一月，他在复蔡和森的信中更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③可见，毛泽东同志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之后，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都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真理。他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④ 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于我们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

②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单行本)，第39页。

③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

非常重要的。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宇宙观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因此，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和普及。在延安，他勤奋读书，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和其他哲学著作，他在百忙中还应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亲自去讲授辩证法唯物论。他的讲授提纲分为三章。第一章讲唯心论与唯物论，讲述的内容有：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唯心论发生及发展的根源，唯物论发生及发展的根源；第二章讲辩证唯物论，阐述的方面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同旧哲学遗产的关系，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第三章讲唯物辩证法，论列的条目有：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链与环等等。可以看出，这是毛泽东同志准备写作辩证法唯物论的纲要。他曾说过：将来如有可能，准备写一本"适于讲解的辩证法书"。可惜，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宿愿未能实现。

毛泽东同志不仅自己发愤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鼓励有学习能力的干部学哲学。住在杨家岭的那段时间里，他每星期三晚上召开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哲学座谈会，推动干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党、政、军干部学哲学的热潮初步形成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又提出成立新哲学会，倡议召开新哲学年会，并号召大家积极学习新哲学，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活动。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要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学习辩证唯物论

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他强调指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想要创立一个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哲学体系，相反，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所要求的。毛泽东同志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本"。他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多方面地作出了丰富和发展，而且具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色。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遗产的关系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直接发源于中国历史上的哲学遗产，而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历史上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民族化，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①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其中就包括着与中国具体的历史实际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毛泽东同志在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重研究中国现状的同时，还十分注重研究中国的历史。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他又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本人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等有精湛的研究。这正如周恩来所说的：“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③

中国的哲学遗产是异常丰富的。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精神文明的民族，也是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辩证思维的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极为广泛深远。毛泽东同志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不仅改造和吸收了中国哲学中许多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而且也批判地引用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反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正确，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关于中国古典哲学中朴素唯物论、认识论的改造和吸收。

中国古典哲学中朴素唯物论、认识论思想极为丰富。从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墨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中经荀况、韩非、王充、范缜等，直到集古典唯物主义大成的王夫之，其唯物主义传统从未间断过。毛泽东同志从中吸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料，通过改造赋予崭新的意义。

在这里，最突出的事例之一，是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辩证唯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500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页。

物主义的解释和发挥，并多次加以运用。“实事求是”一语最早出于班固所著的《汉书》。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汉景帝之子刘德喜欢做学问，广泛搜集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因此，班固称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把此语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其原意是说，做学问要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从其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这本是指“修学”的一种求实学风，哲学味并不浓。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同志把“实事求是”提到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的高度，并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这一赋予新意的解释，不仅把辩证唯物论的根本点用民族化的语言作了深刻的表述，而且指明了在实际工作中，在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实践论》，继承和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古典哲学中带有根本性的传统哲学问题，即知行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先秦的孔墨开始，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观。宋明以来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相当广泛的论争。朱熹主张“知先后行”说；王阳明则主张“知行合一”说；王夫之批判朱熹的“先知以废行”和王阳明的“离行以为知”的观点，而提倡“行先知后”、“知行相资”说；颜习斋继承王夫之哲学思想，强调“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的习行哲学；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孙中山则提倡“知难行易”说。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曾研读过一些宋明理学家的著作，曾接受过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五四时期，他已接近于王夫之的“知行相资”说。他在世界观根本转变以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在革命实践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哲学史的优秀遗产，充分地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关系，从而使知行关系问题得到了科学的解决。

关于中国古典哲学中朴素辩证法的改造与吸收。

中国古典哲学中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也是极其丰富多采的。英国著名学者 T·李约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发源于中国，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改造，而后又转向了它的发源地。这个论断是颇有见地的。中国古典哲学从《周易》、《孙子》、《老子》起，中经韩非、杨雄、柳宗元、王安石、张载、方以智到王夫之，其朴素辩证法的传统也从未中断过。毛泽东同志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料，通过改造使其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宇宙观，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相互贯通和相互转化，并看到了事物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这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毛泽东同志在文章、讲话和报告中，经常引用中国古典哲学、历史文献和成语典故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加以改造和提高，使之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带有鲜明的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

《周易》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部算卦（卜筮）的书。它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易经》把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抽象概括为阴阳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是一切事物共同具有的两种对立的势力。并认为，阴阳互相交感产生万物，推动着事物由低到高的变化发展。这种概括，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古代抽象思维能力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在读到我国《易经》时曾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①后来，《易传》对《易经》的思想进一步作了解释和发挥。它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它把阴阳相互作用（交配、交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

合、交接)看作是一切事物形成、变化和转化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同志在讲到辩证法的两点论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对立时说："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① 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阐释，就把古代的阴阳学说同辩证法的两点论有机地联系起来，并赋予了新的内容。

《孙子兵法》，是孙武对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它是一部论战争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它在中外军事史和哲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译成法、英、德、日、俄等国文字，广泛流传。孙武认为，指导战争必须做到全面性，反对片面性。他要求对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天时、地利、将帅、士兵等方面，做出详尽的了解和全面的分析。他主张从事物的内在矛盾中分析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促使矛盾的转化。他研究战争的发展规律时，提出了许多对立的范畴，比如敌我、主客、治乱、强弱、众寡、分合、攻守、进退、久速、曲直、劳逸、奇正、勇怯、虚实、动静等等，并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条件，建立了一整套朴素的辩证法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无疑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但也不能否认吸收了孙子等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的思想。

老子的《道德经》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重要著作。老子看到了许多对立的事物和概念，都是互相依赖和互相转化的。比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明暗、进退、白黑、巧拙、奇正、善恶、强弱、兴废、曲直、多少、大小、得失、祸福、生死等等。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他又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页。

复为奇(异)，善复为妖(灾)。”老子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极为宝贵的，它对人类的认识和我国哲学思维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老子对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都看作是无条件的、自然而然的，因而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说明。毛泽东同志改造和吸收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给予科学的解释。他在讲到好与坏的辩证法时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①这就明确指出了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条件性。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矛盾同一性的思想，深刻阐明了对立双方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原理，这除了总结实践经验以外，无疑也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合理思想，并加以改造和提高。

如上所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的优秀遗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使它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必须指出，我们不应当过分夸大这种联系。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革命。虽然，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长期过程中，蕴藏着许多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但始终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以后，就宣告了中国旧哲学的终结，才有了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化、民族化形式的统一，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富有的特色。正因为如此，所以它能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喜爱，并容易掌握、理解和运用，成为革命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7页。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反对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斗争中，并在深刻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开始萌芽、初步形成于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达到系统化和多方面展开，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但在一段时间里曾走过曲折的道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和初步形成

从一九二一年党的成立，到一九三〇年五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又可区分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后两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过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整个地说来，终究表现了党的幼年性。毛泽东同志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① 这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3页。

指明了党的幼年性的具体表现。一是，革命的实践经验非常缺乏；二是，对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革命的规律懂得不多；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没有深刻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尚未形成，还处于孕育、萌芽过程中。

我们党诞生以后，就开始致力于认识中国社会，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纲领。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初步提出了革命要分两步走。《宣言》明确提出：要“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表明，我们党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中国的国情，回答中国革命提出的问题。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如何进行分析，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它直接关系着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极力否认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并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他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无视它的妥协性，并把它当作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分析，是陈独秀在政治上从机会主义走向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为反对当时党内的两种倾向，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是当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代表作。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时期，它是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

分析》一文，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为指导，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用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和发展观点，揭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根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人民群众的历史，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基本观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对农民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他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指责和攻击，亲自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这一报告，科学地总结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经验，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与政策。这是当时调查研究农民问题的一篇杰作。毛泽东同志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他根据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阐明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党派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是由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指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他还从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出发，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问题。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发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革命的战斗唯物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革命方法论的体现。

实践表明，毛泽东同志从党的创立的时候起，就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卓越的代表。从一九二一年党的诞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理论上和实

践上都还不够成熟，还没有根据中国的国情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虽然还没有形成，但从以上所述已充分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有了重要的萌芽，并带有自己的特色。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党懂得了组织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紧紧依靠农民，开展武装割据的极端重要性，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随后，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小二百多次的武装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毛泽东同志认真总结实践经验，进行艰苦的理论创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三〇年五月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陈毅同志曾说，毛主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基本建立了一个初步完整的体系，以后则是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二八年十月到一九三〇年一月，在战争环境中认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极为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的存在、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最杰出的创造和发展。这一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又找到了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这不仅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特别是矛盾分析观点的创造性运

用，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唯物辩证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决议，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全文共四十页，分九个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奠定了我军的建军路线和建军原则，划清了无产阶级建军思想和资产阶级建军思想的界限。早在井冈山时期的武装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就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它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原则开始形成。此后，逐步制定了一套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及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为我军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作出了贡献。

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对党的实践斗争经验，从哲学上进行概括总结，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叫《调查工作》）一文。这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哲学著作，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斗争的哲学总结，它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首先，它作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提出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并进一步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其次，它首次明确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三，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新概念，同时提出了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本本出发按"既定办法"办的保守思想路线。它以极大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明确地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这表

① 上述引文均引自《反对本本主义》。

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中所作出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综上所述，在这一段时期里，我们党创造性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揭示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初步奠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提出了一条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这说明，我们党已经开始能够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去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并作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这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已开始形成。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

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形成到系统化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是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期。这一时期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这种"左"倾错误的主要特征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教条化和神圣化，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得照办，凡是苏联的经验就得照搬。王明教条主义的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坚决抵制和批评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过程中逐步形成和系统化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在长征过程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新的形势、新的矛盾，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因此，基本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之间，其它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矛盾日益尖锐化，而其它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则暂时降到次要地位，就是在地主买办阶级中间，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机面前，也会有所分化。这就是说，敌人营垒中间是存在着矛盾的，其矛盾是会发生变化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 他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分化，提出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去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总之，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了“左”倾关门主义的表现、性质及危害性，同时告诫全党警惕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形势、矛盾的辩证分析，阐明了一些同时存在着的矛盾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如果能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些矛盾，就能促使矛盾向对人民有利的方面转化。这就为党在新时期的策略路线，提供了科学的根据，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机械地搬用一般战争规律或国外革命战争规律，或者机械地搬用北伐战争的经验的错误，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推广运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于军事斗争领域，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指出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消灭战争的途径；阐明了把握战争规律，必须从实际出发，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论述了战争中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论证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法；阐述了战争的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指出了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制定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具特色的贡献。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论文，是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也是清算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深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两篇著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划清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和形而上学唯心论的思想路线的界限。它们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标志，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位置。

综上所述，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在这七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哲学思想走过了从开始形成到系统化的时期。同前一时期比较，它的内容更充实、更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反映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也反映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化。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

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

系统化到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是中国革命从挫折和失败到重新走向发展、壮大直到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期。这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新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活跃、最生动的新时期，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内容最丰富多采的时期，同时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生动的证实和发展的时期。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发展的总的特点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分析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批判了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及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更系统更完整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军事学说、社会革命论和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其主要之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就是在这个时期系统化、完整化的。在这个时期的四十年代初，毛泽东思想最终为全党所公认，被确定为我党的指导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已达到了完全成熟，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真理。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献。在这些文献中，系统地阐明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从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认识论。延安整风的学习运动，这是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是反对唯心论宣传唯物论，反对形而上学宣传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运动，也是清算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遗毒，端正全党思

想路线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在“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斗争考验，并一再证明其为科学真理以后，为全党一致公认为我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完全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同志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考察战争，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战争中客观规律性和自觉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指明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中的辩证法。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新的形势和新的特点，又撰写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创造了战略进攻学说，制定了战略决战的军事行动纲领，进一步完善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作了充实和发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地指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区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阐述了不断革命论和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批判混淆两个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制定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进一步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些思想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一整套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但怎样把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化为具体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发出了"注意工作方法"的号召。他说："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① 在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我党领导的工作经验，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献，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② 还说："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③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还一再强调必须重视科学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创立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内容十分丰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基本的方法，有具体的方法。其基本方法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等等。具体方法有："解剖麻雀"、"弹钢琴"、胸中有"数"、留有余地、多谋善断、两条腿走路、波浪式前进等等。毛泽东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6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志创立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体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现实道路。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

综上所述，在这十二年里，由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全面展开，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发展，斗争不断深入，我党的革命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这不能不反映在哲学的概括和总结中。因此，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容上更深刻、更完整，在体系上更严谨、更系统，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成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新时期的新特点，如何解决新时期的新任务，是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既不能沿用民主革命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而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去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解决新任务。因此，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总结新时期的实践经验中，进一步得到了光辉的丰富和发展。

在这一时期里，党和毛泽东同志把握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确地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应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在我党的领导下，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小生产的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我们这样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的国家里，把个体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经过互助合作的形式，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同时把个体生产者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生产

者，这是我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是量变质变规律的杰出运用。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①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改造和技术改造的辩证统一。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运动中，我们党又正确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采用"和平赎买"的方针，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把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想变成了现实。邓小平同志说：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② 实践证明，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增添的新内容。

毛泽东同志通过调查研究，阐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客观经济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关系，这是摆在我党面前的重大课题。一九五六年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要找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一年春天，他亲自听了工业、农业、商业、财政、运输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然后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运用唯物辩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72页。

证法的两点论，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实际问题，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关系和矛盾，都是针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存在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提出的。这充分体现了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又一新内容。

毛泽东同志坚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原理还灵不灵？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完全没有矛盾？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作出科学的回答，否则就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当时，国内外许多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早在五十年代以前，有人就断言社会主义社会已没有矛盾，没有对立，只有统一，只有差别。后来，有的哲学家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是"和谐的"辩证法，"辩证的对立、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主张抛弃"统一物区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旧公式"。总之，发展已不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是差别的统一和融合。毛泽东同志针对国际上这种公然抹煞矛盾、反对辩证法、鼓吹形而上学的思潮，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正确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具体地阐明了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从而科学地回答了时代给予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课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碰到的新问题，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贡献、新发展。

总之，在这一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这是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贵财富，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篇章。

五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在这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在这一阶段，又可以区分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也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曲折发展道路。

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哲学思想中，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两部分。我们必须把正确和错误区分开来，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晚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增添了许多新的思想，同时在他的言论中也有不少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错误论断，背离毛泽东同志自己一贯强调的思想。然而，即使当他犯错误的时候，包括犯“文化大革命”这样带全局性严重错误的时候，他还多次告诫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还始终坚信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

那末，这一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增添了哪些新内容？

（一）揭示了人类认识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规律，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

一九六〇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十年总结》中说：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① 他以民主革命为例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就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②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③ 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哲学总结，也是对自由和必然这对哲学范畴的生动而深刻的阐述。

毛泽东同志还在总结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不断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发展的规律。他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单行本），第 15—16 页。
② 同上，第 18—19 页。
③ 同上，第 27 页。

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①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通过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既反对了骄傲自满、停止不前的错误思想，又反对了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错误倾向，同时指出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反复的过程。这是对自由和必然这一范畴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二）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新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撰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失败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对《实践论》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这篇文章简洁明晰，还不足一千一百字，但它的思想容量很大，内容很丰富。它批判了唯心主义认识论，指出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提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两个飞跃，论证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指明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并阐明了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最后，指出了进行辩证唯物论认识论教育的重要性，等等。总之，它不仅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也揭示了人们认识运动的分过程，从而把解决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

① 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

践之间的矛盾的辩证途径简明扼要地阐述出来了，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三）从世界观的高度，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一九七〇年八月，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事先同陈伯达密谋炮制了一份“论天才”的材料，极力鼓吹天才论。毛泽东同志看穿了他们的罪恶用心，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说：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这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这表明，毛泽东同志在天才问题上，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了唯心论的英雄史观，坚持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这就把认识论中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历史观中的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从世界观的高度统一起来。

（四）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伟大的战略决策，这是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国际斗争的光辉范例。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准确地把握世界形势的新发展，确立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新格局，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两种矛盾、三种力量和中间地带的理论。进入六十年代，国际政治力量、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变化。到了一九七四年二月，他完整地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科学地制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新的世界战略，为国际反霸斗争的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同年四月，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这

个发言，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结成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战斗任务。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的结果。实践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及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严重的失足和错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① 因而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的道路上招致了严重失误，付出了重大代价。这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上、认识上的错误是分不开的。

实践表明，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左倾错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一生都倡导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并在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错误思想路线斗争中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哲学思想的人，在晚年竟然陷入了主观主义，背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轨道呢？应当指出，在理论上，毛泽东同志还是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但在实践上，却往往从美好的理想出发，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9页。

状况，作出了违反客观实际的估量，结果导致在政治上犯左的错误。因此，从世界观上来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是以哲学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是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实际活动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上、认识上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范畴，所以本书不再做具体的评述。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错误，指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正确地区分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指明了正确方向。

六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

这一时期，是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始的。党的《决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个新时期中，我们党在实践中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推向前进，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十二大的文献中。

（一）总结历史经验，重新确立了党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

党的历史表明，凡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坚持以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为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就发展；而背离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就必然遭受挫折或失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五十年代后期发生的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都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所造成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 33 页。

的。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上，是完全正确的，是至关重要的决策。党的六中全会和十二大，进一步阐明了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会亡党亡国；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党的指导方针。不解放思想，不冲破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就无法拨乱反正，也无法开创新的局面。而歪曲解放思想的方针，就只能有害于党的事业。这两种倾向都要继续反对。我们讲解放思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遵循党的思想路线，必须立足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必须有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总之，解放思想必须符合而不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把思想路线的解决，提到党和国家存亡的高度；提到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这是对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二）根据实践经验，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① 这就指明了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揭示了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的内在根据。

当一九五六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但是，那时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知道甚少，有也不多。现在情况大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71页。

不一样了。胡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中，从思想、政治、组织、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党的建设等方面，说明我党在三中全会以后，不但在指导思想上分清了是非，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通过总结三十多年来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已经从过去那种不完全、不准确的状况，发展到比较完全，比较准确了。我们现在的认识，比起八大召开的时候，的确深刻得多，正确得多了。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上，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的过程。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对一般建设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党中央认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建设的规律，还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尤其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一切别国的建设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于我们都是重要的，应该而且可以吸取有益的成份，有所借鉴，有所丰富，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但生搬硬套，是注定要失败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此，党坚决地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还要进一步揭示一般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特殊表现，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特殊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三)从实际出发，逐步确立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他还说：“中国的事情要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②]这就为确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总的指导思想。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逐步地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它的主要之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

这条道路的主要点，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总结了十条。这十条的基本思想是：它指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正确途径。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必须准确地估量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殊形态；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等等。这十条要点，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找出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现在，我们党经过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逐步清除了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已经制定出一系列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使我国经济渡过了最困难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十二大报告规定了在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并且指出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的几个重要原则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纲领。在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371—372、372页。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尽管还有许多新的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但是，十二大所提出的经济纲领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纲领既使我们不至重复过去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的错误，也防止了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克服的困难面前徘徊观望、踌躇不前。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进行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纲领，但也是可以实现的纲领。以这样的纲领来保障我们今后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摆在经济建设方面，将使我们稳步地达到本世纪最后二十年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丰富和发展。

（四）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党中央曾多次郑重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并规定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的重大问题。

十二大报告，从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出发，从现实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发，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包含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它对社会主义特征作了全面概括，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概念作了明确解释，对两种文明的辩证关系作了很好说明，对共产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进行了深刻阐述，所有这些论述都具有新的见解、新的思想，从理论高度和政治高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战略中的意义和作用。

十二大报告指出："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8页。

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①]并着重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没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就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作出了新贡献。

综上所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党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胡耀邦同志说："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职责。”[②]事实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党中央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十二大文献，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范例，也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新的结晶。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将不断开放出灿烂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客观历史发展形成的。它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地去阐明它。这里既要反对过分夸大，又要反对任意贬低，而应当客观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去作出科学的评价。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9页。

② 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7页。

要确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必须遵循继承和发展、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基本理论方面说，在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辩证自然观、唯物历史观等方面，都有不少重要的贡献和发展；从实际运用方面说，它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推广应用于军事、政治、经济、党的建设和实际工作，创造性地阐述了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辩证法，党的建设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等等，从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在唯物论方面，深刻发挥了“实践的唯物主义”

恩格斯总结了哲学斗争的发展史，精辟地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并论证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科学地解决了区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标准，明确地回答了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科学唯物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都有许多经典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哲学基本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作了深刻的阐述。它不是一般地从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样的命题出发，而是以中国化的民族语言来进行表述，并着重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诸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等命题，都贯穿着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思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中国革命实践表明，在我们党内无论是犯右倾或“左”倾错误的同志，在理论上或口头上都承认唯物论，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样一个最起码的唯物主义前提。但在实践活动中却往往从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不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结果导致在政治上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左”倾冒险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①。就是说，他们把存在统一于思维，客观统一于主观。而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埋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②就是说，他们的思想落后于存在，主观落后于客观。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彻底克服和纠正党内错误路线，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清算错误路线的同时，还十分注意从世界观上清算错误路线，揭露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所以，在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所碰到的思想论敌，虽然也有地主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公开宣扬的形形色色的唯心论，但在革命内部和党内却主要是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思想。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所批判的对象主要不是以学术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是以主观主义形式出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活动中的唯心论。

早在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③而在稍后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志为了《反对本本主义》，进一步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9页。

判了主观主义的一种颇有欺骗性表现形式的本本主义。他强调指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①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的原则，是毛泽东哲学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从实际出发和从本本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斗争，是毛泽东哲学唯物主义和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主义长期斗争的基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党内哲学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毛泽东同志阐明了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才会抬头，革命才会胜利。为此，他把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作为共产党思想建设的最主要的内容。这就深刻阐明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理。阐明这个真理，明确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的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真正体现了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突出贡献。

二　在认识论方面，系统论证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马克思、恩格斯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创始人，把认识论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他们第一次把实践纳入认识论，指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指出必须把认识的能动性

① 《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5页。

应用于反映论，即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指出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重要在于改造世界，等等。他们提出的这一系列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虽未做出深入地系统地具体说明，但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列宁所处的时代，认识论成为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焦点。当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动了猖狂进攻。列宁以最大的勇气迎接了敌人的挑战。他阐明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还是从感觉和思想到物"两条认识路线的基本区别。他明确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①提出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②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著名论断，等等。但由于列宁所面临的论敌的主要唯心论的哲学倾向，所以他当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论的基础上。因此，他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辩证途径，都未来得及从完整的理论形态上充分地系统地展开论述。这就为以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提出了系统化的任务。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最重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无论是犯右倾错误还是"左"倾错误的同志，都没有能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要"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的过程。为了在革命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引导群众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对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进行详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尽地系统地阐述清楚。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直接完成了列宁所提出而未完成的任务。这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

毛泽东同志坚持实践论，反对先验论，不是从一般地宣传讲解认识论原理出发，而是针对从两个极端出发割裂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哲学倾向，紧紧抓住实践和认识这对矛盾，突出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并以此为中心全面展开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系统论述，阐明了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真理的道路；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运动的全过程，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揭露了党内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等等。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历史唯物论高度结合起来，使它成为真正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表明，《实践论》虽然篇幅不大，但它是一本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专著。后来，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深刻地阐明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辩证法，重申了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从而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实践论的根本特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三　在辩证法方面，集中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研究了科学发展史、思想发展史，批判地吸收了旧哲学的优秀遗产的基础上产生的，从而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哲学上引起了巨大的革命。为了通俗地讲解辩证法，马克思一八五八年一月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说：如果有机会，他打

算写一本“使一般人都能理解”的辩证法专著。① 虽然马克思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他们把辩证法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统一起来，使辩证法成为科学的世界观。

列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一步总结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规律，深入地分析研究了黑格尔哲学，写下了《哲学笔记》这一光辉论著。列宁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应用于认识过程和发展，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明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② 列宁对自己提出的任务，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作了初步的说明和发挥，但毕竟是纲要式的短文，未能从完整的理论形态上系统地加以论述。根据列宁写作《哲学笔记》来看，他有一个写作辩证法专著的宏伟计划，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繁重的工作，致使《哲学笔记》成了列宁未完成的辩证法论著的宝贵遗产。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纷纭复杂相互交错的矛盾，其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是世界所罕见的，使中国成了世界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这种客观世界复杂的矛盾运动必然要在哲学上反映出来。但在这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总体中，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捉住其中的主要矛盾，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和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碰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种客观的辩证法就决定了矛盾学说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撰写《矛盾论》是为了实践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它是列宁《哲学笔记》中辩证法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系统地阐述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专著。毛泽东同志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他不是一般地从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理论出发，而是针对党内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否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紧紧抓住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全面展开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系统而完整的论述。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就是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针对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要害，系统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尤其是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从而使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更加理论化和深刻化，在辩证法理论的许多方面都作出了新的贡献。

当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际上形而上学思潮泛滥，鼓吹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否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毛泽东同志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思想，反复教育全党要照辩证法办事，要用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的新问题，观察和分析国际斗争中的新矛盾，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宝库贡献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长期实践斗争中，还善于把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体系，使辩证法广泛地普及于群众之中，成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在这一方法论体系中，有基本的方法，有具体的方法。其基本方法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等等。具体方法有：解剖麻雀、学会“弹钢琴”、胸中有“数”、留有余地、多谋善断、两条腿走路、波浪式前进等等。这表明，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个杰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践家；它还表明，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篇章。

四　在辩证自然观方面，着重指出了物质的内部矛盾性和无限可分性

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既有客观实在性，又具有内在矛盾和无限可分性，坚持驳斥那种所谓有最终物质实体的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①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写下了许多论述自然辩证法的光辉著作。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从多方面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种矛盾及其辩证发展规律。关于哲学物质概念，恩格斯曾指出："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在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②他还说："象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③这就是说，哲学上所说的物质概念，是指各种事物的共同特性，即客观实在性。可是，在十九世纪，有些自然科学家错误地把原子当作"最终的"物质实体。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④从而驳斥了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此后不久，由于电子和放射现象的发现，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见。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批判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谬论的同时，总结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成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4页。

果，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和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理论。他给物质下了一个科学定义，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①他还说："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②就是说，哲学物质概念，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存在。然而，二十世纪初，由于电子的发现引起自然科学物质结构概念的改变时，有些自然科学家硬说电子是"最终的"物质实体，并认为已经穷尽了电子的一切特性，因而竟然宣称物质"消灭"了，物质概念"过时"了，唯物论被"驳倒"了。列宁在分析这种错误思潮的原因时说："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这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③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深刻地指出："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④ 后来，现代物理学中有关质子、中子、介子、光子等基本粒子的相继发现，也完全证实了列宁的科学预见。

毛泽东同志的辩证自然观，也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成果的哲学概括。早在《矛盾论》中，他就指出："自然界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的光辉思想，揭示了自然界运动发展的内在源泉。他还说过："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这就是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只有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才能摆脱自然规律的奴役，从而获得自由。

半个世纪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以来，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成果，几乎超过以往几千年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6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7—268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8页。

的总和，不论是在宏观世界还是在微观世界都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毛泽东同志极为关心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新成果，从哲学的高度及时总结这方面的新鲜经验。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说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一九五五年一月，在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的会议上，当有人谈到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时，毛泽东同志就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以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当时，这一看法引起了中外科学家的惊异，许多人不相信。可是，就在半年以后美国科学家发现了"反质子"，一年以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这就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科学预见。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就原子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进一步作出了哲学概括，指出："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①同年十一月，又说："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②一九六四年，当读到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后，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它对于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有重大意义。后来，他在同中外学者的交谈中，提出了宇宙存在着两个方面的无限性的思想。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可分，电子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下去。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十分关心基本粒子研究的进展情况，希望从中得到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新的自然科学证据。这表明，毛泽东同志虽无自然辩证法的专门论著，但他提出了辩证自然观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0—351、498页。

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内部矛盾性和无限可分性的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它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把对立统一规律的一分为二的学说贯彻到底，破除了现代物理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唯心论思想。国际知名的我国物理学家钱学森同志说："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毛主席预见了二十年后高能物理学的发展。"在实践上，它给粒子物理学的科学实验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物理学家于一九六五——九六六年间提出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层子模型"理论，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高度重视。一九七七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国际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一著名物理学家提出建议：为纪念毛泽东关于物质有更深层次的理论的重大贡献，应将现在称为"层子"或"夸克"的微观粒子命名为"毛粒子"。一九七九年，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领导的高能物理实验小组发现了"胶子"的踪迹，这表明"层子"也是有结构的，可能存在着更深的层次。科学实验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物质的内部矛盾性和无限可分性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

五　在唯物史观方面，重点阐明了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题的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引起了哲学的革命。恩格斯说："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①他还指出：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称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是"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是对以往历史理论的革命。②同样，列宁也十分重视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和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页。

生活，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产生，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社会历史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注意力是反对各种唯心史观，阐明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因而着重于经济的研究。他们一再指出：物质资料和生产方式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终极原因是经济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变革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点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①他还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②显然，他们较多地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对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强调得不够。对此，恩格斯后来还做了自我批评，但同时指出：在"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③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日益滋长起来，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唯物历史观，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文人也乘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庸俗化，把它歪曲成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等等。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青年党员，不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把唯物主义当作公式、标签到处生搬硬套。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在充分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作了新的论述：第一，既指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

①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又指出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决定历史发展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其他各种因素；第二，既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又指出上层建筑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有着巨大影响，对于“斗争形式”方面，在许多场合起着“决定作用”；第三，还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上层建筑和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从而彻底粉碎了德国的反动社会学者保尔·巴尔特之流的攻击，同时也批评了德国党内的教条主义的倾向。这样，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中，既坚持了唯物论，反对了唯心论；又坚持了辩证法，避免了形而上学。

毛泽东同志坚持和发挥了恩格斯的思想，他在清算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批判了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的机械唯物论观点。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①并对“一定条件”作了具体的规定。紧接着他又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②这显然在恩格斯的思想的基础上深化了，表达得更明确、更彻底，同时反映了毛泽东唯物史观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正是运用这种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剖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在社会主义时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301页。

他又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新概念，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历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坚持和发挥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这些基本理论都贯彻了社会基本矛盾的主题，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谱写了新的一页。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在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时说，马克思的英名和事业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有两个是很杰出的：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二是，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①紧接着，他说：一个人“一生中能有这样的发现，该是很够的了。甚至只要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②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科学理论；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作的重要贡献中，则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因而，使列宁和毛泽东的英名和伟业也永远彪炳于科学史册。

六　在军事理论方面，全面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和认识论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创始人，他既有直接的实践经验，又有专门的军事知识和理论素养。他在先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撰写了大量的军事评论和军事论文，从理论上概括了近代战争的许多重要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军事原则。他在军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事著作中，科学地分析了军队的起源、阶级本质及其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各种兵种的组织和建设的历史；分析了战略战术的发展史；分析了军队教育和训练制度的历史；分析了杰出将领在战争和军事技术发展中的作用的历史；分析了各种武器发明和发展的历史等等。总之，在他军事著作中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丰富多采的。其中，恩格斯特别强调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军事规律和军事原则，既要用全面的、发展的、相互联系的观点去研究战争，又要反对用孤立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去考察战争。指出，必须注意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及其变化，研究作战条件的具体情况，研究各个兵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各种军事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研究战略战术的相互配合和相互影响等等。这说明，恩格斯在军事科学领域里，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总结了战争的经验，揭示了战争的规律，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战争，阐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不同性质战争的态度；揭示了使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革命战争，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途径；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内在联系，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总根源。他在战争转化问题上，既反对了以奢谈战争转化为幌子，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也反对了否认战争转化可能性的社会民主党左派的过激倾向；正确地分析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形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根据中国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条件，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是进行长期的、持久的革命战争，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此，在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最主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阐明了革命战争的辩证法，从而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作出了贡献。

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生动的应用和发展。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与机会主义军事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重要文献。它不仅是一篇著名的军事著作，而且也是活生生地反映中国革命战争辩证法的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里已经孕育着一年后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思想。它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篇。可以说，它是论战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写的《论持久战》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战争发展规律，批判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的杰作。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具体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阐明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根本规律，揭露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同样，体现了战争问题上的活生生的辩证法。因此，可以说《论持久战》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续篇，同样，也是论战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战争的形势和规模有了新的发展。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十大军事原则，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也反映了一般人民战争的普

遍规律；它虽然文字简短，但却系统地阐明了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战法、作战形式、战斗作风以及战斗保障等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并指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还揭示了战斗中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的矛盾辩证法，指出要从发展观点看问题；阐明了战争中的主观与客观、质变与量变、根据与条件的辩证关系。总之，它是毛泽东同志为我军制定的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行动纲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新贡献。

此外，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他代表我党发出的指导战争的指示、电报、通讯、命令、通知和评论等等，都是体现毛泽东军事理论的重要文献。

总之，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研究、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体系，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此，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典范，我们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离不开《资本论》的话，那么，可以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则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军事学的典范，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同样地离不开研究这些重要文献。这表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既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发展的一种必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史上占据着光辉的一页。不了解这一点，也就不能完全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列宁逝世之后的最主要的代表，它在一系列基本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夸呢？不是。这是除了它的敌人以外，为世界人民所公认的。请看事实：

苏共中央《真理报》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题为《论毛泽东的〈实践论〉》的编辑部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意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还说："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①

原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一年第74期（中文版）上，发表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一文中说：毛泽东的这篇著作，"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这篇著作中渗透着党性和对唯心主义与主观主义以及庸俗经验主义的不可调和性。目的在于教育干部进行中国革命，它是在这个斗争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写的，因此，它是理论与实践之统一这一命题的活生生的体现。这篇著作具有一种简单、明了而生动的风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积极党员读到它时无疑将得到裨益，而且它无疑地是这些政党在反对唯心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认识论的斗争中的重要资产。"②

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6卷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和主要的理论著作，明确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宝库的丰富，对于一切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巨大的理论的实际的益处。"

一九五五年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说：《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0日。

② 《新华月报》1951年3月。

范。”①

一九五八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多处引用毛泽东的言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高度评价。教科书说：“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卓越贡献。”②

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理论家都纷纷撰文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指导意义。有的马列主义政党认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帮助奠定了我们运动的思想基础”。有的说《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是他们党的教科书。亚非拉美的一些思想家和理论家也认为，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毛泽东“丰富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现在和将来都是评论分析人类历史、政治和社会大事的可靠准则。”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新华社编译的《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一书中，选编了世界各国各界人士悼念毛泽东主席的声明、谈话、诗歌、回忆、文章和报刊评论，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评价随处可见。虽然，有些评价值得推敲，但它反映了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资产阶级比较有头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富有特色的理论。美国一位资产阶级学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各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西德的刊物上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他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不论是从文体还是从哲学的内容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同样的著作相比，都不见逊色。”还说：“它们都是既短小而又简洁，既丰富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只能把它同马克思那篇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来相提并论，这篇导言阐述了历史唯物论的实质。”

① 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 1958 年中文版，第 66 页。
② 苏联科学院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97 页。

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些国家的理论家们后来一反常态，又是发表文章，又是炮制小册子，连篇累牍地放肆地歪曲、贬低、诋毁和攻击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丝毫也不奇怪的。正如法国的一位学者所说的，这些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把毛泽东思想"从到昨天为止还占有光荣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统统删去。"①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当代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国际共产主义杰出的活动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实践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在我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一定能够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作出新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向前进。

① 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1973年巴黎。

第二章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研究它，有助于了解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有助于了解和掌握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与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乃至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且，对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通过研究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同志在他当时的实践条件下是怎样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方法论上获得启示，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如何坚持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如何创造性地解决我们当今实践中的新任务、新课题，包括研究和总结当代社会实践，特别是科学技术实践中提出的大量的哲学问题，以及探索和解决在我国这样一个国度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问题，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来。

第一节　实 事 求 是

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理论的灵魂，也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核心。这里，我们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贡献和方法论

意义。

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根本点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① 又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② 实践表明，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世界革命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其一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何把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其二是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如何去夺取胜利，并按照各国的具体特点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这形成了当代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

中国，这个世界东方矛盾焦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究竟应当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又应当如何进行这种革命呢？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最重大、最急迫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已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肩上。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首要的前提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清中国的国情。认清中国的国情，是解决中国革命一切基本问题的根据和出发点。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基于这样的国情所要实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109、121页。

现的革命任务，无论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来看，还是从中国革命在当时世界革命全局中的特殊重要性来说，都必须按照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实事求是地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彼伏此起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前仆后继，英勇战斗，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谱写了许多壮丽篇章。然而，由于没有先进的阶级力量和正确的革命理论，一次次的斗争，一次次的失败。失败和挫折教育了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实践表明,革命斗争需要有先进的阶级领导,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武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崭新篇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这种结合达到了新的水平，使中国革命从此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向前发展。这一历史过程表明，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思考、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理论与实践矛盾运动的必然。因为作为对各国革命共同本质之科学概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它必然回到新的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接受检验，并且纠正、丰富和发展自己，这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中国革命实践在自身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它原来所应用的“理论”已不适用(如孙中山所应用的“理论”)，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世界革命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的一部分。这样，新的中国革命实践同新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相结合，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结合的理论体现就是毛泽东思想。

可见，实事求是，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之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不仅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贯穿于党和毛泽东同

志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长期实践过程和理论概括之中，同时也贯穿于作为这种理论概括的重要部分的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之中。

（二）实事求是是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结晶

马列主义普遍原理，要不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实现这个结合，这是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曾存在着“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的倾向、思潮和路线。

右的错误倾向和路线的代表，如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他抛弃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视中国和世界发展了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而套用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因而实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使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左”的错误思潮和路线的代表，如王明等人，他们机械地照搬马列主义的“本本”，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抹煞中国的具体情况，实行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结果也使中国革命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惩罚。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不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的基本问题，而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仅实事求是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而且实事求是地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党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思想分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有不少错误的东西与中国党内的错误思潮相结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这就迫使党和毛泽东同志不得不去严肃地思考和回答中国革命提出的种种问题。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给马列主义提出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需要从理论上给

以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正是面对这些现实，毛泽东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对上述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回答。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观点等等，就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提出"(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①] 一九三〇年，他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 坚决主张"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③] 针对共产国际指挥一切的错误做法和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并且号召共产党人应当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⑤]。反对照抄照搬"本本"的"保守路线。"从而奠定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写作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上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为我党确立正确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0页。
② 《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4页。
③ 《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1页。
④ 《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8页。
⑤ 《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9页。

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又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学习运动。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从总体上来说，全党同志学会了如何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且使我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系统化、完善化。为此，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给延安中央党校题字为"实事求是"。一九四五年，给"七大纪念册"题词为"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号召"七大"代表和全党同志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实践证明，这条思想路线，既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又是中国革命实践取得伟大胜利的理论指针。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从认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强调地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由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① 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创造。"这个新创造，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照中国的社会历史特点，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胜利实现的"，而不是依赖别的国家或者什么国际指导中心来实现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更加明确地指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 17—18 页。

的。"①而作为毛泽东思想之基本点的实事求是，也是在这种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见，实事求是的确是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的理论结晶。

（三）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认识论的核心观点和基本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实践条件下，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并且有分析地吸收了同时代人的某些理论成果，作出了许多新概括，新结论，新原则，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那末，什么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中的核心观点和最基本的认识方法呢？这就是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

其一，它是贯穿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根红线。就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来说，它紧紧抓住实践与认识这一对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辩证地考察了这对矛盾在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情形、特点和规律，作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新概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提出了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观点，阐述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作出了哲学就是认识论的新论断，等等。所有这些，无一不是贯穿着实事求是的观点，并体现着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的。

其二，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特点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是，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而且更重要地在于改造世界，而这又是奠立于实践性基础之上的。实事求是不仅要求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求得对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即能动地认识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应用对于这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单行本)，第40页。

种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才是认识世界的真正目的。可见实事求是是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而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因而，实事求是就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核心观点和最基本的认识方法。

二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新概括

毛泽东同志继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认识路线的思想，总结了新的实践经验，明确地把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党的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最锐利的理论武器。

（一）实事求是这一认识路线的正式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是以对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唯物主义的解决为基本前提的。这条认识路线是同一切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根本对立的。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②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时，明确地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他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的唯物主义的观点"。③

列宁在同马赫主义者的论战中，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恩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斯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① 斯大林对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分歧也有很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中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之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②。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贯高度重视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并深刻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基本要求，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向与根本途径。

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实践条件下，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同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总结了新的实践经验，集中了集体智慧，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基本观点。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和讲演中，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并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和发挥。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即找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②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42页。

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② 这表明，实事求是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正式提出，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辩证统一的结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表现。

(二)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新概括

我们说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新概括，这并不是指它是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之外新起的炉灶，而是指它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基础之上的新的发展。那末，它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可以说，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括，是毛泽东同志新加进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一颗灿烂的思想明珠。

具体说来，实事求是的思想新就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它体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关于这个结合的历史过程已如前述。毛泽东同志在实现上述结合的过程中，还从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基础。

一方面，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阐明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都一贯强调理论必须和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③ 在《神圣家族》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④ 列宁认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①"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②他还指出："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③"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④斯大林也说："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⑤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恩列斯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宝贵思想，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来阐明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基础。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⑥这就指明了理论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接受检验，从而纠正、补充和发展自己，才能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的、具体的矛盾统一，才能表现出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他还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⑦中国革命实践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总之，只有牢牢把握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才能从哲学基础上深刻地论证和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是从辩证法特别是从普遍与特殊的对立统一的角

①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3、236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页。
⑤ 《列宁主义问题》，第17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5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2页。

度来阐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从革命实际中抽引出来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是对许多特殊领域、特殊事物的共同本质的科学概括。有了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作指导，在新的实践中，还必须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例如，对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的辩证运动的生动过程，既体现了普遍对特殊的指导，又体现了特殊对普遍的丰富和发展。就整个认识过程说来，从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不断地循环往复，这种过程只要按照严格的科学的方法进行，就可以使人们的认识不断提高，步步深入。

第二，它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党的思想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怎样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的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两种态度的原则分歧。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按照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从认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过程中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是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基础则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回顾和总结我们党的实践经验时，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① 他还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②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必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第5—6页。

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中的客观规律。”① 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给日本工人访华团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② 可见，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实践条件下发展了我们党的思想原则，不仅把它当作我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武器，也阐明了它是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伟大指针。

毛泽东同志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器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地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③ 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条，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毛泽东同志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④ 再从党性来说，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点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必须而且能够实行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的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一致，决定了无产阶级能够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作为无产阶级利益和阶级意志的集中代表，因此，它就更能够做到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和实际的统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21页。

② 转引自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4—995、771页。

一。“这种态度，就是党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和实际的统一。”“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① 而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则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②并着重指出，共产党人应当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正因为理论联系实际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本质和思想作风，是其他任何政党所不可能有的，因此，它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这就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党的思想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并用党的思想建设的经验丰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新贡献。

第三，它是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的思想路线。

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③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④ 这条思想路线，对于我们党具有永远的指导作用，对于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将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

③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2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42页。

议》在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以后，接着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为什么说这条思想路线对于我们党具有永远的指导作用呢？从理论上来说，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它的基本内容和中心要求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关系来说，它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保证；从实践过程来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无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还是从国际共运的实践经验来看，都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具体的途径和方法。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坚持上述的思想路线，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参照国际共运的正反面经验，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研究现实的具体情况，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去研究新情况，认识新事物，采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创新局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①

三　调查研究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

要能够达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调查研究。因为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够了解"实事"，才能从实际出发，并且能"求"出"是"来，即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在把已经获得的规律性的认识能动地回到

---

① 《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实践中去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仍然必须继续作新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达到新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从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的高度，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意义、态度和方法，明确地指出调查研究应贯穿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全部过程之中，它是最基本的认识方法。

(一)为什么要进行调查研究

这需要从调查研究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关系来研究。

首先，只有调查研究，才能认识不断运动、发展着的客观物质世界。

早在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① "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② 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③这种调查研究工作需要继续不断地进行，才能不断地、正确地了解变化着的客观世界本身。所以，这种调查研究是长期的，不仅今天需要调查，将来也需要调查。毛泽东同志正是坚持作长期调查的。民主革命时期，他作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他对新情况，新问题也坚持作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他把这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且教育全党要坚持作长期的调查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认识新事物，掌握事物的特点、本质和规律，产生出新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调查研究，既体现了唯物论，又体现了辩证法。

其次，只有调查研究，才能认识中国特殊的国情。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

---

① 《反对本本主义》，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单行本，第 2 页。

② ③《关于农村调查》，转引自《红旗》杂志 1979 年第 1 期。

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

调查研究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还因为这同党的状况有关。由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相当严重，集中地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只知道生吞活剥地照抄外国。经验主义者拘泥于自身的片断经验，而不知道普遍真理，不愿意或不知道应当了解新鲜事物。因此，强调并实行调查研究，对于党发展革命事业，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十分必要，尤其是对于克服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第三，是否实行调查研究，是坚持什么认识路线的原则问题。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调查研究工作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① 毛泽东同志本人更是如此。他说："我自己认识世界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②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③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里，如何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毛泽东同志不断地从认识论上总结实践的经验，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阐明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道理。一九六〇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十年总结》的重要报告，指出：

①② 《关于农村调查》，转引自《红旗》1979年第1期。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9页。

认识事物的主动权和领导工作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正确反映；然而认识是曲折地前进的，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所能完成的。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我们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强调，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认识客观规律，避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并且阐明了坚持调查研究，实行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对于认识客观规律的伟大意义。一九六三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他又强调指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义务。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①党的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论断十分正确。陈独秀、王明等人正是不做调查研究，而作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结果不是形成右倾机会主义，便是形成"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所以，是否实行调查研究，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还是坚持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重大问题。

第四，在调查研究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只有对阶级关系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

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马克思主义策略时，应该做到：客观地考察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这种考察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这种运动不是平滑的进化，

---

① 《反对本本主义》，第5页。

而是辩证的运动。① 后来，列宁又指出："制定策略时，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②

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③ 只有对社会的经济状况进行详细、深入的调查，才能确定社会中各部分人分属于什么阶级。只有对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深入、具体的动态分析，才能确定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实现什么革命目标，才能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提供客观的依据。早在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要教育党员应用马列主义进行调查，以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重申：我们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那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那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那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不仅教育全党同志认识到只有调查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他本人就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例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讲话和报告中，都及时地分析了阶级关系，规定了我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且使正确的路线掌握群众，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总之，只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只有用正确的路线去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才能调动千千万万的民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在党的领导下，去打败敌人，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光辉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上述思想的正确性。

（二）怎样进行调查研究

首先，必须树立向群众学习的态度。调查的内容，主要是群众的社会实践；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调查的过程，是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实践。因此，必须树立向群众学习的态度，跟群众做知心朋友，群众才能跟你讲知心话。你才能真正全面、深入地调查到东西，才能与群众一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① 他又说，怎样使对方说真话？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做侦探，使人家讨厌。"② 因此，调查时必须有满腔的热忱，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有求知的渴望，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在调查研究中必须树立向群众学习的态度，并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这样做了。向群众作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向群众学习，这是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点和历史唯物论的群众观点在调查研究工作上的集中体现。这也是我们应当大大发扬的一项优良的革命传统。

其次，必须解决调查研究的方法。

除了树立向群众学习的正确态度以外，还必须解决调查研究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述了方法和任务的辩证关系，强调指出解决方法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8页。

② 《关于农村调查》，转引自《红旗》1979年第1期。

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①我们这里说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是指比较重要、比较根本的认识方法，而不是指那些技术上的方法。

（1）必须坚持用马列主义作指导。

这是我们做好一切革命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也是搞好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调查研究，“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② 具体地说，就是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坚持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是要把它当作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而不是把它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包医百病的圣药。毛泽东同志介绍了他在这方面的体会，他说：他在一九二〇年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知道“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着重点为引者所加）。③ 所以，调查研究中以马列主义作指导，只是说把它当作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而不能把它当作主观的框框和现成的答案。应当运用这个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武器，去认识有规律的运动、发展着的物质世界，即必须不断地调查研究新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这样，才真正体现了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

为了正确地坚持以马列主义作指导，需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三种情况。

其一是，不要或不会以马列主义作指导。某些人按着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办事，这集中地表现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身上。在当时红军中有一些干部，由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低，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

③ 《关于农村调查》，转引自《红旗》1979年第1期。

遇事往往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

其二是，机械照搬马列主义。中国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从教条出发，搞本本主义，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一切都搬共产国际的那一套，结果使中国革命惨遭失败。鉴于这些极为惨痛的教训，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①，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产生出新的理论。

其三是，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机械地执行上级机关的指示。对于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要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符合斗争的需要，然后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本部队的实际情况来贯彻执行。对于不合实际情况的部分，则须负责地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不能凡是上级的指示，而不管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本部队的实际情况，一律机械执行，搞形式主义。当然，也不能借口要结合实际情况而自立中心，各行其是。

(2) 坚持阶级观点和对立统一的方法。

坚持阶级观点，首先就必须全面地、深入地分析各种阶级关系，调查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变化的情况，即从运动、发展中调查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不但要全面地了解有那些阶级，它们的情况怎样，而且要特别深入地研究"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②例如，"地主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则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③这些就是判定各个阶级所处地位的主要标志或基本特点。在分析阶级关系时，还必须注意掌握事物的数量方面，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注意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例

①②③ 《关于农村调查》，转引自《红旗》1979年第1期。

如，以当地解放为期前溯三年，看各部分人的经济状况以决定其阶级地位。再如，决定是富农还是中农，就要看剥削收入是否达到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一般来说，达到了这个标准的就算富农，未达到的，就算中农。

在全面分析阶级关系的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当前阶级关系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因为研究并抓住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政党决定其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要注意的东西。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①

对立统一的认识方法对于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应当自觉地运用这种认识方法。这主要是指：

第一，处理好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事物，开始总是获得大量的感性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的抽象，才能达到理性认识。例如，认识延安，开始只能了解一个大体的轮廓，形成一般印象。后来，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科学的抽象，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了。

第二，处理好分析与综合的关系。科学抽象过程中，分析和综合是对立统一的。它们在认识过程中既各有侧重又互相渗透。在获得大量感性材料以后，主要运用分析方法，但也有小的综合，在综合为主的阶段，同时也有深入的分析。

第三，处理好典型与一般的相互关系。调查时，既要掌握一般的材料，更要掌握典型的材料。对要调查的事物在调查中先进行初步的科学分类，然后每类调查几个典型，再配合以一些面上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全面的一般情况了。这种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十分重要。当然，这里要注意典型的客观性和辩证性。既不能人为地设定典型，也不能认为典型或者是绝

① 《关于农村调查》，转引自《红旗》1979年第1期。

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坏，然后为我所需地去搜集材料以填充主观的框框，而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典型。

总之，只有自觉地应用对立统一的认识方法，才能在调查研究中较全面、深入地认识事物。

（三）毛泽东同志在调查研究问题上的理论贡献

以上分析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意义、态度和方法的思想，现在，我们进一步概括地探讨一下毛泽东同志在调查研究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

第一，深入地阐明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

调查研究既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而其结果又是制定正确路线的客观依据。无产阶级政党改造世界，就是要靠正确路线去团结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因此，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就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了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① 共产党领导机关必须自觉地应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也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

第二，深刻地论述了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的统一。

广大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直接创造着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着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同时，他们又是认识的主体，他们在实践中获得无限丰富的认识原料和千千万万的半成品。特别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他们的实践提到更加自觉的高度，他们的认识也就会提供愈来愈多的半成品甚至很精致的完成品。而向广大人民群众作调查，就是要调查他们的社会实践和认识成果，既尊重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又承认他们是认识的主体，从而就把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点与历史唯物论的群众观点统一起来。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

第三，具体地揭示了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

列宁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的著名原理。毛泽东同志在调查研究的问题上进一步发挥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因为在调查研究中，应当运用辩证法去解决典型与一般、分析与综合、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等等的对立统一，这就把辩证法更具体地运用于人们的认识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三者统一的思想。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毛泽东同志在阐述认识论问题时，紧紧抓住实践和认识这一对矛盾，以实践为中心，系统地、深入地考察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一　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想，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的新鲜经验，作出了许多新概括、新结论，进一步阐明了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一)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

什么是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已经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感性的活动”①“客观的活动”，“物质性的活动”。还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②“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③恩格斯在驳斥不可知论时，把实践认定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8页。

为实验和工业。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总结了新的实践经验，对什么是实践的问题作了引伸和发展。他指出：实践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实践、实验、工业是衡量这个正确性的准绳。”① 又说：“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② 他还指出：“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的客观性的标准。”③ 他在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科学分析方法时指出：“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④ 这就把实践的概念规定得更具体、更丰富了。

毛泽东同志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实践的基本观点，指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做或行动”⑤，而且明确地规定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⑥ 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他以更加清楚而明白的语言，阐述了实践这一科学概念中所应包含的内容。他明确指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三项基本形式。为什么说毛泽东同志指出了三大革命实践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而不是它的全部形式呢？这是因为他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的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⑦ 这就阐明了社会实践形式的多样性。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71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0页。
③ 《列宁选集》第32卷，第235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实践形式的论述，比起马列的有关观点来，在范围上要广阔得多，在内容上也深刻得多了。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经分别地从不同角度论述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各自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但把这些形式统摄于社会实践之内来加以完整地论述，他们并没有做到，而毛泽东同志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贡献。

（二）社会实践基本形式的相互关系

既然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那末，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认识的作用又是怎样呢？

首先，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这是马、恩、列、斯一贯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 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②。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③ 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④ 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也重申了上述这些观点。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后来，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再重申上述观点。很明显，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概括，是对马、恩、列、斯有关思想的直接继承。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3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其次，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给予人们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这是毛泽东同志作出的新概括、新结论。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本质上……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社会关系指什么呢？对此，列宁作了解释，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结果）。"②并说明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③这样，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是社会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的总和。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有阶级性的，因而，人的认识也是有阶级性的。这个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讲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④列宁指出："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⑤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明确地指出：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⑥这是与马列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但是，毛泽东同志不仅一般地肯定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认识有阶级性，而且特别地指出了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们认识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他说："阶级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18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

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①这一说法不仅是对马、恩、列关于认识的阶级性这一思想的发展，也是对他自己一九三七年的思想的深化。再次，科学实验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同志又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②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同志不仅再次肯定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而且明确地规定了科学实验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项革命运动之一。一九六四年以后，毛泽东同志两次提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其重要内容就是强调要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强调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对于实现我国的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巨大作用。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是相当深刻的，也是很有远见的。实际上，他已有了这样的思想：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科学实验、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将愈来愈明显，愈来愈突出。当然，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是，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思想时，应当注意于探索这方面的内容。

二 系统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

① 转引自1978年9月18日《光明日报》。

② 《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3月15日《新中华报》。

本的观点。”[①] 毛泽东同志在阐明社会实践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深刻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②] 他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的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支配作用。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列宁曾多次提到客观物质世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他说：“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感觉、知觉。这是对的。但试问：‘属于知觉’的，也就是说，作为知觉的泉源的是客观实在吗？如果你回答说是，那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回答不是，那你就是不彻底的，你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主义，陷入不可知论”[③]。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它是一切唯物论认识论的基本点，同样也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石。但是，列宁这一论断主要是从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认识论的角度提出的。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以往一切旧认识论(包括唯心主义的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区分开来的角度，在充分肯定客观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泉源这个基本前提下，提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人的认识究竟怎样才能发生，怎样才能从客观实在获得感觉经验的问题。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认识的主体就无所谓认识，但如果没有认识的客体就无从认识。然而，只有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还无法获得认识，这中间必须有沟通主体和客体的纽带、桥梁。这个纽带、桥梁就是实践。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活动这个环节，才能解决主客观的矛盾，才能把客观物质世界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126页。

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① 还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②

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社会基本实践对人的认识起着决定的作用。他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③ 这就指明了，三大基本实践是认识的根本来源。离开它，认识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枯竭的、贫乏的、主观自生的东西。

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毛泽东同志还阐明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批判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他一方面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④ 另一方面又指出：“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⑤ 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⑥ 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既反对了那种否认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又批判了那种忽视直接经验、反对实践第一的错误思想。他在批判了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⑦ 这就全面地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关于认识发展的动力问题，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⑧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③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1页。
④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⑥⑦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的思想，他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① 这就是说，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推动力量。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等著作中做过深刻的说明。

第一，由于实践的不断深入，发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对人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也正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产生了新的认识。毛泽东同志说："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②

第二，人们认识的深度随着实践规模的增大和实践手段的提高而不断发展。譬如，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就是这样。毛泽东同志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③ 这个问题在现代科学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显得更为突出。后来，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在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的"认识工具"对认识发展的推动作用。他指出：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些东西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认识的工具，人们在使用工具改造

①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264页。

世界的同时，认识也就逐步深入。①这是对实践是认识发展动力的观点的很好说明。

第三，实践的发生和发展是无限的，认识的发生和发展也是无限的。毛泽东同志说："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②认识发展史表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在实践和认识的矛盾发展过程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实践的不断发展，不断打破人们认识上的旧框框，引起认识的不断发展。

（三）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

关于认识的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这一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部分作出阐述。

（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一天起，就把哲学不仅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武器，而更主要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列宁强调说："人的意识不仅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④马克思、列宁的这个思想是十分重要的。但他们的这些思想都是纲要式的论断，有待于进一步展开和发挥。这就为后继者提出了重要的历史任务。

---

① 《一九六四年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参见周培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载《怀念毛泽东同志》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毛泽东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他历来强调："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① 从而进一步解决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为此，毛泽东同志批判了教条主义者割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③ 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诫我们，不应当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④ 一句话，认识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

三　深刻地阐明了三大革命实践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⑤

这一论断是对国际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尊重与发动人民群

---

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页。
⑤ 《"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转引自《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众，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开展三大革命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蓬勃发展，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日益密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断巩固。在建国以后，我们党处于执政党地位以后，有少数人渐渐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既不调查研究，又要发号施令，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存在程度不同的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情况；在革命队伍中，有许多人不了解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道理，不懂得认识只能从三大革命实践中来，不了解认识过程中两个飞跃的规律，虽然他们也在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但是，在认识上不自觉，在实践中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鉴于这些情况，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对我们的同志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要重视三大革命运动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在联系，以及同党的建设的内在联系。

然而，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把阶级斗争放在三大革命实践的第一位，这比起一九三七年《实践论》中的观点来是一个失误。《实践论》指出："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而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却把阶级斗争放在了第一位，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未坚决地实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①。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却明显地表现他在理论上的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现实情况的正确分析而采取的战略决策，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心愿的集中反映。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四　用实践论的观点，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

关于天才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虽曾多次使用过天才这个词，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天才问题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问题提出来并加以系统的说明。这个任务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完成的。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曾谈到过天才问题，一九七〇年，在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他又从实践论的高度揭示了天才的本质，从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天才问题，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天才只能来自实践

天才，是在才能的意义上说的。所谓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这种聪明才智也属于知识的范畴，属于认识论的内容。因此，完全可以用实践论的观点对天才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既然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知识、才能也是认识论的问题，那就很容易了解什么叫天才。人们在实践中加上主观的努力，形成过人的知识和才能，于是人们便称这种人为天才。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也是在长期实践中才形成这种过人的聪明才智的。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①对"天才条件"怎么理解？这里所讲的"天才条件"决不是"天生条件"，而是指相对于他们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来说，在以前的实践中他们所形成的智慧和才能。这种智慧和才能，对于他们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便构成了很有利的认识条件。但是，就才能的总体来说，都是来自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领袖人物，都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主观努力，才形成了他们杰出的聪明才智的。列宁在评价斯维尔德洛夫时指出：“如果我们看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走过的道路，马上就能发现，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① 可见，任何天才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在内都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②事实确是如此。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大众日报》刊载：一九二〇年，在印度森林里发现两个女狼孩（一个两岁，取名叫阿玛那，一个七、八岁，取名叫卡玛那）。辛格牧师对她们进行了详细记载：起初，她们四肢行走，怕阳光，在黑暗中很自由，会分辨方向，眼睛象狼一样发出绿光。给她们衣服，常常被撕掉。她们怕水、怕火，喝水用舌头舔，不吃素食。每天夜晚象狼一样嗥叫。小的一年后死去。大的活到十七岁才死去。这位牧师对大狼孩花了不少功夫，想让她恢复人的生活，但效果很差。这个女孩两年后才会走路，还得有人扶着，六年以后才会独立行走，走得很慢，不会跑，走得快时就四肢并用。四年后学会六个字，七年后学会四十五个字。这就表明，脱离了社会实践，人们就无所谓认识，只能向动物本能退化。另外，即使生活在社会上，但缺乏必要的实践环境，也不能获得应有的认识。有一个例子，某大城市的一对夫妇把一个生下来五个月的男孩，送到农村老家。该家独门独户，只有两位老人照顾家事，看管孩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6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子。这小孩由于没有必要的实践和认识的环境，到了四岁多还不会说成句的话，表现出智力迟纯的样子。后经大夫多次检查，证明小孩的脑子和声带等器官都很正常，大夫让小孩的父母把小孩送到幼儿园里，和小朋友一起生活，半年后这小孩的智力、语言与正常的小孩一样了。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离开了社会实践，就无所谓认识，更谈不上天才，鲁迅很重视天才成长的环境条件，不承认与生俱来的所谓天才。他说："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是一首好诗。"①这也就充分说明，认识只能来自于实践，天才也只能在实践中形成。

（二）人们的实践地位不同，知识、才能也就不同

正由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所以，即使人们都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但因为他们所处的实践地位不同，知识、才能也就有或大或小的差别。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社会制度不同，即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另一种情况是在相同的社会制度下，在同一的实践过程中，由于人们的具体实践地位不同，也会造成知识、才能上的某些差别。

在旧社会，剥削阶级垄断教育和文化，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削，受压迫，没文化，有许多优秀人才被扼杀了。所以，在旧社会，剥削阶级中虽然出了许多人才，这并不表明他们天生就聪明；而劳动人民中没有出多少人才，也不是由于他们天生就愚笨。这是由于罪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情形，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②列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作了剖析，指出："资本主义扼杀了、压制了、摧残了工人和劳动人民中的大批人才（一九七〇年以前的版本为"天

①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

才"——引者)，这些人才在贫穷困苦、人格遭到侮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1]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翻了身，当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各条战线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人才。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必将出现人才济济、英雄辈出的喜人局面。这就表明，由于社会制度变了，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实践地位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获得知识和才能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同时又为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至于上面所说的另一种情况，人们都在亲自感受着，理论上的争论也不大，所以无须展开分析。

(三)人们的主观状况不同，在实践中也会造成知识、才能上的差异

这里也有两种情形。一是人们的立场、世界观不同，在同一实践过程中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往往会作出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例如，一九二七年，对中国湖南农民运动就有"糟得很"和"好得很"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二是人们的立场、世界观虽然基本相同，但由于在实践过程中主观努力不同，获得的知识、才能也就大不一样。就这个意义上说，勤奋努力更易于获得知识和才能。

以上，我们考察了知识、才能与实践的关系，这是一个方面的情形。那末，知识、才能的获得与大脑这个认识的生理基础是否就毫无关系呢？当然不是。这就是我们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的情形，即大脑这个思想的加工厂。

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基础，大脑只是思想的加工厂。他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81页。

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人类认识史表明确是如此，人们要有知识，必须在实践中获得原料，经过头脑这个“加工厂”的制作，才能生产出思想产品。大脑只是认识的生理基础，而不是认识的来源。在一个时代里，对于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头脑的生理差别是很微小的，但人们的知识、才能却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知识、才能上的很大差别不能由生理上的微小差别来解释。马克思曾经指出：“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①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使脑量悬殊，是否人们的知识、才能就相应地差别很大呢？也不是，关键是看实践条件。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人们的脑量一般在1200—1400克之间。俄国的屠格涅夫的脑量是2012克，而法国的安那多里·法朗斯的脑量只有1017克，如果从大脑先天固有才能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观点来看，他们的知识、才能应该有天壤之别才是。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尽管他们的脑量相差将近一倍，但他们两人都是十九世纪欧洲著名的文艺家。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各方面条件的改善，人们的脑量总的趋势是在缓慢地增加着，但人们的聪明智慧的发展却不是由于脑量的增加，而主要是由于实践规模的广阔和程度的加深，以及人类知识的长期积累和不断更新。那种所谓大脑固有知识的观点，林彪鼓吹“天才是爹妈给的”等等论调都是错误的。当然，由于认识需要有大脑和各种感受器官作生理基础，所以，搞优生学是对的。但是，如果想否认后天实践，搞所谓“天才复制”，那就是荒谬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天才问题的科学解决，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曾经揭露过唯心论的先验论与唯心史观的内在联系，指出，在唯心论者看来，人民群众“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4页。

统治。"[①]列宁多次论述过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相一致的基本原理，并且揭露过以往历史观的两个主要缺点。毛泽东同志关于天才问题的论述，从天才问题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认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关于天才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在认识论上坚持并发展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历史观上坚持并发展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②]的观点。这样，就把在认识论上坚持实践观点和在历史观上坚持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完全统一起来。这是对马、恩、列有关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对他自己一九三七年的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总之，把天才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了出来，并用实践论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的、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天才的本质，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第一次解决了关于天才的理论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第三节　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地、深入地考察了实践和认识这对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这种辩证运动中各个阶段和总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得出了许多新的概括和新的结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8页。

一　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

关于认识的辩证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许多精辟的思想。马克思指出："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在统一性中存在着。"①恩格斯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②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③列宁特别强调认识的反作用，指出"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④列宁还有一句名言，即："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⑤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深化了列宁的上述思想，他指出："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⑦这表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作出了关于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科学概括，既坚持了认识过程的唯物论，又坚持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把认识的辩证途径，科学地概括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两个飞跃，并阐明了它们之间

---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第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7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⑥⑦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268页。

的相互联系及其重大作用。

(一)关于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

什么叫物质变精神？毛泽东同志说："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① 这就深刻地说明了物质变精神的过程就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从感性认识怎样飞跃到理性认识呢？这就必须经过科学的抽象。关于科学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许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② 他还指出，必须从现实的具体事物出发，经过科学的抽象，才能透过混浊的表象，达到在思维中具体地再现事物的多种规定性的统一，即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种由现实中的感性具体，经过抽象，再到思维中的具体的认识方法，就是科学抽象的方法。恩格斯也阐述过应用科学抽象的方法去认识历史的重要性，他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③ 列宁曾经揭示过《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指出："《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④ 列宁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抽象的重要意义和基

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

本要求，他指出："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①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上述思想，总结了新的实践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实现第一个飞跃，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② 其二是"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③ 在这里，第一个条件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早就有了的，第二个条件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思想并结合新的实践经验而作出的新概括。这是把辩证法具体地应用于认识论，就是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丰富的感觉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去粗取精"，就是经过分析，把材料中那些次要的、不典型的、非本质的东西去掉，把那些主要的、典型的、本质的东西保留下来；"去伪存真"，就是对材料要鉴别真伪，去掉假的，保留真的；"由此及彼"，就是研究事物的来龙去脉，对材料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由表及里"，就是在分析材料时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发现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总之，经过科学抽象，要达到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看问题，把握事物的特点、本质和规律。经过这样的概括，人们对认识过程的辩证运动就有了更生动更具体的了解了。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十六字诀的科学抽象方法，是对辩证逻辑的重要贡献。从逻辑上说，这一科学抽象的过程，就是由丰富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同时，这一科学抽象的过程，也包含着或联系着分

---

① 《列宁选集》第38卷，第181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268页。

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逻辑方面的内容，并丰富和深化了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的著名原理。

(二)关于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

什么叫精神变物质？这就是指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也就是用理论指导实践，把精神力量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明了第二个飞跃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强调指出：第二个飞跃比起第一个飞跃来“更重要”，“意义更加伟大”。他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他还指出：“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②为什么？因为：第一，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第二，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实际地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在这里，我们将着重深入地探讨一下关于精神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是否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③这里，我们先撇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物质性的矛盾关系不谈，专就实践与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类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关系来谈谈精神对物质的巨大反作用。为什么说精神的东西在一定条件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正是坚持了辩证唯物论，避免了机械唯物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②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第一，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讲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不是在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这个本原意义上说的，而是对物质与精神在具体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关系来说的。列宁曾经指出：“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① 可见，列宁是区分了物质与意识的对立在本原意义上的绝对性与在具体发展过程中的相对性的。这里，毛泽东同志说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东西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正是在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个唯物主义前提之下，来考察物质与意识在具体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而且，在这种物质与意识的具体发展过程中，一般说来，是物质的东西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东西才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更何况，这种一定的条件，也是由物质与意识的矛盾运动造成的，而不是主观设定的。实践证明，这种具体的辩证考察非常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在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深入地研究物质与意识的具体矛盾及其发展变化，从而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列宁在批判俄国自发论时曾经明确指出：“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该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② 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与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个论断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因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第二，这种“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是在意识的反作用的范围内说的。在考察意识的反作用时，可否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

---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47—148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62 页。

一定条件之下，这种反作用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到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种含意，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已经有过。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 恩格斯指出：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状况是基础，还有上层建筑各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②。恩格斯并且揭示了精神反作用的三种情形和不平衡性。他还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③ 列宁对精神反作用的论述就更丰富、更深刻了。除前面我们已经引用的几段话以外，列宁还指出："**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④ 可见，毛泽东同志作出上述论断是有理论根据的，是在意识反作用的范围内来谈精神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之下才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这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

第三，这种"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是在矛盾的主次方面可以转化的意义上讲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当考察到"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内容时，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实践和理论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针对这种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肯定了矛盾的主次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普遍性。在这里，问题不在于否定某些矛盾、某些矛盾的主次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关键问题是要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尤其是分析矛盾的主次方面转化的条件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3页。

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① 这个思想对我们分析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也同样适用。

第四，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来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②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使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成了自为的阶级，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使革命实践由在黑暗中徘徊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分析了当时俄国和国际上各种矛盾的发展，指出在当时的俄国"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③于是，列宁在秘密状态中，在艰苦条件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写成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及时地给俄国无产阶级举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正确的理论武装。从中国革命的纵过程来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革命屡遭失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凡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坚持正确路线的，中国革命就胜利，就发展；凡是不实行这种结合的，甚至推行错误路线的，中国革命就受挫折，遭失败。再从国际革命的横剖面来看，早在一九一三年，列宁在《亚洲的觉醒》、《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及以后的许多著作中，对亚洲的中国、印度、印尼、土耳其，波斯(即今伊朗)等国的革命风暴的兴起欢欣鼓舞，认为是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希望所在，可是时隔几十年后，为什么在上述国家中，只有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了呢？而那些客观条件与中国大致相近或基本相同的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

家却不能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胡耀邦同志在庆祝党的六十周年大会上说得好："六十年来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要有一个能够确立和坚持这条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①可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在一定条件下，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对革命运动的推动和发展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总之，毛泽东同志是在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的前提下，又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东西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既跟唯心论划清了界限，又避免了机械唯物论，而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

二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上述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实践和认识发展的过程，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和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一)明确地概括了真理发展的规律

真理发展的过程，既是真理战胜谬误的过程，也是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关于真理和谬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恩格斯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

① 1981年7月1日《人民日报》。

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①列宁指出："任何真理，如果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②又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③

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实践条件下，明确地把真理战胜谬误作为认识发展的规律提了出来。他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④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科学概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揭示了认识发展过程中一个方面的本质，即真理不仅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而且必定会战胜谬误。这比起恩格斯、列宁关于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思想，深化和前进了一步。

第二，把认识论、伦理学、美学三者联系起来考察，并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规律。这对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第三，根据真理发展的规律，指出共产党人应当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革命大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17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为重。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① 因此，我们应当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热烈地追求真理，勇敢地捍卫真理，坚定地为真理而斗争。我们应当坚定地实践这样的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②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必须从实际出发。这与从人民利益出发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既不能凭主观想象或一时热情，也不能照搬"本本"或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时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③ 因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把党的任务和政策变为人民群众的行动，以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④为什么？因为真理是反映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人民只要掌握了真理，就能所向披靡，百折不回。所以，无产阶级在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由于手中有真理，身边有群众，就能够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光明磊落，无所畏惧。

（二）进一步深化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

---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4、104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5页。

思维的真理性"①。恩格斯则说：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②还说："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的。"③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指出："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④还说："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⑤又说："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⑥

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上述思想。他不仅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强调说明是唯一的标准。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⑦又说："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⑧他还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⑨

毛泽东同志不仅指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进一步从实践观点与群众观点的一致上，阐明了实践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⑩认识只有到社会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如果达到预想的结果，则这种认识就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不符合客观外界规律性，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则这种认识就被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7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30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⑥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7页。
⑦⑩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⑧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单行本），第2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理由就在这个地方。”①由于社会实践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实践，而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②这就深刻地阐明了真理标准的客观性。

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列宁曾经提出了一个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问题。他说：“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③所谓实践标准的确定性、绝对性，说的是一切认识、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判定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所谓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相对性，说的是实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驳倒一切认识、思想和理论。然而，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一点讲，它又是绝对的、确定的。

毛泽东同志发挥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思想，并阐明了它为什么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他说：“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④这就是说，要辩证地看待实践标准，一方面，实践对一个认识的证实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在实践中“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④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2页。

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① 另一方面，一个认识的正确与错误，终究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成功或失败的检验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深刻地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

在论述认识发展的辩证法特别是真理发展的辩证法时，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②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结论，首先对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问题的争论作了科学总结，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这一结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和真理总是具体的思想。关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不少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指出：“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③ 恩格斯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④列宁强调：“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⑤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⑥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它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⑤ 《列宁选集》第1卷，第507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①例如，在对时代问题的分析和战略策略的决定上，列宁指出，要正确地认识时代，就要判定"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②斯大林也说："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③。

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都必须注意它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不能笼统地、抽象地加以看待。即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说，应当看到，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实践的情况不同，而且在同一历史时代，各国实践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或很不相同；至于在同一个国家处于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它的不同地区，实践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在应用理论于实践的时候，必须依据不同情况，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实践的不同情况，才有可能使理论和实践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同时，对理论本身也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任何一种理论，总是前人和今人对实践经验的总结，马列主义理论也是如此。然而理论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虽然这种理论可能揭示了事物的某些、某类或普遍性的本质和规律，具有指明方向、预见未来、指示方法的作用，但理论不可能穷尽对事物的认识，并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实践却是活生生地向前发展着的。因此，在理论回到实践中去的时候，必须研究实践中新出现的东西，研究同样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变化等等复杂的情形，使理论在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证实、补充、纠正和发展自己。

第二，这一结论深刻地揭示了党内不同政治路线的认识论基础。在从一九二一年党的成立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段时间内，党内曾经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种机会主义的代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推行了一条以主观主义为特征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

③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9页。

的错误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到了两次失败。这种错误路线，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却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①，它们都是离开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总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各时期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地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这种正确路线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为其思想基础的。可见，毛泽东同志上述结论揭示了两条对立路线的认识论基础。

（四）自觉地应用真理发展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了国际上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方面经验，自觉地应用真理发展规律，于一九五六年为我国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既是发扬学术民主、繁荣科学和文化的方针，也是发扬政治民主、巩固和发展我们国家的方针。

鉴于我国社会还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又迫切需要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而科学、文化实践中又存在着各种是非、真伪问题。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②只有承认各种矛盾，应用真理发展的规律，自觉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才能够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③

双百方针也是我们党领导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毛泽东同志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

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①"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②放，就是放手让大家提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这是对真理发展规律在政治实践中的实际应用，是完全合乎辩证法的。鉴于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发展经济和文化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③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一方针，在实践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表明，凡是正确地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我们国家的科学和文化就满园春色，欣欣向荣；政治上就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经济上就蓬勃发展，蒸蒸日上。而当林彪、江青一伙横行之时，他们取消政治民主和学术民主，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其必然结果是：科学战线冷冷清清，文艺园地百花凋零，教育领域受害最重，各条战线后继乏人。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正确处理四项基本原则与解放思想、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纪律的辩证关系，逐步地在我国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三　认识的多次反复性和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认识的辩证法时，深刻地阐明了人们认识的曲折性和反复性，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415页。

（一）一个正确认识往往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人的认识，总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的认识总会出现曲折性和反复性。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① 又说："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②。列宁关于认识的曲折性和前进性有更多的论述，他曾指出："真理是过程"③。"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④ 可见，无论恩格斯还是列宁都认为正确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一次完成的，而是多次反复、曲折前进的。

毛泽东同志发挥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他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⑤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第一，这在人类的整个认识运动中，区分出一个正确认识和整个人类认识这样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过程，这就深化了对认识运动的了解。

第二，这揭示了认识运动的一个规律，即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可以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对列宁关于"真理是过程"、"真理是具体的"等思想是进一步的发挥。

第三，这一论断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地统一了起来。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应当把握认识的曲折性和前进性，防止和克服认识的直线性和片面性。因此，在实践中，一方面在困难的时候不能失去信心，消极低沉，甚至一蹶不振。另一方面，在顺利的时候，又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断前进，在实践中不断开创新局面。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561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5、411页。

⑤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7页。

(二)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关于人类认识运动总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过许多精辟的见解。恩格斯指出："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① 又说："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② 人类认识就是这样无限地接近客观世界本身。

列宁指出："人不能完全把握＝反映＝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③他还指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④ "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⑤ 可见，列宁指出了人类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前进的无限过程。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思想，总结了新的实践经验，明确地概括出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⑥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科学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这一认识总规律，贯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全部内容。这就是说，认识的无限发展过程是实践和认识这对矛盾的辩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126、160—161页。

③④⑤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239、278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证运动过程。这就把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认识运动总规律的思想从理论上提高了一步，并具有了更简洁、更明确、更完整的理论形态。

第二，这个科学概括，还揭示了认识运动总过程，实践和认识之每一规律性的循环，在形式上是循环往复的，而内容上则是前进上升的，每一循环都进行了高一级的程度。这是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第三，这一科学概括，还揭示了人类认识过程就是实践和认识这对矛盾的辩证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由无数圆圈（即无限的循环）组成的无限前进和上升的曲线。这丰富了列宁的“螺旋形曲线”的思想。实践表明，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终极真理”。实践是发展的，真理也是发展的。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①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也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第四节　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② 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逐步摸索出了一整套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工作方法，使我们党和群众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刘少奇同志说：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页。

毛泽东同志不仅把群众路线看作是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看作是一条认识路线。继马克思把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之后，毛泽东同志又把群众观点引入了认识论，把群众路线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紧密地结合起来，有机地统一起来。

一 群众路线与认识论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中，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并作出了系统的论述。

(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不断变更的历史。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必然得出社会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样一个结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提出了并且反复申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科学论断。他们在同唯心史观作斗争中，着重从历史观上阐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同志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这一思想，不仅从历史观上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 而且又进一步从认识论上阐述了人民群众的重大作用。因此，他要求领导者必须实行群众路线，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

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毛泽东同志把实行群众路线，提到了认识论的高度，从而把历史唯物论中的群众观点与辩证唯物论中的认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毛泽东同志把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但提出了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想，而且还科学地解决了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结合的途径。他认为，蹲点、解剖麻雀、种试验田等等都体现了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结合。例如搞“试验田”就是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结合的一条主要途径。毛泽东同志号召在干部中普遍推广“试验田”。他在《工作方法十六条（草案）》中说：“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在农村是实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这就是要求各级领导者亲自参加实践，取得直接的经验。因为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同志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命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② 搞“试验田”就是要领导到实践中去，从具体的事物入手，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得到正确的认识，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

搞“试验田”又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十分重要的方法。搞“试验田”，领导者就必须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的经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然后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毛泽东同志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做到胸中有全局，手里有典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面”的领导方法。

当前，我们国家正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对改革，我们既要认识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分期分批地，循序前进。既不能犹豫观望等待不办，也不能一哄而起一刀切。这样做看起来好象慢，实际上不会慢，因为这样才能避免走弯路。如果出了偏向再来纠正，损失更大，花的时间更长。总之，改革要走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路，边做边摸索规律，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

毛泽东同志还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

民主集中制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根本的方法。要走群众路线就必须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只有把广泛的群众意见进行正确的集中，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同志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① 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同时又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讲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在这里，他把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正确的认识世界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单行本），第 8 页。

和改造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就是说，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彻底的坚持群众路线，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二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认识运动的规律性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论断，充分体现了人们认识运动的规律性，同人们认识的秩序是完全一致的。

（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取得正确的认识，然后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纠正，完善，丰富和发展已有的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公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过程的一个概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过程的这一公式。

“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就是深入群众，投身实践，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把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经过分析研究，化为系统的集中的意见，形成理论、思想、路线、政策的过程，也就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把集中起来的意见，把制定出来的理论、思想、路线、政策，再回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和行动，并在群众实践中检验，补充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从认识回到实践的过程。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往往必须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从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提高，认识就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使实践和认识不断深入和发展。因此，否认群众，否认党的群众路线，就必然否认实践，否认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反之，亦然。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过程

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把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也就是将十分生动而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毛泽东同志说：“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①而把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指导，化为群众的意见，就是从理性认识再回到革命实践的过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②。

可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认识运动的两次飞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③ 紧接着又说：“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④ 在实际的领导方法中就表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在实际工作中，由特殊到一般，就是领导者首先要从下级个

①②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中取得具体的经验。从个别单位的具体经验中，总结出一般规律，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形成一般号召。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讲，就是要人们首先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或认识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再从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中进一步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这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来，集中起来的过程。

由一般到特殊，就是把领导者通过个别指导所形成的一般号召贯彻到群众中去，再进行个别指导，在个别指导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不断地总结新的经验，做出新的指示。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讲，就是人们认识了不同事物的共同本质之后，就可以以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作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找出更加特殊的本质，来补充、丰富和发展对已有的共同本质的认识。这就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也就是到群众中去，坚持下去的过程。这表明，认识运动的秩序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可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方法和群众路线,而且是一个认识方法和认识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论断，一方面，使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给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群众路线的运用，又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三　把群众路线概括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同志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坚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人类认识史，总结了社会实践经验，

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思想，提出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一整块钢铁的观点，并强调指出它们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他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①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把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群众观点引入了认识论，把他所创立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并揭示了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就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一整块钢铁的思想。

在毛泽东同志那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充满着辩证法思想，诸如领导与群众、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这就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二)提供了防止命令主义，避免尾巴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又提出了：“先民主，后集中”的工作方法，也就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为我们党在实际工作中提供了防止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避免了落后于群众的尾巴主义的思想武器。

人民群众实践所获得的认识是最直接、最生动的，也是最丰富、最广泛的，他们最有发言权。群众不仅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因此，领导者必须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无产阶级领袖之所以正确，不在于他的天才，而在于他善于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发扬民主，倾听群众的意见，总结群众的经验。斯大林说：“官衔本身并不提供知识和经验，称号就更不用说了。”“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还不足以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

实行正确的领导，因此必须以群众的经验、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人民的经验来充实自己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要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普通党员的呼声、所谓‘小人物’的呼声、人民的呼声。”①这就是说领导者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意见，才能不脱离群众，防止命令主义。

同时，领导者还要善于正确地集中群众的意见，把群众在三大革命实践中获得的直接而生动、丰富而广泛的认识正确地集中起来。因为群众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就全局来讲，毕竟还是分散的无系统的感性认识(这并不排除局部的理性认识)其中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有真实的，也有不真实的。因此，领导者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正确的集中，使之上升到理性认识，引导群众在认识上提高一步，敢于领导群众前进，不要成为落后于群众的尾巴，要坚决反对削弱党的领导的尾巴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②

因此，民主——集中——民主的领导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它既是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强有力武器，又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贡献，富有中国的特色。

第五节　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

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一对重要

①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4页。

范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人类认识史，并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对范畴的理论。

一　关于客观规律性

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和关系。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列宁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得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毛泽东同志研究了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发展规律，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可见，要揭示事物的本质，把握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性，就必须研究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复杂斗争中怎样去研究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呢？对此，毛泽东同志作了具体的论述。

（一）从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结合上，着重阐明了规律的客观性

列宁曾经从不同的方面给规律下过定义，他指出："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①又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②

列宁在同唯心主义作斗争时阐述了规律的客观性，并以是否承认规律的客观性而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他说："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其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主义。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这是唯心主义。"③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规律的客观性，指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1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167页。

人们可以发现规律，认识规律，研究规律，掌握规律，并可以利用它为人类服务，但是人们却不能违背它，“不能改变或废除它”，更不能制定或创造规律，否则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列宁斯大林的思想，明确指出，规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并强调指出，这种联系是客观事物内部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因此，他一再告诫说：“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就从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的高度，阐明了规律的客观性，以及如何正确把握和研究客观规律的一个根本方法。

（二）从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上，着重强调了研究特殊规律的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批评了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指出：“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①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的事物。他认为，研究客观规律也应如此，不但应该注重研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应该特别注重研究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致力于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从中国的特殊矛盾入手，根据中国的国情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个变化，即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种新形势决定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任务，使它具有新的特点。因为，中国既不同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当时的俄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情很复杂，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和控制。因此，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结在一起，复杂而尖锐，这就构成了中国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矛盾体。这个特殊的矛盾体存在着特殊的问题，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因此，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

但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内却盛行着教条主义，他们无视中国革命这个特殊矛盾和它所具有的特殊的发展规律，而是一味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强调普遍规律。当时，德波林学派的哲学颇为流行。德波林哲学是一种主观的、片面的、抽象的思维方法，其特点是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政治，脱离当时的阶级斗争。它在共产国际内部和我们党内曾经发生了极坏的影响。共产国际中的一些人把俄国的经验绝对化，用它来套中国革命；而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王明也机械地照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根据西欧和俄国的情况分析而提出的一些具体的结论，机械地搬到了中国，自以为是不可改变的公式，拒绝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作深入地调查研究，否认中国革命有它的特殊性，拒绝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它的特殊发展规律。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王明曾说过："要百分之百地相信共产国际。"他极力主张，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得照办，凡是苏联的经验就得照样学。他拒绝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拒绝去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结果，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惩

罚。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坚决抵制和批评了共产国际和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斗争中，在总结历史经验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研究马列主义要“有的放矢”，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实践表明，只有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从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入手，才能把握住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而王明教条主义否认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不懂得特殊和普遍的辩证法，不承认差别，抹煞矛盾的特殊性，结果便离开了规律的客观性，弄得一无是处，到处碰壁。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又找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三）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要有一个过程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得出来的科学结论。

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在实际工作中犯过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①比如，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怎样进行革命斗争，是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资产阶级允许的情况下进行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7页。

合法的议会斗争呢，还是首先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呢？这个问题在开始的时候并不十分清楚，所以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后期出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革命的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方针。但是，这一正确方针开始并没有被全党所认识，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是一味地鼓吹“城市中心论”。王明上台以后，极力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妄图以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指挥一切，结果使中国革命力量和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推迟了多少年！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曲折过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才认识到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认识到了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

对民主革命的规律认识有个过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认识也有个过程。夺取政权以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是没有经验的。建国后，我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比较迅速和顺利，后来又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制裁。实践表明，在工作中，错误和挫折总是难免的，但是要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从挫折中去认识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掌握它的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毛泽东同志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①

---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8—19页。

二　关于自觉能动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①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在《实践论》、《矛盾论》及其他哲学著作中，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自觉能动性作了深刻的论述，进一步发挥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理论。

（一）阐明了自觉能动性的内容和特点

毛泽东同志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把主观能动性表述为自觉能动性，揭示了自觉能动性的内容和特点。

其一，自觉能动性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它包含着思想和行动两方面。人们在反映客观对象时，总是为着实践的需要，怀着一定的目的和动机。人们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先在头脑中形成所要达到的目的，制定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然后付诸于实践。人们一切活动的全过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思想蓝图和预定目的而展开的。恩格斯说过："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6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①

其二，自觉能动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它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在战争中，人类自觉能动性表现得最突出、最鲜明、最生动，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显著的特点。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②

其三，自觉能动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就是说，自觉能动性不仅包括着认识，更主要的还包括着实践，把主观的蓝图转化为客观的现实。正如列宁说的："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③

（二）论述了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及其实现的基础和条件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④他接着又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⑤他还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⑥在这里，毛泽东同志论述了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及其实现的基础和条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⑤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446、454—455页。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战争胜负的可能性是由作战双方客观物质条件决定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去期求战争的胜利，这就坚持了唯物论，反对了唯心论。同时，他又指出，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在客观因素具备着胜负可能性的条件下，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时自觉能动性就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要使自觉能动性得到实现，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就必须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和条件的基础上。战争如此，一切工作均是如此。

第一，必须认识和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客观的物质条件，这是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基础。比如，只有从战争实际出发，建立在符合战争客观规律基础上的思想、计划、方案，才是正确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 这里，毛泽东同志用形象、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客观物质条件和自觉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只有在掌握客观规律和认识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去夺取胜利。

第二，具体实践是发挥和实现自觉能动性的根本途径。就是说，要发挥和实现自觉能动性就得去实践。比如战争，就是要去"指导战争和实现战争"。战争既然是有目的的活动，就必须通过具体的战斗去达到目的。为了消灭战争，只有去进行战争，为了消灭敌人，只有去进行战斗。因此，战争中自觉能动性实现的过程，就是战争的实践过程，通过实践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解决战争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完成战争的任务，实现战争的目的。再如，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党的十二大设计的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工程，就必须化为亿万人民的实际行动，去实践，去战斗，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离开群众实践，所谓战略、战术、计划、方案，只能是镜花水月，纸上谈兵。

第三，在实践中，要把领导的自觉能动性和群众的自觉能动性结合起来，群众是实现自觉能动性的主体。在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强调战争指挥员要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士兵和群众的自觉能动性。他说："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①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全民族实行抗战"的方针，后来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又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还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充分动员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战中去，把部队指挥员的自觉能动性和群众的自觉能动性高度结合起来，进行一场反侵略的人民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这就从历史唯物论和认识论统一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自觉能动性的理论。

（三）指明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是自觉能动性的突出表现

毛泽东同志在其军事著作中，对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这些作战指挥问题，也是战争中自觉能动性的突出表现形式。

主动性——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自觉能动性时，还谈到主动性，并阐明了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他说："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②紧接着说，而"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③这从不同的侧面讲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5页。

了二者的区别和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强调了把握主动性的极端重要性。主动性是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特别强烈的表现。因为，主动权是战争胜利的关键，“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① 为此，战争双方，无不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主动权只是聪明的领导者虚心研究和正确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它“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② 那末，如何去争取呢？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第一，要正确估计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要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第二，要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总之，要使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灵活性——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指出：“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③ 还说：“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④ 他一再强调，要经常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等。这些方法都是主动性的表现。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懂得一些具体作战的战术或方法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因为，“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⑤ 所以，他说：“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⑥只要有这种“运用之妙”，在符合客观情况基础上，就能够改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对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和击破敌人，夺取最后胜利。

计划性——夺取胜利的基本保证。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5页。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1、38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性，要实现计划性于战争，同要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物和工作比较起来，要困难得多。但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能离开计划性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① 战争的指导者应根据战争的特点，尽可能制定严密的计划，一切行动要有预先的准备工作。诸如，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备、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应当过细考虑、检查执行。“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② 因此，不论是战略计划、战役计划、还是战术计划、都应当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也应当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这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③ 这里主要的是，要努力地做到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取得军队的行动自由权。

综上所述，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都极大地表现了自觉能动性，表现了主观能力的发挥。战争如此，其他一切工作莫不如此。

三 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

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主观与客观、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关系的表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④ 列宁说过：当人们不知道自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

然规律的时候，人们是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但一经认识了规律，便成了主人。恩格斯和列宁都阐明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对自由和必然规律的辩证关系又作了新的概括。一九六〇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他所作的《十年总结》中说：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一九六二年一月他又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①“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②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明了，自由不仅是对必然的认识，而且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哲学总结，也是对自由和必然这对哲学范畴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新概括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他把实践作为自由和必然统一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基础上，还揭示了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发展规律。他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5—16页。

② 同上，第27页。

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①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通过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既反对了骄傲自满、停止不前的错误思想，又反对了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错误倾向，同时指出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反复的过程。这就给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把从必然向自由转化的规律同人类认识的总规律统一起来了，把发挥自觉能动性实现自由的过程同认识过程统一起来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辩证法的思想，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思想。

① 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第三章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是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和活的灵魂。唯物辩证法象一根红线一样贯串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和整个实践之中。

毛泽东同志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创造性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并总结国内和国际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论述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们首先谈谈他对辩证法最主要的、最突出的贡献，即对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所作的系统而深刻的说明和发挥；其次，我们还要说明他对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运用和发展。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其内容异常丰富多彩。人类对对立统一规律丰富内容的认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入。毛泽东同志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内容及其在辩证法科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作了明确的、系统的说明。

在古代，中国的哲学家如孙子、老子等就已认识到事物内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推动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认识到矛盾着的双方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而且还猜测到矛盾双

方有主次之分。古希腊的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也天才地猜测到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是世界的基本规律。

在近代，黑格尔是第一个有意识地从理论上论述辩证法的人。他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些重要范畴：同一、差别、对立、矛盾进行了辩证的说明。黑格尔虽然主观上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当作构造自己体系的最主要的杠杆，但我们只要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上看问题，那同样可以发现对立统一规律仍然是他辩证法的中心内容。他的《逻辑学》就是概念自身矛盾运动的体系。他明确指出："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说矛盾不可设想，那是可笑的"，①"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极为重视。恩格斯认为，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编(即论述矛盾学说的部分)"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③。列宁在谈到"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时说："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把他的唯心辩证法重新倒置过来，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明确地把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规定为辩证法的三个主要规律。他们虽然没有能详细考察这些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但他们在具体运用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思想是异常鲜明的。早在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方法就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⑤恩格斯

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258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9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也指出，两极既对立，又统一，“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①]。在《自然辩证法》中，他更明确地说：主观辩证法“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②]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商品以及货币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揭示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典范。因此，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把对立统一规律看成是辩证法的最主要内容，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马克思恩格斯所注意的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上。他们也曾希望能系统地论述唯物辩证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

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明确把对立统一规律规定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并加以论证的则是列宁。他在《哲学笔记》里，继承了赫拉克利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思想，总结了时代斗争的经验，多次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把辩证法定义为关于对立面同一的学说。[③]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等著作中，系统地发挥了列宁的思想，进一步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一　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上，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

在哲学史上，一般只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看作是两种宇宙观的对立，而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只看作是两种思维方法的对立。列宁揭示了两种发展观，他说：“有两种基本的（或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

③ 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111、240、278、285、407页。

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见到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①在这里，列宁指出了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对立面的统一。辨证法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是对立面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系；形而上学则否认对立面的统一，把发展看成简单的数量的增减。辩证法的观点是活生生的，而形而上学的观点则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

毛泽东同志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看作是贯串整个人类认识史的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这对吗？对的。因为客观世界既是物质的，又是运动的，是运动着的物质。所以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问题，是世界观问题。世界是运动发展变化的还是静止不变的，以及如何运动变化的问题，同样也是世界观问题。整个哲学史除了贯串着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之外，还贯串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这一观点是一贯的。在《矛盾论》中，他把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观与形而上学观的矛盾看作是构成哲学不同于其他科学的特殊矛盾，构成哲学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一九五七年，他在谈到哲学里边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时说：“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②。以后，他在一些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里，又多次强调过这一点。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思想是符合整个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它对指导哲学史的研究和进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我们也不能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思想，得出有两个哲学基本问题的结论。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问题，比世界是运动发展变化的，还是静止不变的问题更为根本，两者不能并列。划分哲学基本派别的只能是前一个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二　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上，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不仅指出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根本缺陷在于：“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则“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和他周围的其它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① 他用简明易懂的例子有力地说明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一切事物中包含着矛盾方面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斗争，决定了事物的生命，推动了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所以，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唯物辩证法主张“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但它并不排除外部的原因。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互相联系着的。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如果否认外因、外部条件的影响和作用，那就割断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陷入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他以自然界和社会发展中的大量事实，科学地论证了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深刻地说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的原理。他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276页。

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①。这就既有力地驳斥了外因论或被动论，又防止了只讲内因，否认外因作用的另一种片面性，从而补充和丰富了前人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又反复阐明了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方针。他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②又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又一再说明这一方针，他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方针是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光辉运用，它是我国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对第三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发展民族经济也日渐产生巨大的影响。

恩格斯曾指出：“旧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原则”。④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全部形而上学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反动的同一律，全部辩证法也只有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91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8页。

个中心，就是革命的矛盾律。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又一再指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①。又说："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②因此，学习辩证法，最主要的是弄懂对立统一规律。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也就"在根本上懂得了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进一步说明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根本对立之所在，划清了两种对立宇宙观的界限，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三 从对立统一规律同辩证法其他规律之间的关系上，指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理解辩证法其他规律的钥匙

列宁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时曾指出：只有对立统一的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③ 列宁还把量和质的互相转化等等看成是对立统一的实例④。列宁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与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为要确立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详细地阐述对立统一规律和其他规律及范畴的主从关系。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专门地说明列宁上述思想，但他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丰富内容的过程中却具体地发挥了列宁的思想，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同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关系，说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实在内容，是理解其他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② 《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239页。

律和范畴的钥匙。

在论述矛盾特殊性时，毛泽东同志指出了事物的质与矛盾特殊性的内在联系。他说，事物的特殊矛盾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他根据矛盾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和复杂性说明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他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步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① 这说明，在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虽然事物的根本矛盾和由此矛盾规定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但由于事物根本矛盾的逐步激化和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的复杂变化，事物的某些方面或某些局部可以发生质的变化，使事物发展过程显出阶段性来，揭示了总的量变过程中存在着部分质变的深刻根源。

毛泽东同志还分析了矛盾运动与量变质变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发生变化。在分析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时，他又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② 当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时，尽管矛盾双方处于不断的斗争状态，但事物仍然只处于量变过程中。只有当这种量变到一定阶段，达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307页。

到一个最高点，矛盾的主次地位发生转化时，事物的性质才发生变化。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分析表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量变质变的实在内容。

在论述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原理时，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他说："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① 这一分析揭示了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真实内容，指出了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必然趋势和事物发展过程的曲折性。

由此可见，对立统一规律是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在内容，而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和具体化。

四　从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认识的根本规律

在《哲学笔记》中，列宁曾多次指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一致性；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立统一规律不仅是客观世界的规律，而且也是认识的规律。他批评了普列哈诺夫等人对此的忽视和不了解②。

在抗大讲课时，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列宁的上述思想，并多次进行了论述。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是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之最一般的发展法则。它是一切具体科学中有价值的一般内容，及人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298页。

② 参看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410、407页。

的其他科学认识之总计、结论、加工和普遍化。因此，它是真正科学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基础，是研究具体科学的唯一确实的、有客观真实的方法论。他以通俗的语言深刻地说明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的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在《矛盾论》里他又说："事物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①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从理论上说明了列宁关于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他把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对立统一规律是认识的规律具体化了。他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② 在《矛盾论》里，他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学说的每一具体原理时，不仅说明了它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且还指出它的方法论意义。如，他在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后指出，矛盾分析的方法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最根本的认识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又如，他对矛盾特殊性的论述，具体地告诉人们如何分析矛盾，如何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等等。可以说，整个《矛盾论》鲜明地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

总之，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心和实质。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他从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对立统一规律与其它规律的关系、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等方面，对列宁的思想展开了说明和论证。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重申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反复教育人们不仅要在口头上承认这个规律，更主要的是要善于运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各种矛盾。在他看来，能否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是关系到能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能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在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根据国际和国内的新经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不要把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平行地并列起来，平行地并列是三元论，而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统一。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是在总结了列宁逝世以来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教训而作出的理论概括，是对《矛盾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当然，在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即在强调辩证法的一元化时，决不能贬低，更不能否认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作用。如果认为辩证法只有一个规律，学习辩证法只需学习对立统一规律，而无需学习其他规律和范畴，那就会导致把辩证法的丰富内容简单化，肢解辩证法的科学体系，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各种矛盾。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反对把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平行地并列起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贬低或否认辩证法其他规律作用的倾向，努力做到全面地把握辩证法的科学体系。

第二节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

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内容时，毛泽东同志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问题入手，然后再着重分析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最后又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安排，反映了人们对矛盾的认识过程。

一　明确地提出了矛盾普遍性的两种含义，坚持了彻底的矛盾辩证法

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有很多论述，《矛盾论》也引证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最有名的话。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①。这里应指出的是，经典作家所强调的是每一个事物、现象都包含有矛盾，强调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他们虽然也谈到每一事物的自始至终都贯串着矛盾，但没有强调这一点。苏联的德波林学派认为，事物的发展经历"从单纯的同一，经过差别和对立，达到于极端的矛盾"等几个阶段。这样，在他们看来，矛盾并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在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在批判德波林学派的错误时，强调了事物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运动，认为"在每一差异中已经包藏着矛盾"。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思想，把矛盾的普遍性明确地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②。毛泽东同志的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280页。

这一概括是对前人关于矛盾普遍性思想的总结和深化。这对反对形而上学，把辩证法贯彻到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黑格尔曾指出："在运动、趋向等等中，表象由于这些规定的单纯性，不能发现矛盾"。列宁肯定了这一思想，指出，矛盾"被单纯性掩盖住"①。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确实出现过矛盾"被单纯性掩盖住"这种情况。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已基本上被消灭，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也已基本上消灭。全体人民团结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取得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这种情况就产生了一种假象，似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完全适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已不再是矛盾，而是全体人民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因此，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不了解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在三十年代末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苏联的理论界曾占统治地位，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坚持矛盾普遍性原理，坚持把辩证法贯彻到底，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批评和纠正了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的形而上学思想。在《论十大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党内团结的辩证法》等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一分为二是个普遍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必须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8页。

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不同的只是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还具体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种矛盾。他重申了《矛盾论》中“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的名言，指出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仍然会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革命。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对无矛盾论的批评，为我们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在于揭露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反复教育全党，不应害怕矛盾，回避矛盾，而应正视矛盾，敢于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他说：“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① 他还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② 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采取什么态度，是承认它，解决它，还是否认它，掩盖它，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的庸人之间的重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页。

分歧之点。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在认识事物时，必须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必须坚持两点论，两分法，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因此"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① 对我们的工作，对一切人和事，都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坚持两点论。当然不同的事有不同事的两点，不同的人有不同人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② 毛泽东同志所阐发的"一分为二"、"两分法"、"两点论"的思想方法，已为愈来愈多的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不断前进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创立了矛盾特殊性的学说

关于矛盾特殊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些精辟的见解。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中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③ 这就是说，要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必须认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一方在矛盾中所处的地位。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

① 《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第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

地分析具体情况。"①他又说过："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②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矛盾特殊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中，体现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中，他们并没有着重从理论上考察矛盾特殊性的原理。

中国革命的特点，特别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斗争的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矛盾特殊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社会复杂而又曲折的矛盾运动，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又为研究矛盾特殊性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在《矛盾论》中对矛盾特殊性原理作了详尽的创造性的考察，并在革命的实践中作了杰出的运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首先，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阐明了认识矛盾性的重要性。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同志基于中国革命血的教训，详细地论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与战争的特殊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研究战争特殊规律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研究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时，"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③毛泽东同志详细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论述了认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④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拒绝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反对毛泽东同志为红军制定的并为实践证明正确的战略战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红军由三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十万人降到几万人。毛泽东同志指出，“左”倾冒险主义者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他们忘记了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他指出，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他还从人类认识运动的正常秩序来说明认识事物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他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① 他深刻地揭露了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认识矛盾特殊的重要意义，不懂得人类认识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这样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教条主义者拒绝对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

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归根结底在于，只有认识了矛盾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殊性才能找出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因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比如，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从巴黎公社至十月革命，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这是符合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情况的，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是不是也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这个问题，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没有能正确解决。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认为："不能抛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只有到"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才能组织农民苏维埃。① 共产国际的一些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直到一九四〇年，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中国共产党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②。毛泽东同志根据对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的科学分析，在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但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不少同志，离开中国革命的特点，盲目搬用外国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经验，醉心于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攻打大城市，坚持"城市中心论"，而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理论和实践诬之为"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右倾保守"。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弄得很坏。

其次，毛泽东同志详细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

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矛盾特殊性就是要研究"各个物质运动

---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490—491 页。

②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78 页。

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等五种情形，这五种情形归结起来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和把握矛盾的特殊性。

一是，要研究各种不同事物、不同矛盾的特殊性。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矛盾，不能一律看待，必须分析其不同的特点。一个大的事物包含着许多矛盾，这许多矛盾也各有其特殊性，同样不能一律看待，必须分析其不同特点。

二是，要以发展的观点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特殊性，即研究同一事物发展的不同过程，或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的矛盾特殊性。毛泽东同志把中国民主革命过程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历史阶段，又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区分为好几个阶段，具体地分析不同阶段的特殊性，正确地制定了党在不同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不去具体分析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所发生的变化，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不能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变化了的情况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同样有必要把它区分为若干不同的阶段，分析它不同阶段矛盾的特点。

三是，要全面地研究矛盾诸方面的特殊性。列宁曾说过，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①。他又说：“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② 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上述思想。他指出，不了解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就不可能把握矛盾的总体，真正认识矛盾，“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1]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人们如何全面地分析矛盾。他还生动地揭露了形而上学片面性的种种表现、实质和危害，指出，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不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做好所任的革命工作的。

最后，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在分析矛盾特殊性时必须防止主观随意性。

列宁把观察的客观性看作是辩证法的第一要素[2]，强调辩证法要求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对概念的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中主义与诡辩"[3]。毛泽东同志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殊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了具体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殊性。"他还谆谆告诫人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4]后来，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也就是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要正确地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必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这些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294页。

精辟的见解，决不是马克思列宁思想的简单重复，它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

必须把辩证法牢牢地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上，在运用辩证法时必须反对和防止主观随意性，这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虽然强调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但在实践上，却并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矛盾，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对辩证法的运用离开了唯物主义基础，陷入了主观随意性。在口头上虽然也讲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就是要尊重群众。但在实际上却离开了辩证法，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致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遭受到不应有的挫折。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记取。

三　深刻地阐明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提出了“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著名论断

关于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有精辟的论述，并在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作了杰出的运用。列宁曾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① 把个别与一般的原理运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时，列宁又指出：“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

①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409 页。

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革命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①列宁的这些话深刻地揭示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时，进一步发挥了列宁上述思想。

首先，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说：“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② 这里所说的普遍性是指同一类事物所具有的共同矛盾或共同本质，所说的特殊性是指某一个（或某一类）事物区别于别的事物（或别一类事物）的特殊的矛盾或特殊本质。所以，这里所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指某一一定的范围一定场合而言的。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性的矛盾，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普遍性的矛盾，但这一矛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对于一般社会中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它又是特殊性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对整个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社会形态来说，是普遍性的矛盾，但它对整个宇宙来讲，又是特殊性的矛盾，因为它只存于社会运动这一特殊的运动形式之中。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这种相互联结、相互贯通、相互转化关系，要求我们在运用某一理论时必须具体地了解这一理论适用的范围和条件，既不能随意地加以缩小，也不能随意地加以扩大，更不能把适用于一定场合、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一定条件下的真理变成一种到处可以套用的公式或教条。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中，要善于区分哪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哪些只是适用于某个国家（或一类国家）而不具有普遍性的特殊经验，否则就要犯错误。

其次，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还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每一个事物是特殊与普遍、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所以，我们研究事物时，应当注意发现一事物内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两个方面及其互相联系，要善于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从个性中概括出共性，同时又要善于在普遍性的指导下具体地分析特殊性，以便进一步丰富普遍性。

毛泽东同志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实际工作的指导，提出一般与个别相结合，"解剖麻雀"，抓好典型等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典型调查，解剖麻雀，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通过典型示范，指导和推动一般工作。否则就会犯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贻误革命工作。

再次，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共性，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然而这种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而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

为什么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呢？

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贯串于对立统一学说的各个方面，是掌握对立统一学说的关键。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的结论中作了透彻的说明。他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而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共同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贯串过程的始终，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绝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斗争形式的区别。所以，我们只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时，才能真正把握对立统一学说的丰富内容，才算真正懂得辩证法。如果我们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对和绝对互相割裂开来，片面强调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否认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片面强调对立面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否认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形式的特殊性；或片面强调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否认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片面强调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形式的特殊性，否认对立面斗争的普遍性和绝对性，那就没有辩证法，而陷入了形而上学。

从实践上讲，这个问题是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如前所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贯串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所以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对科学地认识事物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世界上不同事物的矛盾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性，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所以要认识事物就必须进一步分析该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如果仅仅停留在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上，而不进一步具体分析该事物矛盾的特殊性，那么我们对事物仍然没有真正的认识。如，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

存在着矛盾，这对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若仅仅停留于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作具体的研究，那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仍然一无所知，并且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了解也是空洞的、抽象的。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所以认识事物就是要发现事物内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及相互关系。人类的认识秩序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这样两个过程构成的，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就不能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

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如果片面强调普遍性，否认特殊性，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包医百病的万灵药方，那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片面强调特殊性，强调本民族、国家的特点或新时代的特点，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作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就会导致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党历史上的教条主义者，拒绝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到处可以套用的教条，盲目地执行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有关中国革命的指示，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挫折。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同志反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关于矛盾精髓问题的概括，是毛泽东同志反对党内“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反对王明教条主义斗争的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正确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相互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才能避免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才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前进和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总之，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是理解和把握对立统一学说的关键，是正确地运

用辩证法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所以，毛泽东同志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提出，对于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对于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杰出贡献。

第三节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但是他们在具体运用辩证法的过程中却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时，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出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指出这一矛盾的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可避免地引起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还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根本矛盾所制约。列宁和斯大林在分析十月革命后苏联过渡时期的经济矛盾时，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抓主要矛盾的方法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也是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苏联过渡时期经济时告诉我们的方法。

关于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时，指出价值起主导的作用，在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时，指出生产力具有主导的作用。列宁和斯大林在分析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斗争时，指出社会主义因素起主导作用，新经济政策虽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不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的蜕变和资本主义的复辟。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

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复杂多变的情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

一　揭示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客观基础

毛泽东同志指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问题，是矛盾特殊性中必须特别提出来加以分析的两种情形。唯物辩证法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平衡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因此，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平均看待，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区别其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同样，无论什么矛盾的双方，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时对立着的双方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所以对矛盾着的双方也不能平均地看待，必须区分其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毛泽东同志说：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这两种情形，“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① 这就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放在颠扑不破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

今天，有的人企图否定矛盾双方区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具有普遍性。这些人认为，数学中的正和负、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人类思维运动中的分析与综合等矛盾双方是无法区分主次的。我们认为，谁要想驳倒矛盾双方区分为主次的原理的普遍性，谁就应首先驳倒唯物辩证法关于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理论，而不在于举出一些似乎无法区分主次的矛盾。要是驳不倒唯物辩证法关于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理论，我们在理论上就不得不承认矛盾双方区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具有普遍性。

必须指出，否认矛盾双方区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原理具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有普遍性的人，往往对列举的矛盾，不作具体的分析，陷入抽象地议论。对数学和物理学中的正与负(对任何矛盾，如：张三与李四，男人与女人等也一样)，如果不进行具体的分析，而进行抽象的议论，那我们确实无法区分哪个是主，哪个是次。但在具体的数学运算中以及在分析原子的结构中，我们就不难作出这种区分。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分析和综合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一对矛盾。我们确实"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应当把每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抽象地讲，我们确实无法区分谁主，谁次。但在具体的思维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作这种区分。在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理性的抽象过程中，虽然也有综合，但以分析为主，所以一般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分析的过程。在由理性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过程中，虽然也有分析，但以综合为主，所以人们称这过程为综合的过程。人的认识的深化过程，就是伴随着分析和综合的互相交替过程。总之，一切矛盾，只要我们具备必要的科学知识，对矛盾双方的特点、相互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就一定能区分其主次两方面。否认矛盾双方主次区分原理的普遍性是完全错误的。

事物所包含的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研究矛盾特殊性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与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① 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拒绝分析矛盾特殊性，当然也就不可能进一步区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教条主义者既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必须实行积极的战略防御，又不懂得在强大敌军存在的情况下，我军无论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兵力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他们反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而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全线抵御”等消极的平均主义作战方针。在政治上，他们同样不是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而是错误地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加以孤立和打击。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看不到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否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毛泽东同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①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在《矛盾论》里特地用一节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问题加以详细地论述的原因。

二　系统论述了主要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② 又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③ 他还以中国革命过程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复杂关系，论证了什么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毛泽东同志的论证还表明：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革命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注意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转化，自觉地有准备地把革命斗争由一个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

段推向另一个阶段。

由于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 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抓主要矛盾的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列宁曾多次说过：“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② 他又说：“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③ 毛泽东同志的全力找出并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的思想与列宁全力抓住主要环节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各种矛盾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主要矛盾对非主要矛盾固然起着决定的、领导的作用。但非主要矛盾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主要矛盾的解决。所以，我们在全力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决不可忽视非主要矛盾。为了正确地、顺利地解决主要矛盾，必须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非主要矛盾，防止孤立地、片面地去抓主要矛盾，把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

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中作了杰出的运用。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指出：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地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和日本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促进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不管国内外形势如何复杂多变，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

毛泽东同志始终牢牢抓住中日民族矛盾，坚持并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在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之后，党内有的同志认为，国共合作要破裂，皖南事变是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毛泽东同志则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所以决不会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他接着指出，"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① 这说明，只有正确地并牢牢地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不致迷失方向。在抓住中日民族矛盾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丝毫也没有否认、忽视国内的阶级矛盾。他说："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的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② 为了正确地处理国内各阶级间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中，对上述种种矛盾进行具体地、深入地分析，提出了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矛盾的原则、政策和策略。他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和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在同顽固势力的斗争中，他指出，必须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总之，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运用主要矛盾的理论，辩证地处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相互关系的杰出范例。

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是极其复杂的，多变的。为了正确地找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9—74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4页。

出事物发展过程或同一过程不同阶段上的主要矛盾，正确地处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相互关系，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各种矛盾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丝毫不能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找错了主要矛盾，颠倒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那在革命实践中就会犯全局性的、战略上的错误。

三　详细阐明了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

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 他还以大量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矛盾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依照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② 如前所讲，毛泽东同志对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转化的深刻分析，揭示了宇宙间新陈代谢规律的实在内容。

毛泽东同志把矛盾主要方面的原理出色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在战争中，作战双方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这并不是随意地主观地决定的，而是由作战双方力量对比决定的。在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在开始和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里，敌人处于战略优势和主动，人民军队处于战略劣势和被动，这就决定了人民军队在长时期里实行积极的战略防御的持久战的作战方针。但是敌我之间的这种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8页。

民军队可以人工地造成自己的局部优势和主动，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主动。这就是实行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军队就能从小到大，越战越强，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而把敌人抛入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时，人民军队也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直至最后彻底消灭敌人。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所以在分析事物的矛盾时，我们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那就会混淆事物的性质，迷失前进的方向，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这决不是说，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对事物的性质和发展不发生影响，更不是说可以忽视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关于这一点，《矛盾论》并没有进行论述，但在实际的运用中，毛泽东同志在注意到主要方面的同时，丝毫也没有忽视次要的方面的东西。如，在进行党内思想斗争时，他总是从“左”右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他指出，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时候，就可能出右。因此，在注意到一个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左”的时候要防止右倾，在反对右的时候要防止“左”倾。如果一个劲儿地反“左”，往往会走向另一极端，犯右的错误；反之，如果一个劲儿地反右，也势必会跳到另一极端，犯“左”的错误。他还明确地指出：在强调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时，不能忽视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在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国民经济的重大关系时，精辟地分析了重点和非重点的辩证关系，说明了非重点对重点的影响和作用，批评了把重点与非重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一点论，进一步发展了《矛盾论》关于矛盾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相互关系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把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的原理贯彻到底，深刻地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在上述矛盾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他批评了否认这些矛盾双方的地位是能够转化的机械唯物论的见解。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和认识过程中的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的进一步发展。

今天，有的人在否认矛盾着的双方必有主次之分的同时，还否认矛盾双方主次地位互相转化具有普遍性，否认上述毛泽东同志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这种否认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所缺少的是辩证法，不懂得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不懂得“相互作用消除了一切绝对的首要性和次要性”①。否认主次地位互相转化具有普遍性，实际上也就否认了对立面之间互相转化原理的普遍性，其结果必然是把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从而根本上否认了事物有发展的可能性，陷入了形而上学。

总之，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和其它著作中完整地、系统地论证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并在革命实践中作了出色的运用，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全面地、正确地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对于反对形而上学的均衡论、机械论和一点论，对于做好各项工作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

第四节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理论

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古代哲学家都直观地、朴素地认识到矛盾的对立面的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但自觉地论述对立面之间具有同一性的人则是唯心辩证法家黑格尔。黑格尔一方面反对抽象的、僵死的 a＝a 的形而上学同一性，认为同一性之中包含着差别，a＝a、又 a≒a。他说："不要把同一单纯认作抽象的同一，认作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这是使得一切坏的哲学有别于那唯一值得称为哲学的哲学的关键。"①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在对立之中看不到同一，把对立双方绝对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认为对立的每一方都包含着它的对方，规定着对方，辩证思维的本性"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②。他认为对立的概念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

马克思没有从理论上对矛盾同一性进行说明。但他在科学研究中却作了出色的运用。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详细地分析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同一性。他把这种同一性归结为三个方面：

（1）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也是消费，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主体（劳动力）和客体（生产资料）的消费过程。消费也是生产，在消费过程中生产主体（劳动力）。

（2）生产和消费互为媒介、互相依存、互不可缺。生产媒介着消费，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使消费成为可能。消费媒介着生产，消费为产品创造消费者（主体），使产品得到最后完成。

（3）生产和消费互相创造对方。消费完成生产行为。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

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249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39页。

的最后行为。生产生产出消费，不仅生产出消费的对象，而且生产出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

马克思说："对于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同一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① 马克思的这种分析为我们如何理解矛盾同一性的含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矛盾的同一性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说："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他们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② 在论述真理和谬误的关系时，他又指出："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③ 在《自然辩证法》中，他详细论述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和辩证法的同一性的根本对立。他指出："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④ 他以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的大量事实论证了辩证法的同一性。

列宁在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著作时，对矛盾统一性原理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探讨，他十分注意黑格尔的关于对立面之间具有同一性的思想，并把辩证法定义为关于研究对立同一的学说。他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⑤ 列宁特别注意到对立面之间互相转化的问题，他认为，"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向每个它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⑥他还明确提出了对立面的统一性是相对的，而对立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列宁的这些思想极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③ 同上，第130页。
④ 同上，第538页。
⑤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⑥ 同上，第239页。

地丰富了矛盾同一性的内容。但列宁对自己的思想没有加以详细论证和展开。

毛泽东同志依据列宁的思想并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合理思想，进一步详细地阐明了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

一 明确地把矛盾的同一性的含义概括为两方面，并进行了全面论证

毛泽东同志说：所谓矛盾的同一性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方面转化。”①他又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同一性的全部意义。”②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明确概括以及具体的论证，进一步发挥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有关矛盾同一性的思想，是我们反对形而上学的有力思想武器。

应当指出，斯大林并没有理解列宁（以及马克思和黑格尔）关于矛盾同一性的思想。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同一。在斯大林的这种思想影响下，苏联哲学界在一段时间里，抛弃了他们原先关于对立面之间具有同一性的观点。如，苏联《哲学问题》一九五三年第一期刊登的《评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文说：“我们认为罗森塔尔教授所用‘对立的统一’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法则’等名词是不妥的。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规定发展即对立面的斗争。”文章还认为，对立面的斗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302页。

② 同上，第304页。

争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在“我们的哲学著作中所见到的对立的‘同一’或对立的‘统一’等名词，是黑格尔的表述方式的残余。”① 同年，《哲学问题》第四期上，罗森塔尔发表文章作了检讨，并说：“斯大林在表述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即发展是通过对立的斗争时，就没有使用黑格尔的‘对立的统一’，‘对立的同一’这些概念，可惜，我们在自己的宣传工作中还没有考虑抛弃这些概念的意义。”他还说：“应当指出，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或列宁，在他们的要出版的著作中都没有使用过对立的‘统一’和‘同一’这些概念。”②

一九五二年《矛盾论》修订后重新发表。显然，苏联的这些文章也是针对《矛盾论》而发的。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则不指名的批评了《矛盾论》中同一性原理。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同志列举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例子来说明对立面具有同一性。《简明哲学辞典》的同一性条目则说：“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他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③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批评了斯大林和苏联哲学界否认对立面之间具有同一性的观点。他说：《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一条，“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否认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他还详细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之间的同一性，有

① 参见《学习译丛》，1953 年第 6 期。

② 参见《学习译丛》，1953 年第 8 期。

③ 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1955 年中文版，第 156 页。

力地批评了《简明哲学辞典》的责难。他尖锐地指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是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犯错误。"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把同一性的含义概括为两个方面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二 进一步阐明了矛盾转化的重要性和条件性

毛泽东同志在说明同一性的两种情形时，特别强调了转化的重要性。他说，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一点还不够，"更重要的，还在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②。为此，他用较多的篇幅，举了大量的例子来阐明转化的原理。为什么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是同一性的更为重要的内容呢？因为矛盾着的对立面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可变的，事物只有通过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主要方面向非主要方面的转化，才能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才能有质的飞跃，旧事物才会灭亡，新事物才会产生。所以转化的理论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人就是做转化工作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3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论述了对立面的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思想。他特别反复地讲到好事与坏事、香花与毒草、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等等看来绝然相反的东西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他曾说要例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概念，搞通思想，提高认识，防止思想僵化。他一再告诉人们，"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①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是对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新的总结，进一步丰富了《矛盾论》中关于同一性的原理。

在辩证法的转化理论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转化的条件性问题。

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在谈论对立面之间互相转化时，一般都没有注意到转化的条件，所以这种古代的辩证法很难同诡辩论、相对主义划清界限。黑格尔讲转化是概念的转化，他也不讲转化的条件。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他又说："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通向诡辩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② 列宁的这些论述划清了在转化问题上辩证法与诡辩论和相对主义的界限。

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同志根据矛盾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思想，特别说明矛盾转化条件的重要性。他说：对立的东西，缺乏一定的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他强调唯物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辩证法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在后来，他更明确地说："矛盾着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① 因此，为了要促成事物向有利革命方向转化，就必须具体地分析矛盾转化的条件，从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转化的条件，促成事物向有利于革命方向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离开了具体的条件来谈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在哲学上就会陷入相对主义和诡辩，在政治上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三　进一步发挥了列宁的关于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原理

列宁曾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② 列宁的这些话指出了矛盾双方相互关系的根本特点。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告诉我们，同一性的相对性在于：第一，对立面的同一性是暂时的。辩证法的同一性是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等同，在同一性中包含着斗争性。而这种对立面斗争的结果，迟早会导致对立面同一的破裂。所以"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③ 第二，互相排斥对立面的同一是有条件的。互相排斥的东西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共居，才能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

能共居，也不能转化。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说来，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也是相对的。那为什么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呢？他告诉我们，因为矛盾着的双方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矛盾着双方的这种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在考察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时必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① 任何矛盾的双方始终存在着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同一的这两种关系。矛盾双方的斗争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之中，而矛盾双方的联系也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和斗争之中。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② 因此，任何离开斗争性来谈同一性，或离开同一性来谈斗争性都是错误的。辩证法要求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坚决反对只讲同一否认斗争，或只讲斗争，否认同一的形而上学。

有的人会说：既然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那为什么不能讲矛盾的同一性也是绝对的，斗争性也是相对的呢？这是因为"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性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③ 如果我们把同一性看作是绝对的，那就是把对立面的同一看作是僵死的、凝固的，就否定了事物的任何运动、发展和变化，陷入了彻头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3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305页。

彻尾的形而上学。如果把对立面的斗争看作是相对的，那就否认了对立面本来就是互相排斥的、互相斗争的，就会陷入矛盾调和论。

总之，继列宁之后，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等著作里深入地、系统地研究了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揭示了矛盾的双方如何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说明和发挥，对我们坚持彻底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诡辩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　进一步阐明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理论

在研究矛盾斗争问题时，毛泽东同志特别研究了矛盾的性质和矛盾斗争的形式，说明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别及其相互转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历史过程时，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揭露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进步的革命阶级和落后的反动阶级之间的对抗，阐明了这些矛盾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不同的社会革命，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详尽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以及解决矛盾的方法。

由于对抗性矛盾是阶级社会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矛盾，所以对抗这种矛盾形式较为人们注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谈到的主要也是对抗性矛盾。这种情况，引起了有的人的误解，以为对抗是矛盾唯一的形式。布哈林就是这样。他在《过渡时期的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济》一书中说："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但是，把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的阶级对抗，则到处都有它的表现。"① 针对布哈林的这种说法，列宁在读书批语中指出："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② 在这里列宁首次提出了对抗和矛盾不是一回事，不能等同，对抗只是矛盾的一种形式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矛盾的斗争性问题时，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特别提出来加以论述，大大发挥了列宁的思想。

首先，他对对抗性矛盾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那么什么是对抗性矛盾呢？他告诉我们，对抗性矛盾是指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才能解决的矛盾。如社会生活中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自然界的炸弹爆炸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又明确指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是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③。

其次，提出了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斗争的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的思想。他说："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④ 因此，我们必须具体地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切不可将解决某一种矛盾的方法当作公式去套在一切事物身上。一般说来，非对抗性的矛盾则只能通过非对抗的斗争形式来解决。因此，在"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⑤。否则要犯错误。

再次，提出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互相转化的原理。

---

①② 转引自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

他说："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①他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性质为例，来说明矛盾性质可以互相转化。

在我党历史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懂得矛盾的性质有对抗和非对抗之分，不懂得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不同。他们对一切不赞成、不执行他们路线的人，不问明情况如何，统统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用对待犯人和敌人的方法来对待党内的同志，致使党内大批优秀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和诬陷，造成了党内极为痛心的损失。鉴于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一般不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②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一九五七年完整地提出了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两类矛盾学说。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转化为敌我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310页。

矛盾。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第五节　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

量变质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它着重说明事物矛盾运动的形式或两种状态。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表现为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无限交替的过程。离开了事物发展过程中质量关系的辩证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不可能获得完整的说明。

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广泛地运用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量变质变规律。

一　坚持质与量的辩证统一，提出要注意决定事物质的数量界限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它自身固有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以区别于别的事物。事物的质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人们认识事物，首先要认识事物的质，注意事物质的区别。那么事物的质是由什么规定的呢？怎样才能认识事物的质？毛泽东同志根据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① 他还进一步指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284页。

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事物的质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所规定的，认识事物的质关键在于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找出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中，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了认清事物的质，注意事物质的区别的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不仅深刻地阐明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分析了引起中国革命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还详尽地论述了认清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他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①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就其认识根源来说，归结到一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正确的认识。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不仅指导整个革命和建设需要认清事物的性质，就是在进行一切具体的工作时也必须如此。无论是对形势的分析，还是对工作或人的评价上，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诫我们要注意划清不同事物质的界限，他说："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与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②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把革命队伍内部的官僚主义之类的缺点与敌人中间存在的问题混为一谈，混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或者是分不清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划不清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的界限。结果，混淆了敌我，颠倒了是非。

在质与量这一对矛盾中，一般说来，质是主要的，质决定量。但这决不是说量是无足轻重可以忽视的。毛泽东同志说："任何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2页。

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①这就是说，质量和数量是不可分割的统一，在注意认识事物的质，区别事物质的界限时，也要十分注意事物的量，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要胸中有“数”。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为了正确地把握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在了解、研究敌我军队不同质量的同时，对敌我双方军队数量方面的情况也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论文，他用很大篇幅详细地列举了敌人兵力的各种统计数字，分析战争不同阶段敌我军事力量的变化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解放战争初期，敌军有四百三十万人，占有三亿人口的土地，我军只有一百二十万人，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我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针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经过一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歼灭敌人一百十二万，敌我军事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实现战略转变的口号，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发展到战争的第三年，敌军从战争初期的四百三十五万人减至二百九十万人左右，我军则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万人增至三百余万人，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占有优势。并及时地提出了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作战方针。总之，毛泽东同志总是从质与量的两方面分析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根据敌我武装力量的基本情况，找出敌我军事力量发生根本变化的关节点，正确地制定人民军队的作战方针。

为了正确地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解决农民问题，毛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及土地状况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同志的所著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农村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的多少和各有土地的多少，对农村封建剥削的程度，对农村中各阶级和各阶层对革命和土地改革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等都十分关注，并作了明确的数量统计和分析。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毛泽东同志特别注意寻找区分政策界限的数量界限。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确定土地改革总的打击面，他指出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的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①超过或不及这个界限，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如何正确地划分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界限是土地改革中又一极端重要的政策。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这也必须科学地确定一个数量界限。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土地改革的实践，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八年指出："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②这样就为区分富农和富裕中农提供了客观的标准，防止把一些只有轻微封建剥削或并无封建剥削的劳动农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对于一个复杂的大事物来讲，事物的质和量是多方面的，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变化时提出了要注意区别事物新的质与旧的质，新的量与旧的量的概念。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国方面将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变化，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二种是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向下

① 参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2页。

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① 这种分析，不仅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而且告诉人们应如何分析一个复杂的事物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如何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方向。毛泽东同志关于新的质和旧的质，新的量和旧的量的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量变质变规律的内容。

在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同志要求把发展事物的数量和提高事物的质量辩证地统一起来，反对不顾质量片面追求数量的错误倾向②。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不仅注意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而且还注意根据地的巩固，提出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提出发展合作社，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必须强调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③ 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不仅要比数量，尤其要比质量，要做到增加生产，不死牲口。为此，在合作化过程中要注意整社工作。

二　阐发了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原理

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量变与质变往往不是以纯粹的形式进行的，而是互相交错的。在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在质变过程中有量的扩张。毛泽东同志把部分质变的原理创造性的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挥。

毛泽东同志从量变和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上，从量变和质变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上，说明了部分质变原理的普遍性。他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5页。

② 参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3页。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他又说，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说明，把量变中的部分质变以及质变中的量的扩张原理放在可靠的唯物辩证的基础之上，谁要否认这一原理的普遍性，就首先要否认对立面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贯通的普遍性。

毛泽东同志还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一些常见的通俗易懂的例子来说明部分质变原理的普遍性、客观性。他说，蚕的一生要经过蚕子、蚕、蛹、飞蛾这四个阶段。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新的质（生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也是部分的质变。人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生到死之前，是量变过程，也是部分质变过程。难到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又如，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是通过三年半的时间里，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通过若干部分质变完成的，等等。

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同志不仅说明了量变和质变都是由事物内部所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引起的，而且指出了部分质变的两种形式及其根源。他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步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

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① 这就告诉我们，部分质变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在发展过程中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而一些次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种是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就事物的全局说来，其性质未变，而个别部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当然，这两种形式的部分质变并不是绝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存在着交互作用。造成部分质变的原因在于：一是根本矛盾的逐渐激化；二是非根本矛盾发生了若干变化，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有些是发生了，有些是缓和了。而这两种原因都是由于事物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所引起的。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说明还告诉人们：部分质变是以事物的根本性质不变为前提的，它是在总的量变范围内发生的。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与根本质变是不同的，部分质变可以促进根本质变的来到，但不能代替根本质变。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会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

在长期实践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部分质变的原理运用于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地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旧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矛盾和斗争，加深了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战争。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敌人营垒的不统一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在红色政权建立的地方，社会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但是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这种变化还只是局部的部分质变，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性质还未起变化。随着革命根据地一块一块地建立和扩展，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

种部分的质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根本的质变，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彻底消灭反动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同志把部分质变的原理杰出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人民军队长期处于劣势，敌人长期处于优势，而且这种劣势与优势相差又十分悬殊。人民军队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敌强我弱，化劣势为优势的局面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其办法就是人工地造成许多局部的优势，去剥夺敌人的局部的优势。在全体上，我是劣势，敌是优势，但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办法，人民军队可以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人民军队每一次战役战斗上的胜利，每消灭一部分敌人，都可以看作是质变，但在敌强我弱，敌优势和我劣势的局面未根本改变之前，在敌我战略决战之前，这种战役战斗上的胜利，质变，只能看作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积小胜为大胜，人民军队就可以逐渐脱出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略上的优势，通过与敌军的战略决战，打败敌军，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从局部的战役战斗的胜利到战略决战的胜利，直至消灭一切敌人的过程就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毛泽东同志依据部分质变的原理，有计划地逐步地改变生产关系，通过一些中间的过渡环节，顺利地完成了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我们党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提出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这三个阶段，引导中国五亿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了私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质的飞跃。为了把中小的民族资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我们党也实行分步走的办法。在工业方面首先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方面是经销、代销。这是初

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带有若干社会主义因素。然后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最后由公私合营的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邓小平同志曾说：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毛泽东同志对部分质变的原理的广泛运用，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原理的内容。现在许多哲学教科书和文章在论述部分质变原理时所运用的材料不少是取之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他所领导的革命实践。

当然，任何部分质变也必须要有一定量变作准备，但部分质变又促进了总的量变，并为根本质变创造条件，所以它对事物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自觉地认识掌握部分质变原理，我们就可以发挥自觉能动性，促进大量的量变，促进许多部分质变，加快根本质变的到来，加速事物的发展。

三　深化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

毛泽东同志把量变质变规律运用于中国革命过程时，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并为列宁、斯大林所发挥了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的理论。

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的质变而达到根本的质变。质变是飞跃，旧的量变的中断，又是新的量变的开始。一个复杂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具有不同质的特征的阶段性。所以事物的发展表现为从一种质到另一种质，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无限的推移过程。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革命过程同样如此。这表现为革命既是不断的无止境的，不应当中途停顿；又表现为革命有阶段之分，不应当把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不应超越必经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是不断

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阶段的相互区别与相互衔接的问题。他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世界革命形势，反复教育全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不懂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企图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想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合并到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去完成。毛泽东同志反复批评了这种"左"的错误。他指出，这些人，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是有害的。只有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如果看不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定任务而对它稍许放松，却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有少数犯急性病的同志主张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开始转变之时。这些同志将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这种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同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根本质变混为一谈。他们不懂得，只有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之时。

毛泽东同志还科学地阐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批评了国内一些人企图在两者之间隔上一道资产阶级专政的"万里长城"，否认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可能性和必

---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要性。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它们在全国政治势力中比重的增长，巩固的工农联盟；没收官僚资本后建立的国营经济以及劳动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等等。无论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在搞民主革命时必须朝着将来的这个大目标，失掉了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了。搞民主革命必须想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此努力作准备，在条件具备时及时实现革命的转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及时地领导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用了短短七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正确地把握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在思想文化工作上，要把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同当前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①在今天，我们同样必须把社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实践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区别开来。既不应因执行社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取消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也不应将两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

者混淆，实行超越当前历史阶段的过“左”政策。

毛泽东同志不仅把中国革命区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历史阶段，而且把民主革命又区分为若干小阶段，按照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制定党在不同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得我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不断地有步骤地向前推进。由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但这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又可以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中的每一阶段又可分为若干小阶段。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质的不同(或部分质的不同)。我们决不应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企图脱离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主观地、任意地去改变生产关系，去向高一级的生产关系过渡。事物发展过程或过程内部不同的阶段的质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在一定时间内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应让其巩固下来，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即使有某些调整也只是量的调整，而不能改变其相对固定的质。我们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首先要热心于大力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决不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因此，企图“彻底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东西也是完全错误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能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也不能只有量变而没有部分质变。

事物的发展总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运用于社会革命方面，而且也运用于一切实际工作的指导，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方法。在观察和处理任何问题时，我们必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注意不同阶段的区别与衔接，注意这一过程到那一过程和过程内部这一阶段到那一阶段的推移。这样，我们就能做到即脚踏实地、注重于当前任务的努力，又顾到长远，胸有全局，有预见地、有步骤地进行工作。路是一步接一步地走的，

工作是一个接一个地做的。在走第一步时要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在完成一项任务时要及时地提出另一项新的任务。既不是不分步骤去做当前做不到的事，又不致使工作中途停顿。这实在是一种领导艺术。

第六节 肯定和否定的辩证法

肯定否定规律(或称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又一基本规律，它同量变质变规律一样，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表现形态。这一规律揭示了事物的运动变化不是循环的，更不是倒退的，而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波浪式(或螺旋式)的前进运动。

这一规律，是由唯心主义者黑格尔首先提出的和阐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之处，并加进了许多新的内容，充实和丰富了这一规律。毛泽东同志对这一规律虽然没有像对对立统一规律那样进行专门的论述，但在实践中却进行了广泛的运用，并对新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从而丰富了它的内容。

一 坚持辩证的否定观，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

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肯定的方面是事物中维持其存在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是事物中促使其本身灭亡的方面。事物的内部的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的。当事物肯定方面占优势时，事物保持其原来的性质和自身的存在；当否定的方面战胜了肯定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时，事物就转化为自己对立面，原来的事物就被新的事物所否定。没有否定就没有发

展，否定是辩证法革命的批判的本质的集中表现。马克思说得好："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正是这种辩证法的否定的批判的革命精神，使得一切保守的反动的阶级感到恐惧。

事物只有通过否定，才能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才能使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说明了否定的革命性，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中国古经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完全符合辩证法的。毛泽东同志借用破与立的概念来说明否定、批判的重要性。他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始终强调"不破不立"，强调"破字当头"。在他看来，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要建立独立和民主的新国家，必须彻底地破坏帝国主义，彻底地破坏封建主义，而决不能有丝毫地留情。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驳斥某些人的"只要建设，不要破坏"的谬论时说："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② 在谈到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时，他指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的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

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它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① 事物内部所包含的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斗争，新的方面与旧的方面的斗争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不破坏旧的东西，不否定旧的东西，新的东西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那种所谓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的说法都是违反辩证法的，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形的。

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破”，并不是与立绝对对立的，并不是形而上学者所理解的“破”。他的破包含着立。因为破并不是全盘否定，彻底抛弃，而只是破坏、抛弃旧事物中腐朽的、过时的、消极的东西，而保留其旧事物中合理的、积极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破，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所以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破字当头、不破不立，决不是先破了之后再去立，而是破中有立，破的过程也就是立的过程。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② 毛泽东同志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思想与马克思的话是相一致的。而那种先破后立，与先立后破一样，都是把破与立形而上学地绝对地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大破”“大立”，完全背离了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正确思想。结果，破，是形而上学的破，绝对地破；立，离开了科学的立，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立。这种形而上学的“大破”“大立”是荒谬的，是应当加以否定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否定毛泽东同志对破与立关系所作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在实际工作的指导中，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的否定观强调对任何事物都应取分析的态度，反对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错误倾向。

在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上，毛泽东同志要我们用马克思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主义的方法批判地继承数千年来我们民族所创造的许多珍贵品，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① 他反复阐明了在文化遗产方面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批评了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两种错误态度。他指出：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必须区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应剔除糟粕，吸取其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华，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拒绝继承和借鉴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种继承和借鉴，"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②，"决不可以变成代替自己的创造"③，盲目地崇古，复古是有害的。对待外国文化，不论是古代的，还是今天的，亦应采取有分析的批判吸收的态度。他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④ 他严厉地批判了那种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照搬外国东西的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谆谆教育文艺工作者，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不会丧失民族信心。"⑤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不仅对于外国的文化、艺术是如此，就是对外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东西也是如此。不应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地学，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而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2页。
⑤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

不仅对于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遗产方面的批判与继承的理论，也为辩证的否定观增添了新的内容。

对于党的工作和历史经验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切勿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他指出："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① 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不应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党所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似乎都做得不好，一团糟。这也不合乎事实。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一般说来，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是用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

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复杂的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也缺乏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王明等人，对自己加以绝对肯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对不同意他们那一套机会主义路线的同志则绝对否定，戴上机会主义以至反革命的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同志对党的历史经验，对错误路线采取的不是否定一切的做法，而是具体分析，否定其错误的东西，肯定其某些正确的东西。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他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作了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没有错。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2页。

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1]毛泽东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为我们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树立了榜样。我们党内矛盾斗争的经验教训表明：凡是对自己肯定一切、自认为一贯正确；对别人则否定一切把他说的一无是处，终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否定自己。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二　事物发展是波浪式的前进运动

辩证的否定并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事物的不存在，而是包含着肯定因素的否定，是联系的环节、发展的环节。后来的新事物并不是简单地抛弃原来旧事物的一切，而是吸收，保留并改造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东西、合理的因素。新事物高于旧事物，它比旧事物要丰富得多。所以事物的发展总的趋势是一种前进运动，而不是循环，更不是倒退。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是直线进行的，而是波浪式的(或螺旋式的)前进运动。对此，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说明和论证。

黑格尔是首先猜测到发展是螺旋式前进的哲学家。他用肯定(正)、否定(反)、否定的否定(合)的三段式来构造其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如果我们撇开“否定的否定”公式的外在形式，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中间包含着极重要的思想，即发展是在不断的反复中前进的，而不是直线式的。黑格尔还多次把哲学史比作圆圈，把哲学史上的每一种哲学思想比作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大圆圈上的一个小圆圈。恩格斯以明确的语言道出了“否定的否定”的实质。他在拟定《自然辩证法》写作总计划的草案中说：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列宁虽然没有能读到恩格斯的话，但他以同样的语言指出：“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

① 参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893页。

是按直线式进行的"[1]，列宁以发展是螺旋式前进的观点考察人类历史时说："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2] 又说："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3] 他还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工人运动中患有幼稚病的人，把革命道路看作是平坦的笔直的大道的错误看法。列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了发展是螺旋式前进的原理。

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的情形下进行的，因此，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过程。党内有一些同志长期不能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这一特点，犯了急性病，致使革命和革命战争屡遭挫折。针对这种情形，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发展是螺旋式（他称之为波浪式）的而不是直线式的前进的原理作了广泛的运用和说明。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4]，反对不顾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的可能，进行无限量的扩大。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红军应实行游击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5] 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他指出，由于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中国革命战争是持久的，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是长期的反复的。即是"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其规律是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2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1、58页。
⑤ 同上，第100—101页。

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① 他在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时，深刻地阐明了战争的发展如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往返曲折的，而不是径情直遂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批判“亡国论”时，也批判了“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说，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和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和分析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化运动的过程时说，新文化在“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有一些人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对形势和前途的看法右倾悲观。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但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他说：“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③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运用和说明了波浪式前进的原理。对于经济建设中的进和退，上马还是下马问题，他提出都要按照辩证法办。“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④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又说，“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⑤“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⑥ 他还以更加普遍的形式论证了发展是波浪式的前进，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的发展。“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61页。
④⑤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314页。

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①类似这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② 他有时也把这种曲折过程称之为S形，等等。

总之，毛泽东同志以自然界、社会的大量事实和革命实践中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说明了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不是一字形的，而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是之字形，曲线形的。

那么事物的发展为什么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呢？关于这一点，无论是黑格尔，还是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进行具体说明。毛泽东同志则从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上揭示了波浪式前进的原因。他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③ 任何事物内部所包含的肯定与否定，新与旧两方面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开头，代表新的，否定方面的力量总比代表旧的，肯定方面的力量要弱，要小。弱的、小的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战胜强的、大的。必须经过一系列曲折的斗争，弱的、小的才能变为强的、大的，并最终取得支配地位。而原来强的、大的变为弱的、小的，最后归于灭亡。这种情形在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毛泽东同志总是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不平衡性来说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曲折性，以矛盾不平衡的绝对性、平衡的相对性来说明经济建设是波浪式的前进。客观事物是丰富多彩的、各不相同的，因此，事物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的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我们只要找出一事物内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

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那就一定能具体地说明该事物运动发展的大体进程。

凡是运动都是波浪式前进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对革命和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历来把波浪式发展当作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认为，我们作工作、订计划，要照顾到这一点。不仅在困难的条件下，不能搞冒进、搞直线论。就是在顺利的条件下，也不能搞冒进、搞直线论。在土地改革时，他指出：不要性急，“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①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反复指出，为了保证合作社的质量，应有必要的休整、停顿、间歇、煞车、关闸，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应该是波浪式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两波之间有一伏”。② 他说：“在两个浪潮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休整的时间，发展一批之后必须要整顿，然后再发展，同打仗一样，两仗之间要有休整。不要休整、不要间歇，不要喘一口气，这是完全错误的。”③ 总之，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诉我们：凡是运动都是波浪式前进的，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反对直线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凡遵循波浪式发展规律，革命和建设就能比较快地发展，就少走弯路；违背了这一规律，企图走直路、搞冒进，结果革命和建设就发生更大的曲折，走了不少弯路。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2页。

三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如前所述肯定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的运动变化不是简单的循环，不是倒退，也不是直线的前进，而是由低级向高级的波浪式的前进运动。这也意味着，事物内部代表新的、否定的方面必然要战胜代表旧的，肯定的方面。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这是一条规律。"新陈代谢"是我国古代的一句成语，为历代进步的、革命的人物所引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反复阐明新生力量必然战胜旧的腐朽的反动力量这一科学真理，鼓舞人民敢于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他强调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①又说："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②

新陈代谢为什么不可抵抗？新生事物为什么不可战胜？对此，毛泽东同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了科学解释。

首先，这是由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和新生事物的本质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斗争，形成了一系列曲折的斗争。斗争的最后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时，新的事物就战胜了旧的事物，代替了旧的事物。新生事物虽然在开始时总是弱小的，但因其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有着广阔的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必然逐渐地强大起来。旧事物虽然暂时显得强大，但因其是腐朽的，违背事物发展客观趋势的，因此，丧失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逐渐地由强到弱，由大变小。在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注定要灭亡，而革命人民一定会胜利。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

是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它逆历史潮流而动。革命人民代表进步、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新生事物否定了旧事物中一切腐朽的、消极的东西，但同时又吸取了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合理的东西，并加进了为旧事物所不容许的富有生命力的新东西。这样，新生事物必然比旧事物要优越得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不论在自然界和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①

其次，在社会领域里，新生事物之所以不可战胜，还在于它符合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要求，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毛泽东同志以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反复阐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是属于人民的。他指出，一切都会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因此会变成大的，最终会取得胜利；力量强的，因为脱离人民、反人民，结果必然失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外表很可怕，实际上不可怕，外强中干，是纸老虎。他说："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② 他还说：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新生事物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波浪式的。毛泽东同志在强调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同时，也指出了"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③ 有的人认为，在旧社会，新生事物的成长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则不必付出极大的努力，应当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当然，同旧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9页。

会相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功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造成这种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和一段时间。在开始，新的正确的东西往往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反被认为是非法的，是毒草。由于鉴别不清，就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在社会主义社会，旧的习惯势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广泛存在，受旧思想束缚的人往往压抑新生事物。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上仍然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分，仍然有保守阶层。所以，“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①

在同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漫长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总是教育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人民革命事业一定胜利，猖獗一时的反动派终将灭亡。他在总结同敌人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著名思想。他说：在战略上、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敌人，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敌人。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②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的前途，要有胜利的坚定信心，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反对悲观失望，不敢斗争，不敢夺取胜利的右倾思想。在顺利的时候，要看到前进路上的困难和障碍，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想走直路，犯冒险主义。毛泽东同志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武装了我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上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它也鼓舞和激励着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英勇的革命斗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00页。

新生事物在刚开始出现时总是比较弱小，而且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完善。而一切腐朽的力量总是要抓住新生事物的弱小和不完善加以压迫、摧残。因此，一切革命者都应当善于发现新生事物，满腔热忱地扶植和支持新生事物的成长。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坚信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世界观，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方法论。

总之肯定否定规律是一个极为普遍地、广泛地起作用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同志对这个规律的论证提供了大量的生动材料，而且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规律的根本内容，即事物的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以及正确地掌握、运用这一规律的重大意义。

第七节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论

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认识论。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分别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发展的状态和形式，发展的趋势和道路。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最基本的部分。此外，辩证法还应包括同上述规律紧密联系的、诸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等一系列唯物辩证法的范畴。这些范畴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侧面的联系和关系。它们同上述规律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体系。这些范畴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表现形态，因此，只有根据对立统一的观点，才能把握住这些成对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纯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理论，去从事革命，指挥战争，领导建设，进行

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这里我们简要地介绍毛泽东同志有关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内容与形式，全局与局部，可能与现实等范畴的有关论述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范畴理论增添的新内容。

一 本质与现象

本质与现象，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方面。现象背后隐藏着本质，本质显现为现象。两者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在哲学史上，对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明确说明的要算黑格尔。列宁在《哲学笔记》里，对黑格尔有关本质与现象的论述作了大量的摘录，肯定并进一步发挥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揭露了他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杂质。毛泽东同志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对本质与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什么是事物的本质？对此，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当然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他认为，本质就是概念，就是绝对，就是上帝。他甚至说："上帝并不仅是一本质，甚至也不仅是一最高的本质，而是唯一的本质。"①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胡说。但作为辩证法家的黑格尔，对本质也有十分深刻的见解。从《逻辑学》的本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同一、差别、矛盾看作是本质的规定，把形式与内容、整体与部分、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原因与结果、相互作用等等都看作是属于本质范围的范畴。黑格尔还说，我们常认为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意思只是说，不应当让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②列宁肯定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指出"'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等）——整个人

---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4页。

② 参见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2页。

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1] 列宁的这句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认识的任务就是在现象中揭露本质，而所谓本质就是指因果律，同一、差别等等。

毛泽东同志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对什么是本质作了规定。他指出，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性质及此一事物和其它事物的内部联系[2]。又说：事物内部包含着特殊矛盾"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3] 只要事物发展过程的这种特殊矛盾还没有解决，过程的本质就不会改变。毛泽东同志对本质所作的科学规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告诉我们，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是要暴露和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特别是要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现象与本质不同，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我们感官可以直接感知到的。他说："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4] 人们的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只有理性认识，只有通过对大量现象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才能正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毛泽东同志告诉人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5]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党内一些人对形势产生了悲观的看法，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

①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35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66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84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50—151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96 页。

毛泽东同志在批评这种悲观论时指出，这些人只观察当前表面的现象，而不观察实质（这里所说的实质即本质），对一般情况的实质没有科学的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①他接着分析了中国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的矛盾，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反动政府和士兵的矛盾等等。我们认识了这些矛盾，就会知道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到来。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分析为我们如何通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树立了光辉的范例。

在同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不仅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且十分注意判明假象与真象的区别，不被假象所迷惑。假象是同本质正好相反的一类现象。“假象＝本质的否定的本性”，“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②所以假象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假象是从反面来表现事物的本质。假象的这种特点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了困难。人们常常容易为假象所迷惑，将假象当作真象。历史上行将灭亡的一切反动阶级，总是用狡猾的手段，造成各种假象，掩盖自己的真实本质，迷惑革命人民，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不少人，被德国法西斯气势汹汹的攻势和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毛泽东同志指出，法西斯势力发动的侵略战争正是它最后挣扎的表现，而苏联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0页。

人民和红军取得的斯大林格勒之战则是德国法西斯灭亡的决定点。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和钻进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制造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中却干着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破坏革命、破坏党，以至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同混进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得出了这样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①经历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博斗之后，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到，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确实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人们的认识不能停留在现象上，必须深入到本质。本质表现为现象，人们又不能离开现象去认识本质，而必须从现象出发。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矛盾。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就是从敌人大，我们小，敌人强，我们弱这些最大量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战争问题，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战胜大而强的敌人。他批评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很不好，指出，这种教科书总是从概念入手，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他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这种教科书从概念、定义出发，实际上是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不承认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对指导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1页。

二 主流与支流

主流与支流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实践经验中所提出来的一对新范畴。这对范畴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趋向。

由于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造成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趋向。这种不同的趋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由事物本质决定的代表事物发展基本方向的趋向，即所谓主流；二是，由事物非本质决定的并不代表事物发展基本方向的趋向，即所谓支流。事物的本质决定事物发展的主流。从这方面讲，本质与主流是同等程度的范畴，两者密切相关，毛泽东同志也常常把它们放在一起运用。

主流，代表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正确地区分主流与支流，牢牢地把握住主流。在革命斗争中，我们如果分不清主流与支流，把支流误认为主流，那就一定要跌跤，一定会迷失方向。毛泽东同志反复告诫人们：在分析形势、总结工作、评价人物等问题上，一定要注意区分事物的本质、主流方面与非本质、非主流方面，不应当将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东西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共政策和一部分人对形势的悲观看法指出："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①他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打垮中外反动势力，建设一个新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1页。

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科学分析，抓住了本质和主流，给人们以信心，使人们看到光明的前途。

在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对我们所从事的革命工作进行估计时，毛泽东同志总是强调要区分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究竟那个是主要的，那个是次要的。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当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遇到困难，出现严重缺点和错误，或是纠正过去的错误时，有的同志就往往只看到缺点和错误，把过去看得漆黑一团，看不到取得的成绩。毛泽东同志指出："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①看不到党所领导下人民群众取得的成绩，就会泄气，悲观，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为了正确区别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主流与支流，毛泽东同志把它们之间的区别生动地比喻为几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区别。他说，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要翻跟斗。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尽管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犯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但取得的成绩还是主流，错误和失败总是支流。当然，在某个时期，路线错了，或指导思想有严重错误，会出现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这种情况。但这毕竟是暂时的，是可以纠正的，在整个革命事业的发展中这仍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当然，对于我们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的估计，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绩是几分就是几分，缺点是几分就是几分。不能把成绩是主要的、九个指头，缺点是次要的、一个指头，当作公式加以主观的运用，更不能用它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9页。

来为自己的缺点、错误辩护。

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和评价上，毛泽东同志也主张要具体分析，区别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混乱，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也借此掀起反共浪潮。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指出，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计”，“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①毛泽东同志还说：“苏联发生的错误，象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②他还指出，对斯大林的错误是要批判的，但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的功过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我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毛泽东同志在强调要抓住事物的本质、主流的时候，还告诉我们，不要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虽然主流代表着事物发展的总的趋势，但非主流对事物的发展也起着制约的作用。如果忽视了非主流方面的问题，那它就有可能转化为对事物的发展起主要作用的方面，这样事物的发展就会出现暂时的倒退。所以他说：“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③他在肯定我们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时候，也注意揭露和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如，在肃反工作中，他一方面肯定成绩是主要的，另一方面也指出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应实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在理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0页。

论上，他总是主张对我们的工作应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批评有的同志只讲成绩，不讲错误，只愿听赞扬话，不愿听批评话的错误态度。

实践表明，在革命和建设中，如果能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主流和支流之间的相互关系，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就发展。反之，就会招致挫折和失误。这是必须牢牢记取的。

三 内容与形式

一切事物都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只有内容而无形式，或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事物，在现实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内容，是指构成事物要素的总和；形式，是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方式。

在内容与形式的这对矛盾中，一般说来，内容处于主导地位，内容决定形式，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形式必须服从内容，适合于内容。依据这一原理，毛泽东同志强调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首先必须注意事物的内容，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决定形式的取舍、改造和创新。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根据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的特点根据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容，找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这种新形式。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是战争的三种基本形式。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过程中，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敌我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确定战争形式的主次地位，并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相应地改变战争的形式。在《论持久战》中，他指出，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战争形式，游击战和阵地战则起辅助作用；在第二阶段，游击战成了主要的作战形式，运动战和阵地战则起辅助作用；到第三阶段，运动战上升为主要的形式，而辅之以阵

地战和游击战。

在论述文艺批评的标准时，毛泽东同志认为，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这两者都很重要，但首要的，第一位的是应着眼其政治思想内容。他说:“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① 对某些政治内容上根本反动而又带有艺术性的东西，就愈该加以排斥。毛泽东同志还尖锐地批评那种不注重内容，只讲究形式的形式主义，他指出，写文章，作报告，必须有充实的内容，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反对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开中药铺”的方法。他认为，这种窒息革命内容发展的形式主义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②，必须揭破它，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毛泽东同志，不仅重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很注意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注重选择适合内容的形式以促进内容的发展。文艺作品不仅要有革命的政治内容，而且要有完美的艺术形式。他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③ 不仅文艺作品是这样，整个思想文化也是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各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说：“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

起来。”为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根据内容的需要，选择适当的形式，把形式与内容有机地统一起来，促进内容的发展，这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处理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就是选用恰当的形式以促进内容发展的生动例证。

同一内容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甚至与内容相反的形式。在革命斗争中，学会善于掌握和运用多种斗争形式，使之互相配合。列宁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不是由于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变更。”②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吸取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依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各种斗争形式。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其它各种斗争形式的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在文学艺术上，同一的内容可以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加以表现。因此，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禁止另一种风格，会有害于艺术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反映了科学文化发展的规律。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力求生产自给。毛泽东同志指出，这在形式上是违背分工原则的，是落后的，倒退的。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

在实质上则是进步的，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作用。在战争中，一般说来进攻战是一种主动的作战形式，防御战是一种被动的作战形式。但实行有计划的，主动的战略退却和正确的战略战术，就可以“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并能够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从而由形式上的被动转到形式上和内容上的主动。①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旧的形式，可以有进步的内容，被动的形式，可以有主动的内容。因此，对旧的形式要进行具体分析。另外，腐朽的、陈旧的东西也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四　全局与局部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特别是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对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系统地论述了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整体与部分这一对范畴，并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整体与部分在哲学史上是一对极古老的范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研究过。他认为，整体由若干部分组成，但并不是若干部分的一种堆砌。整体不同于部分，部分也离不了整体。譬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上割下来，按照名称虽仍然可称为手，但从实质上看，它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手了。在近代哲学史上，黑格尔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全体虽为部分所构成，但全体一经分割成部分，便失其为全体。他举例说：“一个活的有机体的官能和肢体并不能仅视作那个有机体的各部分，因为这些肢体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里，它们才是肢体和器官，它们对于那有机的统一体是有联系的，决非毫不相干的。只有在

---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页。

解剖学者手里，这些器官和肢体才是些单纯的机械部分。但在那种情况下，解剖学者所要处理的也不再是活的身体，而是尸体了”。① 他还指出，整体和部分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全体过渡为部分，部分过渡为全体。恩格斯和列宁都注意到黑格尔有关整体与部分的论述。② 列宁在革命实践中对整体和部分这对范畴作了出色的运用。他说：“社会主义者应该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该按整体提口号，而不应按部分提口号”。③ 他多次批评机会主义者把部分当作整体，使整体从属于部分，用部分歪曲整体的错误。他还指出，在个别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吸取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提出了全局与局部的范畴，进一步说明和发挥了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

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以战争为例，对什么是全局，什么是局部作了较好的说明。他说：“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④ 就是说，任何战争都有它的全局。战争的全局，从横的方面说，包括着战争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从纵的方面说，包括着战争的整个过程，各个阶段。战争局部，是战争全局的一部分、一方面，或一个阶段。因此，所谓全局，就是事物的整体，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发展阶段的有机的统一整体，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总和；所谓局部，是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一个侧面或事物发展的某一阶段。这表明，毛泽东同志对全局与局部的含义作了科学的规定。全局与局部的界限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285 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555 页；《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62、217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357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9 页。

它是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一定场合为全局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局部的东西。反之，亦然。例如一国为一全局，这是相对于一省一市或一个地区而言。如果把世界作为一全局，一国就变成局部了。在战争中，师的动作若是全局，团营的动作便是局部；连的动作若是全局，班排的动作便是局部。

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阐明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指出全局对局部的决定作用，反复阐明全局高于局部，局部隶属全局的道理。他指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① 这就把战略、战役和战术的研究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加以阐明。在战略指导上，只有懂得全局，纵观全局，从总体上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局部及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使战役战术自觉地为战略服务。所以毛泽东同志告诫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② 还说："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③ 如果丢了主要的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一切革命者无论何时都必须牢固地树立全局观点，要时刻把工作的重心摆在照顾全局上面。这是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④ 因此，树立全局观点不仅对于处在战略指导地位的领导至关重要，而且对处于局部指导地位或一般同志来说也非常重要。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20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① 这就深刻地阐明了全局高于局部，局部隶属全局的道理。

毛泽东同志在强调全局高于局部，局部隶属于全局时，还注重局部对全局的反作用。他说："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② 这就是说，全局存在于局部之中，是不能脱离局部而存在的，没有全局就没有局部，没有局部也没有全局。但各个局部对全局的反作用不是均衡的，而是有大有小、有轻有重。为此，毛泽东同志以战争为例，具体地分析了不同的情况。一是，战争中某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对全局影响不大，因为这一局部对全局来说不起决定作用，因此，有些战术或战役的失败，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二是，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往往引起全局的变化，这时多数局部就起了决定作用，量变引起了质变；三是，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因为这个局部对全局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因此，毛泽东同志告诫人们要牢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③的道理。这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说的只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因此，"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④

那末，如何运用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去把握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毛泽东同志认为，这要用辩证思维的思想方法。他说："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有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⑤ 这就是说，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一种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科学的抽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在真实的丰富的战争感性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思考作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产物。由于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只要肯用心思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争中的感性认识是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只有将战争的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才能达到把握战争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即把握战争的总体及其全局的指导规律。正因为全局的这种特点，使得人们往往容易只注意局部，而忽视全局。为了明了全局高于局部、全局统帅局部的道理，克服认识上的局限性、片面性，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应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掌握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对指导实际工作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① 在经济建设上，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树立照顾全局的观点，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思想基础和重要保证，特别是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更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评那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见局部不见全体的本位主义或小团体主义倾向。但是，强调照顾全局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不顾局部。相反，必须在保证全局的前提下照顾到局部的利益。否则，全局的利益也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因此，必须将今天的利益与明天的利益，暂时的利益与长远的利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这就是全局和局部在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9页。

五　可能与现实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个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人们改造世界就是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因此，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经常遇到的一对范畴。也许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这对范畴的运用。

首先，他认为必须注意可能性和现实性、虚假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的区别。他说："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① 现实，是指当前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或现象。可能，是指包含在现存事物中的，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是潜在着的尚未实现的东西。可能不等于现实，两者决不能混淆。无产阶级政党在分析形势，制定方针、政策时，决不能从可能出发，而必须从现实出发。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② 毛泽东同志也反复指出，我们无论做任何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政策、方针和计划时，当然必须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方针和计划必须是以现实的东西，而不是以可能的东西为依据。因为可能毕竟只是可能，还不是现实，而且，只有从现实出发，才能正确地估计到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和多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条件。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复杂形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共产党和国民党通过谈判签订了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协定签定后，有的人认为和平已经实

①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第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页。

现，从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议会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则清醒地告诫全党，“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① 就是说，纸上的东西，还只是可能的东西，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如果把纸上的东西，可能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那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应区分虚假的可能性与现实的可能性。什么是虚假的可能性？他没有作进一步的阐明。但从他的整个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虚假可能性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任何客观根据的可能性，这种虚假可能性实际上把不可能的东西甚至是主观虚构的东西当作可能的东西，把这种虚假可能性与现实可能性混淆起来，其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二是，有一定的客观的根据，但又不充分，在目前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种虚假可能性是一般教科书中所说的抽象可能性。比如，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年产几千万吨钢向年产几万万吨钢转化，粮食亩产几百斤向亩产几千斤转化，并不是永远不可能的，但在当前的条件下，这种可能性还不能转化为现实性，还不是现实的可能性，而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亦即虚假的可能性。混淆了这种虚假可能与现实可能性，同样会给实践带来严重的危害。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离开了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把仅在将来有可能实现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实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就会犯“左”的冒险主义错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其次，毛泽东同志还十分强调指出，在考察事物发展时，必须估计到两种可能性。他说：“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002 页。

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① 又说：“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② 事物发展过程存在着两种相反的，甚至多种的可能性，是由事物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所造成的。在新、旧事物的斗争中，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是指发展总的趋势而言，这并不排斥在一定条件下旧事物有暂时胜利的可能。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和相互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但他并不否认中国有亡国的可能。他说：“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的斗争中。”“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③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告诫全党，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人民自然存在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两种可能：一个是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光明的新中国；一个是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黑暗的旧中国。我们的任务是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在估计事物发展好、坏两种可能性时，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充分考虑到坏的可能性，要向着变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对付突然的事变。这样做不仅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④ 在工作安排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2页。
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6—42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

上，作最坏的可能性设想，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就可以处于主动地位，不致于吃亏，防止坏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即使在坏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时，也不至束手无策，不知所措，而能有备无患，为继续争取好的可能性的实现而积极斗争。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两者是辩证的统一。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在全国解放以后，他还反复说明："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要准备出大事：世界大战，全国大乱、党内分裂等等。把工作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决不是否认好的可能性的存在，更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了争取实现好的可能性。

再次，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主观能动性在可能性变现实性中的重要作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一定的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的许可条件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正确认识和掌握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的客观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在社会运动中，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是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来实现的，因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主观因素的作用表现十分突出。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但仅有这些，还只有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还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他说："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性的了。"① 这种主观作用，决不是任意的妄为，而是要求正确认识客观事物中存在的条件，以及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具体条件，然后积极创造条件，为反对坏的可能性，实现好的可能性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反映了事物、现象的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不同的侧面和方面，表现着各自的特殊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455页。

性，但它们又有其本质上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客观事物和现象普遍本质的反映，各对范畴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都在实践的基础上随着认识的发展而发展，并反过来指导着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认识史表明，没有范畴，人类就不会有自觉的实践和科学的思维。恩格斯说：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①]列宁则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②]这就是说，范畴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对世界的最一般的本质、最普遍的矛盾的概括和总结；反过来，范畴又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而各对范畴之间彼此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在人们的辩证思维中，它们不是单独地存在着，而往往是一系列范畴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一起，综合地发挥着作用，这样才能真实地具体地再现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第四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

毛泽东同志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① 他还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② 毛泽东同志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解决军事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以及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等问题，并且取得很大成绩。这些内容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列宁在谈到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曾经强调指出，要注意从他们的《资本论》和其它政治历史著作中学习他们如何实际运用辩证法。我们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时也应当这样。

第一节　军事学说中的辩证法

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有一部分是军事著作。在这些著作里，他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来观察并解决军事斗争问题，并在研究军事问题时，把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作出哲学概括，上升为方法论，因而又是极为重要的哲学著作。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7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78 页。

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毛泽东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战争，尤其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实践。例如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揭示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揭示战略学与战术学中的辩证法诸范畴；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量变与质变的规律，研究战争力量的推移与转化；运用唯物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规律，研究战争发展的趋势与战争形式等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独特贡献。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些重要军事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以及他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关于军事问题的谈话和电报里，都贯穿和渗透着唯物辩证法的生动内容。由于把辩证法运用于军事学研究，毫不夸大地说，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理论。

一　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

毛泽东同志在其军事著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论述，指出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夺取战争和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一)战争与政治

列宁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策的另一种'(即暴力)'方式的继续'"。① 他还说："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怎样识别它呢？战争是政策的继续。"②

"战争是某一阶级以暴力手段施行其政治的继续。"毛泽东同志依据这一个基本观点，对战争下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定义。他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页。

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① 这一概括不仅说明了战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揭示了战争与阶级统治间的内在联系，还指出了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所谓"最高形式"，也就是各阶级、各民族、各国家、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能用一般手段来解决时，便诉诸于战争。用以扫除他们在政治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是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分析，也揭示了战争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同政治斗争的相互关系。只有把战争做为政治的特殊手段——暴力手段来研究，才能抓住战争的实质。毛泽东同志对于战争的起源和本质的概括，表现了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用历史的、具体的、阶级的观点来观察战争的能手。

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挥了列宁的思想，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论述，增添了新的内容。

首先，毛泽东同志运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阐明了战争与政治间的辩证关系。他写道："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依据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辩证分析，毛泽东同志批判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把战争和政治等同，另一种是把战争和政治进行人为的割裂。这两种观点各执一端，都是错误的。战争一刻也不能离开政治，就是说，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要反战争绝对主义者。② 但是所谓战争一刻也不能离开政治，是指一定阶级的政治总是渗透、贯穿、表现在战争中，并不是说战争和政治是一回事。例如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实行三光政策，是表现它处于帝国主义没落时期的法西斯政治。无产阶级军队中的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等政策则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② 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447页。

政治。在具体讲到政治与抗日战争的关系时，毛泽东同志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①

从辩证的观点看来，战争与政治有它们一致的方面，同时又存在着差别。战争不是一般的政治，它是政治的一部分，一个侧面，一种特殊表现。战争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一般的政治手段失灵，不能不用强力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战争的进行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组织和方法，一套特殊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轻视、抹煞甚至否定了战争的特殊性，就根本不能进行战争。战争又为什么结束，就是一方的强力手段为另一方的强力手段所制服，或者双方都精疲力竭，不得不用和平手段来代替。

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正就是表现了个别与一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列宁说："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②列宁所阐述的这个一般原理，正适用于批判战争与政治关系上的"等同论"和"割裂论"。列宁有时又用部分同整体的关系来阐述其关系。例如，当他谈到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兹讲的一段话时，曾在一旁批注道：战争＝整体的一部分、整体＝政治。(克劳塞维兹的这段话是："就战争本身来说，它是一把锋利而沉重的军刀，似乎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是压倒一切的东西。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447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409页。

但是把它和政治联系起来看时，它不过是一把随身佩带的短剑。人们用它来进行防刺、反刺和虚刺。”① ——引者注）列宁在批注中说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也还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对战争与政治间的关系作辩证的分析，始终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对脱离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又反对离开军事谈政治的“空头政治”。固然，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是片面的。反过来，认为政治好，就可以代替军事好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特别区分了战争的目的与战争的政治目的这两件事。他说，战争的直接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战争又有它的政治目的。这个政治目的或是为民族压迫或民族解放，或是为阶级压迫或阶级解放。它们的关系是，战争实行者通过战争的直接目的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二者相比，战争本身就成为手段了。

其次，毛泽东根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政治建军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军队建设中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并发展了要在人民军队中开展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并为此制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他坚持在人民军队中贯彻执行，形成我军的一整套优良传统。

强调政治建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否定军事工作的特殊性。从辩证法观点看来，一切真理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列宁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② 在军队建设中，强调人的因素的作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是绝对必要，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当林彪提出：“我们要从思想上想办法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

① 《战争论》第3卷，第140—14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17页。

量"时，就是越过了真理的界限，开始向荒谬方面转化了。"超过"和"代替"这四个字就使唯物论变成了唯心论，从辩证法走向诡辩论。因为它完全抛弃了军事的特殊性，把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这一论断中"特殊手段"四个字悄悄抽去。而林彪后来提出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正是由于取消了军事问题的特殊性而作出的完全合乎其自身发展逻辑的荒谬结论。

军事与政治正如战争与政治一样，是同一个事物的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两者既不能等同、又不能割裂。历史反复证明，以军代政或以政代军，都是用形而上学取代辩证法，都给实际工作造成极大的危害。中国革命中所发生的军阀主义、司令部对外和把军队变成文化军队这两种偏向，就是在两者关系上造成形而上学割裂的最坏的典型。而我们坚持军政统一、坚持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正是坚持战争与政治之间、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基本原则，正是贯穿了辩证法。

(二)战争与革命

战争与革命是战争与政治关系的一个侧面。政治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革命是由阶级斗争引起和推动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也是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质的飞跃。因此考察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必然要考察到战争与革命。

关于战争引起革命的明确论断是由列宁提出的，他最先揭示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与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之间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列宁说："不论在战时或战后，因战争而引起革命都是可能的。"① 革命潜伏在战争中。没有革命的发展，战争是结束不了的。以后，斯大林发挥了列宁的思想，也指出："战争一定会引起革命，并使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发生问题，就象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形那样。"②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6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1页。

战争是革命的导演，这是列宁提出的一个光辉论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挥了战争与革命相互联系的思想。他认为，战争固然可以导演出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更可以导演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民族民主革命。他在分析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时说，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成了革命的导演。还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他就预见过，国共第二次重新合作的局面将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①事变的进程果然证明了这种预见的正确。在这个时期，中国革命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从而为以后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德前总理阿登纳在评述这个历史性变化时说："在抗战取得胜利后，蒋介石曾经试图把(八路军和新四军)这股洪流纳入渠道，但是事态的发展已经达到除了走极端以外别无其他办法的地步。"② 这里阿登纳无可奈何地供认，战争对于革命无疑的是一剂极有效的催化剂。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里，又讲到帝国主义侵略同被侵略国家内部革命条件的成熟有密切联系。以中国来说，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准备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即既提供了工厂、铁路、枪炮、子弹，又播种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最后，唤起他们的觉悟并促使他们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他据此批评有些人总把敌人的压迫、杀人、被打入地下、党的组织缩小等等看成绝对坏事，把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猖狂进攻看成是绝对坏事。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对日本朋友说，没有你们的侵略和占领大半个中国，我们不能胜利。你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都来反对你们。并且，正是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解决了穿衣问题、吃饭问题、枪炮问题等等。可见，中国胜利来得这么快是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有关系的。

毛泽东同志对于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革命加速胜利这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5页。

② 《阿登纳、戴高乐论"中苏问题"》，第517页。

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的观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朝鲜、越南等各国革命无一不是由战争引起的，也无一不是由反侵略战争而最后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不仅肯定了战争与革命之间的相互转化，肯定了暴力革命规律是一条普遍的规律，而且运用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相互联结的原理，分析了在不同国度里，在有战争和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实行暴力革命原则的具体途径。他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①但是如何执行这个原则，则由于条件不同而不一致。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要经过一个议会的合法斗争阶段，一旦革命爆发，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但是另一类国家，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的情况下，则是从革命一开始，就要进入武装斗争，包括国内战争，也包括对外民族战争。以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思想受到林彪等人的肢解和割裂。他们片面地把井冈山道路说成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把中国革命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所创造的成功经验，无条件地运用于世界各国。他们甚至作机械类比，把亚非拉各国同西欧北美各国比作乡村和城市的关系。取消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种类型国家里的革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采取不同的方式和道路的观点。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〇年回答日本朋友安斋库治的问题时重申，他在一九三八年对不同类型的国家革命观点仍然有效。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革命爆发之前要不要经过一段较长期的合法斗争阶段，实际上是对议会斗争（或者说，用和平方式斗争）的评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同列宁的思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页。

想是吻合的，而同一些极左派们的观点迥然不同。列宁曾说："利用杜马（俄国当时的议会——引者注）讲坛，同利用其他一切合法机关一样，不能算是很高明的斗争手段，没有什么'光辉'可言。但是过渡时期之所以为过渡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特殊任务是要准备积蓄力量，而不是把力量直接用于决定性的发动。"①林彪等人只承认革命的一种类型，一个规格，不承认多种类型，多种规格，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替和转化，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一点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革命制止战争。

战争引起革命是指战争对于革命所起的巨大加速作用，而革命制止战争是指革命对战争的反作用。这两方面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互为因果的。这个思想也是由列宁最早提出的。他从事物的两个方面作了考察。一方面他认为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另一方面，革命也并不是消极地承受战争的作用而对战争则无所作为。相反，它给于战争以巨大的反作用。他指出："战争是由一定阶级进行的……。只有把政权交给另一个阶级，才能停止战争。"②列宁的思想是，既然现代战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那么，只有用革命手段消灭资本主义，才能废除战争的根源。

人所共知，列宁在分析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的基础上，曾发现了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条绝对规律。如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所预期的那样，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是不可能了。至于在少数国家里，革命取得胜利后，对战争（包括世界大战）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列宁没有做具体结论。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革命制止战争的理论。这是依据列宁逝世后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而作出的新的科学结论。

革命制止战争应当如何理解，是指战争根本不能爆发，还是

---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19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3页。

使战争推迟爆发。假如在世界性的战争到来以前，各国革命普遍发动，革命力量大大超过战争力量，前一种可能不是绝对没有的，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可能极小。剩下的便是第二种情况，即是使战争（指世界战争）推迟爆发。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期的著作里曾分析过，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带有永久和平的性质。这是指接近于永久和平，并不是断言永久和平马上实现。至于这里说的“接近”是指几十年还是指几个世纪，这要依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以后，毛泽东同志的多次讲话中提出这个问题都是指的同一个意思。在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说：“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力量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①在一九六〇年，毛泽东同志又说，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这里说的持久同前面讲过的永久，都是指的一个意思。即革命的发生可以打破敌人的时间表，推迟战争的到来。这样，革命制止战争与战争迟早会爆发这两个结论就不是矛盾的了。可见，要承认革命对战争的反作用，又不能把革命制止战争作绝对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了解。在这里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

二　战争中的人和物

任何战争，无论其规模大小，持续时间长短，也无论发生于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人和物总是构成战斗力的基本要素。

（一）人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战争中的人，是作为一定的政治目的的体现者，即使用特殊的暴力手段，以集群方式向敌对一方作生死较量的那样一种人。

① 见《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狭义来讲，是指军队；广义来讲，也包括除军队以外的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到战争运动中去的一切人。

战争中的物，也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物，是指在战争行为中人们用以杀伤对方人体及摧毁其军事设施，或者，反过来用以保护自己方面的人体或财物不受对方侵害的那样一种物。这种物是暴力手段的有机组成部分或称为机械的附属物。

战争中的人和物是缺一而不可的。战争之成为战争，就在于它是把政治意志凝聚在枪眼和炮口里。战争中的人和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它们不仅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而发展。归根结底，两者的变化都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至社会制度的变革所引起的。恩格斯说过，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而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战争中人的作用，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但是对武器和技术条件的作用也极为关注。他说：“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① 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还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 东西。”② 然而，在战争中，无论物的作用如何重要，毛泽东同志始终一贯的观点是：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物。

为什么？具体来说：

第一、在构成战斗力的两个要素中，占主动地位的因素是人，被动地位的是物。武器由人类制造，要人去使用。离开人，武器自身不会发生变化，离开人，就是毁灭性的武器也等于零。恩格斯说得好。“……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1页。

第二、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心的向背。非正义战争是失道寡助，虽有优势装备也不免败北；正义战争是得道多助，虽是劣势装备也必将取得胜利。

第三、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武器的优势是能改变的。武器既然是由人来制造，当然其优势对比也可以由人来改变。所谓改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二是夺取。在近代技术水平条件下，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就有一个东西降它。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在战争中经常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说过："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①

第四、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战争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上层建筑同人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一回事，不能混淆。上层建筑仅仅通过经济(即生产关系)这个中介物和生产有间接联系。战争本质是由直接维护那种政治制度和那个阶级利益这一点决定，而不是由生产技术水平所决定。虽然战争双方都是以自己的物质手段与另一方的物质手段相对抗，都以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为前提；虽然物质基础、技术条件对战争的面貌，乃至战争的胜负影响很大，但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从根本上说，战争是属于政治范畴而不是属于技术范畴。

总之，承认人的因素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它同精神决定一切，由个别人物的主观意志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论根本对立。承认人的因素起决定作用，就是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承认人民群众这一伟大的物质力量，就是承认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这个人决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页。

一定阶级的、一定经济地位的人。它表示哪个阶级，哪种势力在历史发展中是具有生命力的，而哪个阶级，哪个势力是行将灭亡的。这里的人是物质的人而不是脱离了物质条件的精神幽灵。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观点不仅同历史唯心论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正相反对，既反对了唯心论，又反对了机械唯物论，而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二)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唯武器论的特点是在对待组成战争的诸要素中，只承认武器的作用，并夸大武器的作用，抹煞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战争的性质，否认战争中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中相当普遍的观点。例如英国的福勒尔和利德尔、哈尔特认为战争的命运是由坦克来决定的。意大利杜埃等人认为战争的决定力量是独立的空军。此外还有什么海军优势论等。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党内外的唯武器论，毛泽东同志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①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同志都分析过，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的优劣而是人心的向背。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②他还说："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③战争的实践经验都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是科学真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的向背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唯武器论究竟错在哪里？需要从理论观点上搞清楚。

毛泽东同志对这一问题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他指出，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7页。

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强调人的作用时，丝毫没有忽视武器的重要性，而是用全面真理反对片面真理，是在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前提下，反对形而上学一点论。而唯武器论的错误恰恰在于将人与武器对立起来，片面地强调武器而排斥人，这正是形而上学一点论。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反对了两种片面性。一是重物不重人的唯武器论，另一是只重人不重物的精神万能论。

毛泽东同志对唯武器论的批判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完全一致。恩格斯在讲到人和武器的关系时曾说过："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① 列宁虽然也强调过武器重要，但讲到决定战争的胜负的因素时说："谁的后备多，谁的力量来源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② 斯大林虽然盛赞过武器（例如摩托）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用，但他并不把武器和技术的作用绝对化。他说："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材，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材，技术就能够并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③

唯武器论所以被称为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就是因为，唯武器论者在考虑战争时，把战争这个由许多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的统一体中，只抽取出其中的一个因素——武器做为观察战争的出发点。片面地夸张了武器的作用，不承认武器必须由人来掌握，不承认不同阶级的人掌握同一种武器会发生不同的效力，不承认武器的优势是暂时的。这样就使得武器的作用绝对化，凝固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10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82 页。

③ 《列宁主义的问题》，第 490 页。

使武器成为脱离战争有机体的孤立的东西。

唯武器论所以是一种机械论，还因为这种观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基本观点，战争是政治的另一手段的继续直接对立。按照战争是政治的另一手段的继续的观点，战争有它自己的政治目的。正是这种政治目的推动人们去参战，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战争中的精神因素，如军队的士气首先决定于战争的政治性质，因而也就是决定于社会及政治制度的性质，各国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性质以及在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而按照唯武器论者的观点，上述这一切通通都不占重要地位，重要的只是武器及其效能。其结果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武器优良者必胜，武器简陋者必败。这种观点恰恰是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侵略行为鸣锣开道。然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装备差的打败装备好的，武器差的打败武器好的是一个不可否定的现象。

唯武器论所以是一种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还因为它根本抹煞了战争规律的特点及其发展。虽然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进入了它的机器时代，这时战争更具有毁灭性和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全阶级、全民族甚至全社会的事业。因而也就带有相持的、长期的性质。列宁早就说过："靠雇佣兵或半脱离人民的帮会分子作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战争是由人民来进行的"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动员入伍的总人数约七千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则在一亿一千万人以上。现在战争已经不单是一两件武器的较量，而是成为了某一个国家在社会和国家制度方面，在经济发展和组织方面，在军队的作战经验、技能和士气方面，在整个战争中人民的坚忍和团结方面，总之，成为民族和国家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的全面考验。

---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32页。

唯武器论也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一个变种。它反映了资产阶级脱离人民，轻视人民并且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反动阶级本质，表现了资产阶级见物不见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表现了他们对于人民群众敌视和仇视的态度。因此，正确地理解战争中的人与物的关系，必须对见物不见人的唯武器论观点进行批判。

三　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规律是客观事物之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战争规律是战争这一事物之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因素的内在联系。它遍及于战争的全体，并贯穿于战争的始终，决定着战争的发展趋势。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战争问题时，依据事物矛盾之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着重阐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之间的相互联结，从而形成了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般战争有一般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有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战争的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① 因此，他着重强调，研究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②

从时间条件来看，历史上自有战争起，已经有三千至五千年的历史了。从中国的战争来看，自春秋时代的战争到以后历代发生的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农民战争，以至近代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没有两次战争是完全相同的。从外国的战争看，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各王国间的战争到后来的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再到后来的两次帝国主义战争，也没有两次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战争是完全相同的。斯大林说过："进行战争的方法、战争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发展的水平，首先随生产的发展而变化。在成吉思汗时代作战的方式不同于拿破仑第三时代，二十世纪作战的方式不同于十九世纪。"① 这种观察，符合于实际。

从地域条件来看，在不同地域所发生的战争，其特点和规律也不相同。一般说来，在参战双方其他条件相同或相当的条件下，地域广大比地域狭小要优越。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国苏维埃和匈牙利苏维埃同时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结果却迥然不同。匈牙利的革命烈火很快被扑灭，苏维埃俄国却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列宁曾说："过去和现在，挽救我们的是广阔的领土，可是匈牙利太小了，不能抗击所有的敌人。"② 其次，即便是其他条件不同，地域的大小对战争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特殊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日本进攻中国。尽管阿国作了全民总动员，但由于国小力薄，加之政治制度是封建君主制，因此，全国性抗战只坚持了七个月。而中国，地大、人多、特别是抗日战争得到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在这两个国家里，一胜一败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但地域条件不同无疑是构成胜败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同志在十年内战时曾说，中国地区广大、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说，由于中国地方大，坚持长期抗战是可能的，即使大半边天黑了，我们还是有办法。这就是说明地域不同影响着战争。但不能认为地域条件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根本因素。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小国对付大国必败。如果这样认识，就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战争的基本观点。古今中外，有无数小国打败大国、弱国战胜强国的事例。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奋力抗击凶恶的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就是很好的例证。柬埔寨革命力量战败了美帝支持下的朗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第503页。

诺集团，也是一例。因此，地理因素对战争胜败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战争的性质，是坚持正义战争的人民这一伟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打败强国的著名论断，正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点上的。

从战争的性质来看，有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也是不完全相同的。革命战争有着自己的群众性和人民性，而人民群众参加的战争要靠他们自己的自觉性。列宁说过，我们所以能够进行战争是因为群众知道他们自己为什么而战。相反，反革命战争的特点则是它的非正义性和反人民性。因为反动统治者往往靠欺骗和蒙蔽群众去打仗。列宁曾举出十八世纪一位普鲁士君主不打自招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士兵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那连一次仗也不能打。”① 因此，反革命战争不可能采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有一种机械论者的观点，以为既是革命战争，其规律大概就是完全相同的，其实大谬不然。革命战争固然有它的共同性，尤其有它的特殊性。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发生的革命战争，具有不同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不应当刻板地互相移用。以苏联的内战和中国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例。前者发生在一个革命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后者则发生在革命刚刚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前者处在帝国主义各国精疲力竭，而革命正在风起云涌之时，后者则处在帝国主义经过一段喘息之后得到了相对稳定时期；前者是为巩固胜利，后者则是夺取胜利。虽然这两个国家里所发生的战争，从革命力量这方面来说，都是以寡敌众，以劣势对优势。但由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国家政权，整个形势对它有利。而中国工农红军则处在四周白色恐怖下，它被长期分割在各个孤立的根据地里，并且经常要同几倍甚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页。

至几十倍兵力的敌人作战，整个形势是不利的。由于这种种原因，苏联内战是从城市到农村，其指导规律是速决的进攻战，而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则是从农村到城市，其指导规律是持久的防御战。

战争中的机械论者不懂得一切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把甲种战争等同于乙种战争、把彼时战争等同于此时战争，他们想成为用千篇一律的公式来指导战争的“万能”的战争指导者，他们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背离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不动论。毛主席指出，研究一切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这是反对战争问题上机械论的一副良药。也是唯物辩证法关于共性个性关系的原理在战争问题上的杰出运用。

任何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将领都很重视战争的特殊性。孙武子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① 在这里，他以朴素的辩证法反对了形而学机械论。克劳塞维兹也说：“……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个不相同的。”他认为，政治家和统帅应首先作出的最重大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而不致把它当成是另外的战争。② 他的这段话，也是以辩证法反对了机械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用唯物辩证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正是历史上辩证法思想的优秀成果的直接继续和进一步的发挥，也是对历史上一切表现于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从方法论高度进行了一次总清算。

(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也是发展的

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是变化发展的。那么，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指导规律是否也有它的变化发展呢？回答是肯定的。

中国革命战争，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共经历五个历史阶段。其战争类型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战争，即

① 《孙子·虚实篇》。

② 参见《战争论》第1卷，第53页。

便是同一类型的战争，其规律与指导规律也不完全相同。

从战争的条件来看。在几个革命战争时期，都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都是既有困难条件，又有顺利条件，而每一次困难和顺利的程度都不相同，每一次敌我双方强弱的状况也不相同。红军的战略指导尽管都是积极防御，但适应着不同时期敌强我弱的具体状况，战略方针曾经从第二次国内战争初期的游击战转变为后期的运动战，又从后期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初期的游击战。以后又依据具体情况依次发展为运动战与阵地战。可见，一成不变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没有的。

从战争的形式来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这是在当时国际国内的环境和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的条件下产生的，也与红军在国民党心脏地区存在这一点直接相连。当着红军远离敌人的心脏地区(转到陕北)，形势就趋于缓和了。而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后，此种局面便完全被打破。为什么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形态是敌我两方犬牙交错而不再是包围和反包围？这又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与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所以能够采取运动战形式，实行迅速分散和集中、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主动灵活地消灭敌人，使战略防御很快地转变为战略进攻，正是由于敌我力量的差距大大缩小，从而给人民解放军以广阔的活动余地。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我们已取得全国胜利，但尚未达到最后巩固的情况下发生的。战场不是在一个大国而是在一个小国里。由于战场狭窄和兵力集中，战争必然打得十分激烈。战略指导方针不会再是游击战，也不可能完全打成运动战，而是运动战与阵地防御战相结合。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发生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

从建立革命根据地来看，在每个革命战争时期，都建立过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根据地到抗日根据地，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根据地。但各个时期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也在不断地变化。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处于革命的低潮，毛泽东同志依据当时情况指出，建立根据地要有五个条件。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可缺少，尤其是半殖民地大国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两条，至关重要。而到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广大人民有很高的抗日积极性，只有具备三个条件，（即有一支抗日武装部队，战胜敌人和发动群众）就可以建立根据地。① 此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半殖民地大国这两条，就不再是绝对必要的了。在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曾经认为，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不可能建立革命根据地。后来，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观察有了改变。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曾建立过大块的东北根据地（另有大别山根据地等）。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指出，要“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人民解放军只要避开大城市和交通线，都可以建立根据地。其条件是有一支正规军，加上搞土改和发动群众。这时，尽管蒋介石在美帝支援下，用陆海空三路向东北运兵，同我进行激烈争夺，但由于我党采取了正确方针，很快地按原定方针建立起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总之，无论就战争的特点、战争形式和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来说，都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战争规律是没有的。

从目前来看，重要的是要着眼于特点和发展，努力研究和掌握现代战争的规律，把毛泽东同志军事理论同现代战争的特点结合起来。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说：要“居安思危”。叶剑英同志在其军事论文里，又引用古人的话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危险就存在一天，只要战争存在，毛泽东军事理论就不会过时，因而对毛泽东的军事理论、特别是对其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2页。

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就更是十分必要。

对于如何把毛泽东军事理论、军事辩证法的思想运用于现代战争，是发展我国军事科学的一项迫切任务。首先要肯定，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当代来说是最先进的。他把唯物辩证法全面地、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在当前还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军事理论中若干基本原则和对辩证法规律在战争中的运用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不会过时。但必须看到，战争理论是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也必须同现代战争的特点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相结合的产物。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这就深刻地阐明了随着现代战争实践的发展，指导战争的理论和原则也要随着变化和发展。

四　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研究战争，不仅要研究战争的客观规律，而且要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这就是战略和战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创造了一整套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解决了如何指导战争的问题，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丰富多采的，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中极为重要、极为精彩的部分。在这里，仅从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集中与分散、主动与被动等方面略加叙述，进一步说明毛泽东军事学说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杰出贡献。

（一）进攻和防御

进攻和防御，是在任何战争中交替使用的两种基本战斗形式，是实现战争目的两种基本手段。从形而上学观点看来，防御只能是防御，进攻只能是进攻。但是从辩证法观点来看，它们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单纯防御或专守防御，而主张积极防御或攻势防御，指明了进攻和防御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东西，是防中有攻，攻中有防。而不是绝对对立、彼此隔绝的东西。

历史上一些剥削阶级的军事家尽管宣扬战略进攻的好处，但也指出过防御有其独到的优点。如著名的军事家孙子就提出过"以逸待劳"的战争原则。他在"虚实篇"中曾说："凡先处战地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德国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兹在《战争论》里也指出过防御的优点。他说，据守比夺取容易。防御者可以利用进攻者未能利用的时间，防御者可以坐得其利。防御者还可以利用进攻者因恐惧、迟钝而没有利用的时机。①

虽然，以往军事家都从某一个方面分析过防御的优点，但都不能把进攻和防御有机地结合来。只有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只有人民群众挺身而起，为保卫祖国和家乡而战，才可能把攻和防灵活地加以运用。苏联理论界在评述斯大林的军事理论时曾说："苏维埃军事艺术科学地解决了现代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基本问题，重新制订了和采取了象反攻这种卓越的作战方式，也就是苏联以积极的防御来消耗和削弱进攻的敌人，然后予以反突击。使之逐渐发展成为总的和坚决的反攻。"②

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军事形而上学，坚持了军事辩证法，为我

① 参见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第 2 卷，第 642 页。

② 见《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第 53 页。

军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① 这就把进攻和防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论持久战》中，关于敌我之间的犬牙交错，就是积极防御方针的具体体现。其中关于内线与外线(夹攻敌人)，主力军后退与游击队前进，形成前进与后退的奇异形态。在论述有后方与无后方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以国家为总后方的是主力军，有小规模后方的是游击队，但游击队派出的临时作战部队也可以无后方。在包围和反包围中，毛泽东把进攻和防御运用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数层包围与反包围，并预言：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在大块与小块中，他主张利用攻势防御把大块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区，而小块是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变为落后和黑暗区。毛泽东同志称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所有这些大块与小块，包围与反包围，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等形态，都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把进攻和防御辩证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攻中有防、防中有攻。不仅过去如此，就是在未来战争中，当敌人深入内地以后，也必然会采取这种进攻与防御相结合的战争形态。

(二)持久与速决

持久与速决，是战争中的时间概念，是战争中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结。所谓持久是指某一次军事运动延续的时间较长，所谓速决恰恰相反，是指该军事运动迅速发动、迅速结束。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孙子曾说："兵贵胜，不贵久"，原因是：每战"日费千金"、"久暴师，则国用不足"。①因此他认为，一个指挥员即使再笨拙，也要求迅速取胜，没有听说用兵巧妙而拖延时间的。到了近代，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仍认为闪电式的突击是在战争中取胜的重要手段，例如克劳塞维兹就说："愈是将兵力集中使用于同一场合和同一瞬间，就愈能取得最大的效果。"②

毛泽东同志用辩证的观点考察这一问题，他认为，速决固然有其利，但非全利，持久固然有其弊，亦非全弊。

速决战的长处是：人力物力消耗少，对各方面影响较小，容易组织、容易指挥、又容易表现军事运动之快速性与流动性的优点。速决战的缺点是：其一，战略速决只适用于对付小国、弱国和毫无战备之大国，对于有准备并全力抵抗的中等以上的国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其二，即使以战略速决取胜，也只能解决军事占领的目的，不可能最终征服民心，相反，还一定会引起被侵略者的激烈反抗。

同样，对持久战也要一分为二。一方面持久战有耗费较大、军队疲劳、人民受苦，弱点易于暴露等缺点，另一方面，持久战又可以利用广大国土、动员众多兵员，逐步积蓄力量，尤其在革命战争中，采取持久胜敌的方针，既可充分暴露敌人的残暴，又使广大军民习惯于战争，实为致敌于死地的良策。毛泽东同志说："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但紧接着又说："唯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③

毛泽东同志不仅科学地阐述了持久与速决的辩证关系，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战略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战略持久战中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而以战役

① 《孙子·作战篇》，《十一家注孙子》，第31页。
② 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第1卷，第22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8页。

战斗的胜利实现战略的持久战，进而转化为战略上的进攻战。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

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在战略上要求持久，是因为反动势力雄厚，而革命势力的生长与发展只能是逐步的，这就需要时间。因此，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计划是不好的。但战略的持久又必须有战役战斗的速决与之配合，这是因为，只有战役战斗的速决集合了很多，并都能迅速地获胜，才能使敌人停止进攻或减慢其进攻势头，也才能达到战略持久之目的。

当然，战役战斗的速决，说来容易，实行起来颇难。这需要有战役战斗的充分准备，不失战机，集中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选择有利阵地等。

战略持久也不会是无限制地持久下去，它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为战略速决，其条件是我方力量超过敌人。因为到了这时，进攻则变为基本手段，而防御则是局部的了。

（三）内线与外线

内线与外线是战争中的空间概念，是指进攻或防御的范围而言。内线是双方交兵在自己的占领地内进行，外线是双方交兵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一般说来，防御者处于内线，进攻者处于外线。

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法，对内线与外线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说明。他认为，内线与外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双方实际情况，揭示了红军以少胜多的秘密之一，就在于适时地将内线变作外线。他说，处于战略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强敌“围剿”中的红军，蒙受着许多不利，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中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变成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这样，对敌军来说，形成了外线中有内线的态势，对我军来说，形成了在内线中有外线的态

势。例如，第二次反"围剿"，就是红军变内线为外线的典型战例。当时，敌以二十三万强兵对我军三万，敌七倍于我，但由于敌散布在山川阻隔的广阔地面中，不进展到一定位置，各路兵力很难相互支援。于是我采取"分兵法"，分别与敌军多路作战，共战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多支，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古代兵法家孙子虽未提出战争中之内线与外线的科学概念，但对战争中空间的利用也极为重视，他曾举六种地形，即通、挂、支、隘、险、远，"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察也。"①克劳塞维兹也认为，同时使用自己的土地、山脉、要塞、河流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使用自己的兵力是可能的。因为前者是死的，后者是活的，是可以运动的。即主张处于劣势地位之一方，可以主动变换自己作战的空间位置，把兵力撤到对自己有利的方位上，选择进攻时机，在局部实行突击，使敌之多部弃之无用，我则在集结点上兵力倍增。

毛泽东同志还具体指出：第一，可使主力军处于内线，游击队处于外线，形成为夹击敌人的奇观；第二，当敌置于外线对我主力实行包围时，如若顽敌死盯住我根据地而久留不去，应采取"围魏救赵"一法，即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外线解决战斗；第三，为了变内线为外线，应着力于打运动战，因为此种方针是将"进攻"、"速决"、"歼灭"这三项合而为一的最佳作战方针。

(四)集中与分散

在战争中，兵力的分散与集中是矛盾的两个侧面，二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组成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马克思十分重视战争中的集中兵力问题。他曾说："根据一

① 《孙子·地形篇》，《十一家注孙子》，第247—248页。

般的作战原则，兵力远居劣势的军队如果不设法集中自己分散的队伍，反而自行分为两部，中间为敌军整个隔开，那末这只能使敌人毫不费劲地就把他们消灭掉。”① 列宁把集中兵力问题提到规律性的高度。他深刻地指出：“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优势，——这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同时也是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② 兵力的集中，也为历来的军事家们所重视。拿破仑在讲到他的战略时曾说：全部军事艺术在于：在必要的时候，在必要的地方，集中比敌人在此时此地更大的兵力。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除了打仗之外，还要发动群众。因此在整个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必须把分散与集中结合起来。即使在战场上，由于革命战争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不怕陷于孤立，该分就分，该合就合。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军极端幼小的情况下进行广泛的游击战，尤其要注意把分散与集中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集中兵力的问题，但又反对把集中兵力绝对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曾主张一粒子弹，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的手中。毛泽东同志反对这种做法。他说：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人民游击战争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军而无人民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我党从创建根据地的第一天起，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到抗日战争时期，对军队的分散与集中的问题，运用得已相当纯熟了。

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依形而上学观点看来，分散与集中是绝对对立的，不能相容的。他们认为，我军兵力少，再行分散，是自取灭亡。但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分散与集中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分兵发动群众与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同一支军队说来确实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30—33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21页。

有矛盾的。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把全部和局部、长远和暂时辩证地统一起来。例如在抗战时期，之所以分散兵力是根据当时战争的性质与敌情的特点决定的。一是日本以少兵临大国，兵力严重不足；二是以少兵临多兵，我们正规军虽不多，却获得最广大人民拥护；三是敌在异国作战，兵力孤单。除这些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之外，加上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出现了广大空间地带，就便于我们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分散兵力，人员减少，看来是弊，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由弊转化为利。小股力量机动灵活，便于灵活巧妙地隐蔽自己和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正因为散，使我军隐伏在人民群众之中发挥其威力，而敌人则陷入了天罗地网。由此可见，利和弊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

从辩证法观点来看，分散并不否定集中。分散是相对的，分散之中有集中，由分散到集中是更高基础上的集中。在党的七大时，毛泽东同志曾说，有人把打大仗当作“民族英雄”，而麻雀战是“机会主义”，可是，用麻雀战的办法使军队集中到九十一万、麻雀长成了野鸡。这是集中与分散的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五）主动与被动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在战场上争取主动权的重要性。他说，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就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迫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他还说：“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①

毛泽东同志还进一步分析了战争中争取主动权的可能性问题。他说，战争中的绝对主动和绝对被动是少见的，常常是相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7—458页。

地被动或主动。绝对主动性往往出现在战役最后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因此，通过主观努力，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不承认争取主动权首先要具备一定客观条件，是拼命主义和冒险主义，是军事理论中的唯心论。但是若把客观条件凝固化，否认在运用客观条件时，有会用与不会用的区别，就会变成逃跑主义与失败主义，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孙子兵法上讲到构成战争的五要素时，其中道、将、法三条讲的是主观能动性。道，是指上下同心协力；将，是指是否善于用兵；法，指规章条例、军备计划。三者都是讲人的主观因素。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争取到主动呢？根据我国三次革命战争的经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集中兵力，即集中大量而有活力的军队。为了集结军队，就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内线与外线、人和地的相互关系。即在全局上处于被动地位时，要力争局部主动；在内线作战处于不利地位时，要打到外线去；在战略上持久时，在战术上要速决；在人和地发生矛盾时，要集中兵力首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样，在局部范围内先争取主动，当这种主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可以在全局上变为主动。

孙子兵法中很重视用集中兵力的办法争取主动权。他曾说，重在分敌。如在《虚实篇》里提出："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共其一也。"他主张在战场上以众击寡。在《虚实篇》里，又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是脱出被动转为主动的方法。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在研究战略战术时，根据战争规律及其特点，提出了许多反映战争各个方面的战略学和战术学的军事范畴。除了上述五对军事辩证法范畴外，还有全局与局部（前面已作了论述）、量与质、直线与曲线、运动战、游击战与阵地战、

歼灭战与消耗战，等等，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论列。

第二节 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

统一战线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又是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中的一个法宝。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里，毛泽东同志都运用这一法宝，作为团结人民，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有力地打击敌人的犀利武器。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出色地应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其中极其困难和极为复杂的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增加了新的光辉。

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继承和吸收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重视革命同盟军与后备军的科学理论，并依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毛泽东同志认为，弱小的革命力量若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设法使敌人孤立起来，而要孤立敌人就必须有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从他早年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到以后所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政策》、《〈共产党人〉发刊词》、《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等文章中，都反复地申述了这一思想。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所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对于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六条带根本性的规律。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①

毛泽东同志在解决统一战线问题时，对于唯物辩证法进行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1页。

示范性的应用，表现在他不仅善于在科学地分析政治形势的基础上捕捉在各个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而且表现在他善于处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善于把握事物的中间环节和过渡状态，以及善于运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相互关系的原理，来制定在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一　善于捕捉各个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确定主要的打击对象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又说，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考察中国革命中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时，首先是依据阶级关系的变化，着力于捕捉当时发生的主要矛盾。在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影响到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国反动势力的不统一，而由于这种不平衡和不统一的状况而引起的主次矛盾的交替和变化，正是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枢纽。

由于近代中国是世界东方矛盾的焦点，几乎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中国插过手。固然，中国作为被压迫民族是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然而无论就力量对比还是就革命策略来说，都不能企图在一个早上把所有的帝国主义通通赶跑。现实的情况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常常是一个或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人民构成现实威胁。我们的方针必须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打击主要的敌人，而不是主观主义或形式主义地打倒一切。例如，在我国民主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就跟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分别构成主要矛盾。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锋芒主

要是指向北洋军阀，而扶植北洋军阀的英、日帝国主义是主要的民族敌人，美帝则是其帮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英帝国主义支持叛变革命的蒋介石镇压中国革命，因而是主要的民族敌人，而美帝则是其帮凶。由于在一九三一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它侵占中国的东北，进而占领华北，并妄图吞并全中国，这就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构成主要的民族矛盾。在这个时期，轴心国中其他两个国家，即德、意帝国主义则是它的帮凶（当然，美帝国主义在七七事变前实际上也作过日本的帮凶）。抗战结束后，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整个解放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个时期，美帝国主义始终是中国最主要的民族敌人。这清楚表明，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中国人民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其它事物一样，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活生生的、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是波浪起伏、交替突出的。只有善于把握这种发展和变动，才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中的主要矛盾的分析以抗日战争时期最为典型。在抗日战争到来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应用唯物辩证法中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观察了中日民族矛盾在整个中国革命中所占的位置，并指出捕捉这对矛盾的极大重要性。在一九三五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开头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里，对于急剧变动着的政治形势又作了更具体的分析。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使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的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和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使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退入次要地位，并使这些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由此，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乙、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这样，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

……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的阶级间的矛盾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和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于当时民族矛盾，特别是中日民族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矛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时所作的完整的分析。这是经过了历史检验的合乎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正是这种分析提供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

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逐步转变为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大众重新处于公开对抗的地位。于是，中国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中国人民大众与美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这个时期，统一战线的目标是针对美蒋反动派，而不是打倒一切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毛泽东同志又及时地抓住了这一时机，制订了新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其中说："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 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毛泽东同志指出，从表面上看来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比起抗日时期来，似乎是缩小了。但实际上，由于我党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使我党获得了比抗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1页。

日时期广大得多的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石统治区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迫使他们不断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他们的觉悟程度达到了在抗战以前、抗日时期以至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一个时期的从未达到过的程度。因此，在这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和巩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国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已基本解决，由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已让位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他指出："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① 不仅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还要团结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毛泽东同志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民族矛盾的现状及其历史演变作了准确而又精细的分析，才使得我们对于解决这些矛盾有了极为明确的方针和策略。例如在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他说："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还没有举行侵略的其它帝国主义，加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页。

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同盟承认‘满州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① 由于运用了这样的方针，使我们在每个革命时期始终只有一个攻击的主要对象，而不是到处树敌。这样就大大加快了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获得独立、解放，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步伐。

列宁在强调捕捉主要矛盾的重要性时曾说过："擒牛先擒角"。他还说："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② 毛泽东同志也引用过唐代诗人杜甫写的《前出塞》中的诗句："挽弓先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捕捉主要矛盾在现实斗争中的意义。上面所述的毛泽东同志对各个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以及同一个革命时期主要矛盾性质的变化的分析，正是提供了抓主要矛盾的极好的范例。也正是由于他善观变化与善择时机，就使我们没有失掉任何一个可以致胜的机会，而同时又大大减少了横亘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阻力。

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文里，在总结这个科学的思想方法时，将正确路线与"左"的路线作了比较。他说："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例如，过去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亲英、亲美的和亲日的。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侵略势力，打倒亲美、亲英的买办集团。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还必须分别大地主和小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49页。

地主。在一个时候，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击少数，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① 这是对在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的思想，作了概括和总结。

二　具体分析统一战线中各派政治势力的特点，具体地解决具体的问题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除了首先应确定主要打击对象之外，在统一战线内部，还要善于处理革命领导者同各部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势力概括为左、中、右，并依据它们自身特点，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什么是统一战线中的左派？这是指革命领导力量及主要依靠力量。而中间势力是介于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之间的一部分社会势力。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再说。这里只通过在对待右派的问题上，我党和毛泽东同志是如何运用辩证法的。

所谓统一战线中的右翼，是指和敌对阶级联系比较密切，反映敌对阶级倾向和要求比较明显的那一派。至于在每个革命时期右翼的具体内容，那是不同的。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一般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右翼，但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则是由右翼变成中间派。而原先是敌人的国民党则由于加入统一战线，而由敌对势力变为了革命队伍的右翼。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本来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对象，但由于中国特殊历史条件，民族资产阶级从总体来看是争取对象，是属于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联盟，是中间势力，而只有其中一部分坚持反动立场，并屡教不改的，才是革命队伍中的右翼。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9页。

在如何认识与处理革命派与右派之间的关系上，以抗日战争时期对待顽固势力的态度最为典型。我们以此为例，来说明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于统一战线中右派的政策。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国内，除了极少数汉奸、亲日派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之外，留在抗日营垒中的，包括三种势力。这三种势力是，以共产党为代表和以工农劳动群众为主体的进步势力，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和国民党为代表的顽固势力。这三者互相影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组成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为形式的矛盾统一体。毛泽东同志说："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①

所谓顽固势力，在当时是以国民党反动政权为代表。这股势力在过去的十年内战中对共产党和红军采取过血腥的屠杀政策，同人民结下了血海深仇，那么人们会问，同这样的敌人再度合作是可能的吗？按照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规定性的观点，这是决不可能的。他们的逻辑是：敌人便是敌人，不会变成朋友。可是，从事物的多种规定性的观点看，这是可能的。

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是英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代理人，当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在华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是会遵照其主人意志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还在一九三五年，毛泽东同志就预见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有破裂的可能性，后来事变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种预见的正确。为什么西安事变会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什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会最终参加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这是因为受到了外在和内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于是突出了事物的一种规定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而暂时地限制或压抑了它的另一种规定性。这些因素具体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打"，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推"，全国抗日浪潮的"逼"，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这打、推、逼、促的因素组成一个合力，加之国民党自身的两面性(既抗日又动摇、既反共又不愿根本破裂国共合作)，使它暂时地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即从"战争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①

但是，当着国共合作建立起来之后，有人却只看见它变化了自己政策这种规定性，而忘记了它的反动本性不变的另一种规定性，抹煞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区别，把抗战究竟依靠谁的问题弄颠倒了。结果在纠正了左的错误之后，却重犯了右的错误，从关门主义变到投降主义。

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公式是：敌人就是敌人。他们不分主要敌人与次要敌人，不承认过去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是朋友，虽然很想把一切敌人都打倒，结果一个也打不倒。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公式是：敌人既变成朋友，就只能"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现在"一道抗战"，将来"一道建国"，同他们作任何形式的斗争都是危险的，不许可的。

这两种表面上对立的观点，正是表现了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共同的片面性。即只承认事物只有一种规定性，而否认或抹煞了其他规定性。因而也就不能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事物，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事物的多种规定性，坚持具体真理，既看到反共顽固势力的参加抗日营垒的可能性，又看到它在对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虚伪性与欺骗性。在斗争时不忘记团结，在团结时不忘记斗争。针对顽固派"抗日又投日、联共又反共"的反革命两面政策，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51页。

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加以孤立的政策。正因为毛泽东同志看到事物的多种规定性，始终不为客观环境的变化所迷惑，并能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从而保证了整个抗日战争能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顺利进行。

从方法论来看，辩证法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它的多种规定性。只见其中一种规定性，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便是片面地看问题。是无任何真理可言的抽象的规定性。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反复申述过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质上就是坚持把握事物的多种规定性，即坚持具体真理而反对抽象真理。什么是具体？马克思说过："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 是否能剖析事物发展中的多种规定性，并分析这些规定性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是能否做到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的关键。毛泽东同志对顽固势力的辩证分析，是运用辩证法的又一杰出范例。

毛泽东同志对于反共顽固势力，强调了既要团结，又要孤立的政策，而且对不同的顽固派要实行不同的联合和不同的斗争。这突出地表现在我们同反共顽固派的斗争原则上。当着反共高潮到来时，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但在抗日统一战线存在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坚持斗争的局部性、防御性和暂时性，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限度。即第一是有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打第一枪。第二是有利，"来而不往非礼也"，"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第三是有节，即斗争要有节制，适当的时候须"退避三舍"，不能无限制地斗下去。这三条原则深刻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对斗争的正确理解。尽管斗争是绝对的，而斗争形式却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

既然国内的阶级矛盾(包括同反共顽固派的矛盾)，在中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的大前提下，需要作适当调整，那就有一个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对立的阶级和阶层间互相妥协和让步的问题。列宁在谈到让步和妥协问题时说："为了同别的政党达成协议而在某些要求上让步或放弃自己要求的一部分。这在政治上叫做妥协。"①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一个矛盾的双方都是又同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某个具体矛盾来说，斗争是主导的，在另一种条件下，同一是主导的。也就是说，前一种情况下要强调"斗"，后一种情况下要强调"合"。当着后一种情况出现时，针对矛盾发展的具体情况，想办法用特殊方法把对立面统一起来（例如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因为了推动矛盾向前发展。列宁说过，正是因为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所以"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并且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② 这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侧重于坚持对立面的统一不仅不违背唯物辩证法，而恰恰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反对了形而上学。

有一种看法是片面的，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他们拒绝作任何妥协，在军事上，他们把必要的退却和逃跑相混淆，在政治上把必要的让步同投降相混淆。他们要求"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

另一种看法是片面的，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他们把妥协神圣化、绝对化，鼓吹无原则妥协，以至放弃自己的自主权，甚至背离革命纲领，在妥协、让步的借口下实行变节。

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也就是依据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不同条件下的妥协区别对待，而为要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须承认具体真理而反对抽象真理。因为"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29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页。

成的"。①列宁说："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②毛泽东同志在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具体地分析了各派政治势力的特殊性，做到了具体地解决具体问题，坚持了真理的全面性、具体性，而反对了片面真理和抽象真理。

三　坚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法，制定在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毛泽东同志说过，"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③把这一辩证法原理应用到统一战线问题上，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要兼顾统一性与独立性这两个方面，也就是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原则。而且依据对象与任务的不同，有不同程度的联合，又有不同程度的斗争。

这里说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原则，主要是对中间势力，而其中又主要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说："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④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同我们一道反对帝国主义，要同他们讲联合，而由于他们同封建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对反封建无兴趣，而他们又是压迫剥削工人的，因此要同他们作斗争。

但是对他们的斗争要适可而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发展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恩格斯在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和其他革命阶级采取联合行动的同时，又指出："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有它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

---

①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第210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第20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9页。

策。”[①] 列宁也说，“保护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的经常不变的和肯定无疑的义务。[②] 恩格斯和列宁都强调在和资产阶级合作时，要保持自己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但究竟应当如何做，还要以新的经验作补充。

依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要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既不能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毛泽东同志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这两个敌人有矛盾，就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两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正是基于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个两面性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同志认为，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因为这两者都是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中发展和锻炼出来的。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总结了中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449—45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29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21 页。

兼顾联合和斗争两个侧面，并不是说没有重点。由于事物的变化、发展和矛盾的不平衡性，有时强调统一，有时又强调斗争。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反共高潮到来时，民族资产阶级发生了极大的恐慌与动摇，应强调斗争，而在反共高潮过去后，则应强调统一；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反动派压迫、欺骗和排挤民族资产阶级，剥夺其生路时，应强调统一，当蒋介石国民党失败大局已定，而民族资产阶级又幻想走第三条路时，则又应强调斗争；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后，当民族资产阶级拒绝接受或企图摆脱无产阶级的领导时，应强调斗争，而在其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则又应强调联合和统一。

联合与斗争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渗透和互为条件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是，在斗争时又“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总之，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

第二，为了实现团结，即联合，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①

关于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敌人作斗争，并取得胜利这一点，是要从远处着眼，从近处着手，把远大的革命理想与具体的斗争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而且理想与现实是不断地转化的。作为理想主义者，他必须随时教育被率领的阶级、阶层和个人不要失掉共产主义大目标；作为现实主义者，他又必须用斗争来证明，这些目标是可以逐步实现的。毛泽东同志总是教育无产阶级要以自己的坚定性，克服其他阶级的动摇性，要以自己斗争的彻底性来不使革命半途而废。马克思早就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6页。

说："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而我们的利益（指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①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虽然说的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原则区别，但是，实际上也概括出了一切非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革命坚决性方面的原则区别。毛泽东同志在为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斗争中，非常重视这一点。他在每一次革命转折的关头，总是教育被领导阶级要继续前进，不要掉队。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教育农民不要解甲归田，在实现土地改革之后，又进一步教育和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则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应教育他们要继续同工人阶级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他们"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他并且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提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在讲到以后还要过社会主义关时，又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②毛泽东同志这些话正是体现了他所说的要对被领导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不断地指明前进道路和努力方向，并用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4—3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27页。

但是，对同盟者的教育同对敌人的斗争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教育而没有斗争或斗而不胜，教育就不可能有说服力。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后来，当革命取得节节胜利，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后期，许多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又重新向共产党靠拢，说明革命力量的发展如江河奔泻、势不可挡，革命必胜，反动派必败，已成为历史必然。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在讲到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的关系时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①说明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除了对敌斗争和政治教育外，要使统一战线长期存在，还要有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作补充。

马克思主义要讲现实，搞统一战线也要讲现实，各个阶级之所以愿意跟着共产党，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代表了他们目前的和长远的利益。毛泽东同志总是把义和利辩证地结合在一起。他曾说，我们不能做董仲舒，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他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们说，说到唯利是图，共产党也唯利是图，不过不是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是图，而是唯人民利益是图。在一九五八年，他又驳斥了那种对于共产党的政策说成是"急功近利"的观点。他说，就是要急无产阶级之功，近人民之利。在土改中和对于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这一点表现得极为明显。

在土地改革中，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判那种"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而是应当是"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②他又指出："土地改革的对象，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1页。

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①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必须以地主土地财产的一部分分配给中农中的较贫困者，对于富裕中农则不要损害其利益。在农会中和乡区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并须在数量上作适当规定（例如占委员的三分之一）。不要错订中农的成份，对中农的土地税和战争勤务要公道。”② 如无这些，工人阶级就会失去中农的拥护。在同一时期，在城市中，对中产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也均如此。③

在建国以后，鉴于革命胜利而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从而加重了我们的负担，又由于战争带来工商业的某些破坏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不满，毛泽东同志及时指出，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必须把思想教育与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相结合。他说：“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④

毛泽东同志不仅用这个办法解决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用它解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例如他在为《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就提出，在我军进藏之后惟有两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6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23页。

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第二条就是打通与印度和内地的贸易关系，不使藏民生活下降，并使之有所改善。①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原则，即既要兼顾统一战线中的联合与斗争两个方面，而在联合时又注意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两个方面，不仅可以用来处理国内统一战线间相互关系，它甚至可以用来处理国际统一战线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同其它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应当是坚持原则，平等互利，这个团结才能巩固，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是不能搞好这些国家间的团结的。这是唯物辩证法在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光辉运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第三节　党内团结的辩证法

自从无产阶级投入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来，就开始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因为他们从实践中懂得："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②

无产阶级政党要有战斗力，就必须保证党内团结，这种团结不仅是指在纲领和策略问题上的一致，而且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几位革命导师，都十分重视和珍惜党内的团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等著作里，从共

---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1—62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510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482页。

产党的理论基础，策略原则，与其它政党的区别等几个方面十分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等著作里则着重阐明了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斯大林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里，除了申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一贯观点外，还对于共产党内产生矛盾的根源，党内矛盾发展的规律及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以及所有这一切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都作了考察。

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代工业和现代无产阶级的比重很少，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并实现这个政党内部的团结，确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根据前几位革命导师已经明确的建党原则，参考列宁亲自创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范例，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党内矛盾的特殊性，去探索实现党内团结的方法和途径，为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尤其是在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上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

一　正确分析党内矛盾的根源和特点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前提

一分为二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普遍现象，无论什么事物都有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共产党是世界上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一个具体事物，当然也是一个充满着自身矛盾斗争的统一体。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并不能说共产

党内的每个成员都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进入共产党的人，并不都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乃至百分之十或二十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内并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并不是一进了共产党就都是圣人，①我们党从总体来说是团结的、统一的，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党内就没有任何分歧、争论、隔阂、误会等等，相反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②正因为如此，就有一个党内团结的问题，而要实现党内团结，又必须先要对党内矛盾的性质和根源有一个正确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说，党内矛盾和斗争，"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③这是对党内矛盾产生的原因及性质所作的原则的、科学的规定。这个规定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

斯大林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一文里，曾对党内矛盾作过如下分析。他认为，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第一，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并具体地说明，这种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④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例如就俄国说，有三个阶层，即"纯血统的"无产者群众；不久以前才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工人贵族。⑤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7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
④⑤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01—502页。

毛泽东同志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这一问题又作了具体分析。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①由于中国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由于社会的政治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在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这样，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占了大多数。即使是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②这些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由于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所以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他们以自己的本来面貌改造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多次错误路线与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其实质，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同无产阶级革命性之间的斗争在党内的表演。

在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时期中，毛泽东同志历来认为，中国党内之发生斗争，主要是来自小资产阶级给予党的思想影响(一部分是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从一九二九年间起草的"关于古田会议的决议"，到一九四五年间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到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所作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中，都说明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党内错误思想和路线的阶级基础。他反复说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动摇的。③"又说过，党内一百万中小知识分子也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至于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平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但却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1页。

的”。①毛泽东同志列举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许多优点，说明这个阶级理当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党内矛盾的根源的分析，也有一些变化。他逐步地把资产阶级对于执政党的影响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将要发生的转移，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告诫全党同志要警惕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指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②所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③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二年三月间，他在《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中，把反贪污，反浪费看作是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其目的是为“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④在一九五三年八月间，他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为题的讲话里，则进一步提出了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的问题。

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一月，鉴于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毛泽东同志又说：“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⑤ 同时鉴于一少部分官僚主义者同群众的矛盾，又及时告诫掌握着国家命运的县委以上的几十万干部，“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⑥而且说，对屡教不改的官僚主义者，群众有理由“把它革掉”。

毛泽东同志在强调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思想影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6—137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0—33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6页。

的同时，也指出过封建思想的影响。早在一九四五年他就指出，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就包括地主阶级的思想。①

毛泽东同志还认为要注意国际阶级斗争对党的影响。

总之，毛泽东同志是从我们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一客观情况出发来仔细地研究党内斗争的根源，同时也考察了社会上阶级矛盾对党的影响，其中包括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党的地位的变化、阶级敌人策略的变化等等对党内的影响。

关于什么是新旧事物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同志未展开论述，从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一些讲话来看，是指同阶级矛盾相区别的另一类矛盾。例如先进与落后，革新与守旧，以及由于所处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对待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所发生的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与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

党内矛盾除了有其社会根源外，还有思想根源。这就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任何人都会遇到这个矛盾，共产党员也不能例外。在实践中解决主客观矛盾时，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正确，一是错误。所谓正确，就是"主观与客观相适合。"②"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③毛泽东同志认为，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是和主观主义相对立的。主观主义错误，不仅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既使一万年以后也总是会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情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局，树木当做森林。④而这种主观性和片面性也就是主观主义。有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由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④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5—946页。

此也说明，党内矛盾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即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反映到党内，不等于党内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因为党与阶级不同，党是阶级的一部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在党员之间，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的组织与党员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一般说来，不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党内发生的矛盾是指在观点、主张、策略、路线等方面存在着思想原则上的分歧甚至对抗。这些分歧、对抗是反映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倾向和要求，而不是说提出某项原则的人，就是敌对分子。所谓党内矛盾是社会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是就它的斗争内容而言，并不是党内存在不同的阶级。至于党内混进来个别敌人和后来蜕化变质成了敌人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这是一种以党内形式出现的党外问题，严格说来，这不属于党内斗争，而是一种阶级斗争，虽然在他们的政治面目尚未暴露之前，这些人还主要以思想斗争的形式进行活动，而我们还未识别他们的时候，一般地说，我们还只能采取党内斗争的方式同他们斗争，但是，一旦确认是阶级敌人，那么斗争性质就应明确，就应该按阶级斗争去处理。

毛泽东同志还认为，党内矛盾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有条件的、可变动的。党内的正确和错误之间的矛盾，在开始时，或在个别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也是如此。因此，为了尽力防止这种转化的发生，“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310页。

二　认真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实现党内团结的正确方法

分析矛盾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毛泽东同志根据党内矛盾的特殊性明确指出："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① 他总结我党几十年的历史经验，尤其是鉴于王明机会主义者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作法所带来的恶果，提出了处理党内矛盾时必须遵循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②），并坚持贯彻。这是对辩证地处理党内矛盾斗争问题的一项重大贡献。

（一）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毛泽东同志一贯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团结。他认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③ 这是因为，团结才有力量，不团结就会成为一堆散沙。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战斗指挥部，这种团结便尤为重要。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④ 而且，实现党内团结是实现阶级团结和民族团结的关键，"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9页。

③ 参见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载《新华月报》1954年第3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501页。

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①] 所以，毛泽东同志通过总结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曾经深刻地指出：“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②]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作为辩证法的大师，他深深懂得，团结与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党内团结不是自然而然地得到，而是通过不断的斗争来实现的。团结与斗争相辅相成，否认团结的斗争与否认斗争的团结都是反辩证法的。

恩格斯说：“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③] 列宁也说：“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把情况弄清楚，不把情况弄清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就不可能有巩固的统一。”[④] 斯大林总结了联共党的三十多年的发展的历史，则更明确指出，联共党自一九〇三年布尔什维克派形成以来的历史，……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党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这当然并不是因为俄国人太好吵架，喜欢争辩，爱闹意见，而是因为“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只有通过为维护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斗争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的斗争，矛盾才能克服。”[⑤]

毛泽东同志完全赞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这些观点，并且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的高度论证了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

（二）党内斗争是实现党内团结的手段和途径

我们讲的党内团结，不是无原则的结合，而是有原则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6页。

②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见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23页。

④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0页。

⑤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96—497页。

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① 这就要求，为了达到团结，必须划清两种界限，一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二是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例如，我们不能同混在党内的敌人讲团结，“象托洛茨基那种人，象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② 我们同混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已经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范围，清除这些敌人是实现党内团结的保证。同时，我们也不能在错误的基础上讲团结。“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③ 团结就是要服从真理，纠正错误。

毛泽东同志认为，党正是在不断进行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只有通过斗争方能分清是非，也方能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讲团结就意味着有不团结存在。而所以要团结，是因为党内并不纯粹，也如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绝对的纯是一样的道理。毛泽东同志说，一只手伸出来，四个指头向一边，大姆指向另一边，这就是不纯，党内也是这样。不仅党内意见分歧时有发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不同倾向的形成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倡导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拿起斗争武器。他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④而这个斗争的武器就是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

基于要形成党内有原则的团结的目的，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出，“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

① 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70 年 9 月 6 日，转引自1972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97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97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30 页。

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① 另一方面，他又提倡在同志之间开展批评，主张思想要交锋，批评要尖锐，思想斗争要中肯。他说："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思想交锋这个办法有两个好处，"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② 毛泽东同志要求批评错误要不讲情面，不怕得罪人，不要把棱角磨掉。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提倡头上长"角"的。他曾经风趣地说："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③

(三)党内团结是开展党内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内斗争是手段，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党内团结，并通过这种团结去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去赢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④ 他曾经把开展党内批评比作医生治病，说："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⑤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强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时，总是又反复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要实事求是。他指出，

---

① 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指示》(1944年5月24日)，见1944年5月31日《解放日报》。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7、156、36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6页。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还说，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还指出，批评要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等等。这些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

（四）对犯错误的同志，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

在研究党内团结与党内斗争的关系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党内同志犯错误和如何去和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搞好团结的问题。因为，“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①特别是团结那些犯了错误包括犯了大错误的人。

历史的经验证明，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来说，错误总是难免的。仅仅就缺乏经验这一点，就难免要犯错误，更不待说其它复杂的原因了。列宁早就说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②毛泽东同志也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圣贤，也还有过嘛！也许上帝不犯错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他。他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③

既然错误是难免的，就要对错误作辩证分析。只见正确，不见错误，或只见错误，不见正确，都是“一点论”，是形而上学。所以，当人们犯错误，在指出他有错误之后，还要指出，他们有许多优点。反之，当人们自以为了不得，头脑发昏时，就要指出他的弱点、错误以及将会带来什么危害，这才是两点论，才是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很注意事物的这两个方面。为此，他特别批评了两种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一是不许犯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是不许改正错误，反而落井下石。

在《学习与时局》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总结了党内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0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页。

开展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骄傲是犯错误的先导，而犯错误又容易否定一切。认为肯定中包含否定因素，而否定中又包含肯定因素，这是一种绝妙的反证。他指出，我党曾有过四次由于大的骄傲而吃了亏的，例如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八年，都是自以为了不得，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肯定一切，成为自己的思想包袱。但是，也不应否定一切。尤其是鉴于历次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从否定别人一切，最后到否定自己的严重教训，毛泽东同志重申，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不可由于某人犯错误，便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他举例说，对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的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策略，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他批评许多同志缺乏分析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是一种思想方法方面的"毛病"。①

成绩与错误也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取得成绩而忘乎所以，导致后来犯错误；错误积累多了，搞不下去，转向反面，即又向正确方面转化。毛泽东同志所举的关于胜利时犯骄傲的错误，已如前述。他又举出错误也可以向正确方面转化。他说过："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②又说："失败是成功之母。"③这同列宁讲过的优点与缺点、失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893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310页。

败与胜利可以相互转化的论断是一致的。列宁说过，一个人的缺点往往就是他的优点的继续，当优点用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便可以变成最严重的缺点。他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①

毛泽东同志还对犯错误是形成正确路线的一个必要条件作了阐述。他说："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②

从人的认识来说，人们总是从对立中间才能求得正确的认识。因此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反面知识给人的教育作用。在这一点上，他自觉地把认识过程的辩证法运用于党的思想建设。他说："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③他还把接触反面的东西比作种牛痘，指出，把病毒放进身体里面，是为取得免疫力。

毛泽东同志还多次劝人们要读鲁迅写的《阿Q正传》这篇小说，不要学假洋鬼子那样，不许革命。而且当时阿Q的所谓革命，并无他求，只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但是，我们党内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347页。

个教训。"[1]他还说，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曰看，二曰帮，只看不帮、幸灾乐祸，是宗派主义的表现。他还指出："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2]

在党内批评与斗争中，还存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相互关系。原则必须坚持，无原则便无革命，无原则便无胜利。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搞无原则让步，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这决不能允许。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又是相反相成的。所谓策略上的灵活性，按照毛泽东同志的理解，要分清原则问题与非原则问题，打击面不可太宽，考虑斗争的条件和时机，照顾到党员的觉悟程度与认识水平，在时机不成熟时要善于等待，以及在认识错误之后给出路等等。毛泽东同志说："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3]他指出："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4]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是"允许"的。在同志之间，毛泽东同志主张："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5]

这里，有一点应当申明，斯大林曾经把党内分歧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原则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另一种是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两者不应相混。他指出，在后一类问题上"可以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1页。

而且应该和党内抱有不同思想的人作各种妥协。”但是，“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间’路线。”①即不能作任何妥协。而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即使在原则问题上，例如清算党内错误路线，在时机不成熟时，也应当作出妥协。至于实际问题的争论就更不待说。

毛泽东同志在党内斗争中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对待党内发生的错误，“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②

由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并且成功地运用了党内“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而且创造出了整风运动这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形式，这不仅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分歧，纠正了党内“左”右倾的错误倾向，而且有效地保护了党内一大批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同志。从而使党的事业，党的队伍大大兴旺与发达起来。

“团结——批评——团结”不仅适用于处理党内矛盾，而且在后来成功地推广于整个人民中间，成为处理人民内部是非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带根本性的原则。

三　反对党内“左”右倾向，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什么是倾向？这是在评价党的方针政策时，所使用的一个特殊概念。它是指在某个时期或某类问题上，对于党的正确的方针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

政策的偏离而言，这种偏离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比较普遍的和有内在联系的东西。

党内常常发生的错误倾向是"左"和右这两种。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毛泽东同志作过如下说明："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①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②而这种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又不可能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即一方面要同"左"的倾向作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同右的倾向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③在党内团结问题上，"左"的倾向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右的倾向是"一潭死水，一团和气"，这都要不得。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一个是离开了团结讲斗争，一个是离开了斗争讲团结，都走了极端，而它们所讲的斗争和团结，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斗争和团结，搞的都是形而上学。

关于在党内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还提出过一个辩证法命题，就是一种倾向常常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倾向的斗争中，首先要善于捕捉主要的错误倾向。但主要倾向不应当抽象地去规定，而是应依据于具体条件的变化具体分析。这种具体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0页。

条件包括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反对错误倾向的历史，也包括革命的深入程度及群众所受锻炼的多少等等。

例如，在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里说："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芦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① 这是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错误倾向转化的适例。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讲到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错误倾向时又说："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② 这又是在某项运动深入到不同阶段时所容易发生的错误倾向的适例。

关于打仗，毛泽东同志又说："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③ 这又是随着革命事业有无成就或成就大小而发生的错误倾向之间相互转化的适例。

这就是说，在反倾向斗争中，必须善于观察事物变化的客观过程，要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及时掌握事物或过程中各种倾向的脉膊的跳动，敏锐地、及时地抓住主要倾向，对症下药，切不可不看时机、条件、重点，而去盲目地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④ 这是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同志不仅强调要善于抓住主要倾向，而且还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解决了反对主要倾向与防止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1页。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1页。

能发生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之间的相互关系。错误倾向的发展同其它一切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一样，是此长彼消、彼长此消的。毛泽东同志说，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王明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他总结了我党几十年的党内斗争历史，指出，在反对右倾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时候，就可能出右。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反右防“左”，反“左”防右。

其所以会有这种状况，除了有事物变动规律这个普遍性的原因之外，也和中国革命队伍里是小资产阶级成份占大多数这一点分不开的。按照列宁的观点，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不定，华而不实，他可以从发狂很快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而且这种错误在特殊的或多少特殊一些环境里，由于意外的原因，总是会以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束，重新表现出来。① 毛泽东同志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里，也剖析过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而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动摇的。他们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悲观起来可以垂头丧气。他们每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分子就是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② 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我们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就是重点反“左”时提防右，重点反右时提防“左”。只有如此，才可能既不会反“左”时愈来愈右，也不会反右时愈来愈“左”。

在反对错误倾向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倾向与派别的划分。

---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3页。

这两个概念，毛泽东同志都使用过，但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从倾向发展到派别，应当作为过程来研究。列宁曾说，倾向是表示人们已经走入歧途，或者开始走入歧途，但还不是完全形成了的东西，还是可以纠正的。①什么是派别，列宁说，这是比较成熟，有固定形态，甚至有组织结构的东西，即"力求在某种程度上别立门户并规定自己派别纪律的小团体"②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在分析党内斗争发展规律时指出，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及至后来，由于种种内部与外部条件的作用，便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了。在这里，他实际上也是要求把党内矛盾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这就是在分析党内矛盾时，必须注意分析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注意党内矛盾发展的过程和阶段。

第四节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中心课题，又是必须用辩证法妥善地处理其各方面矛盾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中国革命进入了这一历史阶段后，毛泽东同志始终密切地注意着这一课题。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里就已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 一九五六年，鉴于我国按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基本完成，全面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同志及时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9页。
② 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3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

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①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比较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个方面的矛盾问题，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虽然，党和毛泽东同志由于缺乏经验和其他原因，致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失误，但不能由此而忽视，甚至否定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应当说，他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今天，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对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　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

如何正确地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是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与坏，影响到国民经济能否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影响到几亿人民生产与生活的妥善安排；影响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失败。为此，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把这个矛盾放在首位，突出地反映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他在这篇著作中，从中国实际出发，以苏联经验为鉴戒，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阐述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依据唯物辩证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原理，论证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②，“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③。为什么重工业是建设的重点？从理论上说，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实际方面说，我国国民经济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7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页。

底子薄，而重工业是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在夺取政权后，在经济建设中，把重工业做为经济建设的中心，而不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以轻工业开始实现工业化。特别是中国重工业落后，钢铁产量极低，机器制造业几乎没有的情况下，优先发展钢铁、燃料、机器等生产资料的生产是极端重要的。这样做也正是依据马克思再生产的理论，即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要求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①

在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还必须看到矛盾的另一个侧面，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指出："……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② 也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重视轻工业、农业的生产，增加投资的比例，加速轻工业、农业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为什么不能忽视农业与轻工业的生产？必须看到，农、轻、重之间的关系既是相互依存又是相互排斥的。从其相互依存方面来看：其一，重工业依赖农业、轻工业提供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毛泽东同志说："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③ 其二，重工业依赖农业、轻工业提供资金。因为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其资金来源不能靠掠夺，而主要靠内部积累，借债也只能是有限的。基于轻工业资金周转快的特点，它能为重工业提供大量资金。其三，农业与轻工业是重工业的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工业要发展，不能靠商品输出，更不能采取资本输出，而主要依靠国内农业和轻工业提供广阔的市场。

从其相互排斥方面来看：重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客观上存在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9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页。

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其一，公有化的程度不同，前者是全民所有制，后者是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其二，生产技术的基础不同，前者是机械化大生产，后者是半机械，甚至以手工为主的生产操作。这种差别，必然存在着重工业与农业生产发展的不相适应，如果不充分重视农业这一头，使人力、物力、财力兼顾农业这一头，势必导致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使农业拖住工业的后腿。忽视轻工业同样会造成上述恶果，诸如资金不足，人民生活资料缺乏等一系列问题，重点也就得不到保证。

由此看来，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依赖重工业为它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反过来，重工业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依赖于农业、轻工业为它提供粮食和资金等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同时并举的原则，正是基于对这一矛盾内在规律性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在要不要抓重点的问题上没有分歧，关键在于怎样抓好重点，也就是如何处理好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是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是，只强调重工业这一头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与作用，无视轻工业、农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因而，采取少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办法，甚至牺牲农业、轻工业的办法去片面突出重工业。另一种观点是，正确地认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的辩证关系，既看到重工业的主导作用，又看到轻工业、农业对重工业促进作用，以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采取的方针应是，用多发展轻工业、农业的办法促进重工业的发展。这两种指导思想、两种方针归根结底表现了辩证法的两点论与形而上学一点论的对立。

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者，把重点与非重点割裂开来加以绝对化，用这种思想指导实践，就会是把人力、物力、财力通通投到重工业方面来。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出现重工业是一条长腿，轻工业、农业是一条短腿，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出现比例失调，从而造成重工业原料不足，农副产品缺乏，生活资料不足，资金缺少，重工业生产的机器等生产资料卖不出去，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辩证法的两点论主张将重点与非重点统一起来，兼顾两头。既看到重点对非重点的带动作用，又看到非重点对重点的积极的反作用。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真想”与“假想”的问题，他指出：“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① 深刻地揭示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了抓好重点，就要注重非重点，这是辩证法两点论的生动体现。

在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苏联曾经有过教训。十月革命后，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坚持以重工业为重点，这是正确的。但在怎样抓重点的问题上曾一度产生过片面性，用少发展轻工业、农业的办法发展重工业。结果出现农副产品缺乏、市场供应紧张、消费品不足等弊病。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我们建国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正确地坚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党内出现了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发展国民经济中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忽视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则，造成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比例失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内乱，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总结三十二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考察，归根结底在于是否真正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还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尊重客观规律，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为了解决好农、轻、重的比例失调问题，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并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就是：先克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基础的位置上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在投资上保证农业重点建设，改变重粮轻牧的观点；认真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实行生产责任制，因地制宜；把发展轻工业摆在重要的地位，增加轻工业的投资，相对减少重工业投资，以轻养重；缩短重工业基本建设战线，调整燃料、动力、原料与工业的比例失调，解决动力不足的矛盾；把钢铁生产的速度放慢，计划数字指标降低；减少现有开工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使重点企业吃饱饭等等行之有效的措施。

只有使国民经济计划反映客观的经济规律，才能使国民经济得到健康的发展。没有按比例，就没有高速度，没有农业、轻工业非重点的发展，就没有重工业的重点，这就是重点与非重点建设的辩证法。

二　国家、集体与个人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否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关系，对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关系极大。

要真正处理好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关系，就必须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去认识和把握独立性与统一性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所谓统一性，就是事物的全局；独立性，就是体现事物的局部的东西。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时说："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① 这是辩证法两点论的杰出运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

用。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必然是为改善人民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只有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反之，人民生活的改善，又进一步激发广大劳动者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上。因此，正确地对待、合理地安排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至关重要。而这两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国民收入，一部分是用于积累的扩大再生产，另一部分用于消费，作为改善人民的生活。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社会进步最重要的职能，因此，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然要增加积累基金，这体现着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累在性质上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是剥削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的积累，则是扩大劳动者消费的源泉。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指出的："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① 因此，在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问题上，应当自觉地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反对把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同志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这个思想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还必须看到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矛盾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安排此起彼消的矛盾，如积累与消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各按排多少为最合适，要多积累，消费就相对减少，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安排不当，经济上就丧失平衡。因此，恰当的安排比例就成为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只是片面地强调经济建设，不顾人民生活，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经济建设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生产而生产，为建设而建设，而是为了不断地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的需求，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坚持积累与消费的统一，就是坚持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统一，这是使社会主义生产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得以显现。毛泽东同志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①这是常识性的真理。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真正做到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兼顾时，国民经济就蓬勃发展，否则，就出现相反的结果。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复教导各级干部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一致性。他在制定财经工作方针时，就突出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思想，反对那种不顾全局利益，只顾局部利益的错误观点；也反对不顾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只强调革命战争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观点。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透彻地阐明革命战争与人民生活的辩证统一。他指出：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这是中心任务。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对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②他并以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为范例，号召大家学习。这两个乡的领导何以为广大群众所爱戴？人民群众何以积极参加？其原因是他们关心群众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建国初期，毛泽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东同志多次强调，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生产的发展，党和人民政府及时地调整了职工的工资，生活设施的建设也受到足够的重视。1957 年与 1952 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 52.1%，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42.8%，消费水平增长 32.5%。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0.9%。这一时期，生产得到了蓬勃发展，人民革命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然而，在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片面强调高积累、低消费，生产指标过高，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受到了很大影响。其结果，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这些教训说明，在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关系上，如果不坚持三者兼顾的原则，必然造成头重脚轻，安排失当，事物就会向相反方面转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同志关于“兼顾两头”的思想得到了恢复，特别是针对前一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对人民生活有所忽视的状况，切实贯彻了陈云同志提出的“把安排好人民生活做为重要的国策”的指导思想，强调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新的局面。

三　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

“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一个基本思想。要真正把国内外一切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正确地处理好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的关系问题。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对待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同志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

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①这条路线和方针体现了内因与外因关系的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问题上的光辉运用。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深刻地阐明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它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它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②这说明，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例如，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引起的。同样，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的传播，使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然而，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生作用，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与可能，是通过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而发生作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也同此理。我们的方针是要把立脚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要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力的原则。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③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

① 转引周恩来同志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9页。

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①党的十二大报告强调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艰苦奋斗。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正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与建设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不仅是我们党的立国原则，也是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一贯倡导并在实践中坚持贯彻的根本战略方针。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不"唯书"、不"唯上"，而"唯实"，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坚决抵制和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形而上学的外因论，从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③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明确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独立自主原则，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在军事上，则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一九四二年，为了战胜顽敌与克服困难，我党又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并号召广大军民认真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反复阐明："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7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78 页。

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①在建国后，毛泽东同志仍然强调要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并依靠这个方针，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与禁运，迅速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指导革命与建设行之有效的根本战略方针。

毛泽东同志不仅阐明了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且阐明了事物的外部矛盾也是事物发展的重要原因。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于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如果否认外部原因、外部条件的影响和作用，那就割断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陷入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因此，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必须把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辩证地统一起来。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为，不依据本国的情况、不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社会主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而没有独立的经济实力，就不可能有独立的政治；另一方面，又要实行对外开放，向外国学习。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②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要积极引进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特别是有助于企业技术改造的先进技术，努力加以消化和发展，以促进我国的生产建设事业。”③实践已经证明，并仍将继续证明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并丰富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

在对待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一概照搬的教条主义和奴隶思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6页。

想；另一种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排外主义。这两者都是把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代替辩证法的两点论。前者，对己妄自菲薄，对外是崇洋媚外。后者，对己是夜郎自大，对外是一概排斥。毛泽东同志运用两分法，分析矛盾着的两个侧面，指出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正是由于各自有长有短，因而才需要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而要分析批判地学，就是学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合乎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办企业的效率等等。对于那些资产阶级腐朽的制度，反动的上层建筑、颓废的、腐败的思想文化和思想作风，不仅不能学，还要抵制和批判。学习外国，不仅要敢于学习，而且要善于学习。要认真地分析各个国家和民族长处和短处，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

总之，中国与外国矛盾双方都各有长有短，这是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应当运用辩证法去正确地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关系，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服务。

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中，还运用辩证法对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等等，作出了精辟的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论列。

毛泽东同志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①他最后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第五节 工作方法中的辩证法

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是共产党人如何应用科学方法于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二者一致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用哲学去解释世界，而在于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在世界观上的意义，同时，也总是十分重视唯物辩证法在方法论上的意义。

恩格斯曾经把唯物辩证法称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①列宁在评价唯物辩证法时也指出：“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②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的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他并且说，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工作方法的实质是思想方法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正确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一贯注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在民主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所面对的革命任务极其复杂，所管辖的地区广大而分散，所领导的部门和方面又极为繁多。由于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特别讲究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分同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这对革命的发展妨碍极大。因此，毛泽东同志说："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又说："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①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发出了"注意工作方法"的号召。他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②对于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③这里毛泽东同志对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共产党人应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方法作了生动而透彻的说明。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了反对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我党领导工作的经验，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件。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126页。

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更加注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他反复提醒大家："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①在1958年初，他集中了我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针对1958年革命和建设中的"左"的倾向，在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又讲了工作方法，指出：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毛泽东同志还在许多会议的讲话和文件的批示中，结合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出过许多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内容十分丰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前面讲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处理问题等都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里主要介绍一些由这些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所派生出来的一些具体方法。

一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

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根据辩证法的这一原理和实际工作的经验，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他进一步指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任何工作时必须采用的方法。他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6页。

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①这就深刻阐明了工作方法中的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

一般是从同类个别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共同本质，是共性。它对同类事物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一般的普遍号召，可以使领导的意见、方针、政策能迅速地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可以广泛地普遍地动员群众。

否认一般号召的作用，而满足于狭小范围和部门的个别工作，这是一种手工业方式的狭隘经验论。否认一般的指导作用，就会在实际工作中迷失方向，“左”右摇摆。毛泽东同志曾尖锐地指出，在执行党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时，切不可忘记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如果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那将成为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

然而，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然后再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事物。因此，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就要求领导人员善于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从个性中找出共性。凡属正确的一般号召、方针、政策、口号，都只能从个别指导中取得，从许多个别单位的具体经验中概括出来。坐在办公室里主观主义地发号施令，凭想当然决定和处理问题，或者根据未加详细审查的书面报告作结论、发指示，是必定要犯瞎指挥的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②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切革命工作。

但是，一般号召产生之后，还必须回到个别指导中去进一步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检验、丰富和发展一般号召，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离开个别指导，不仅无法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不仅不能丰富和发展一般号召，而且也会使一般号召失去具体的丰富的内容，变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空洞的抽象的口号和公式，因而也就无法进行普遍的指导。一切带有普遍性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一般性的东西。既使那些正确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东西，也只能成为我们研究具体事物的向导和指南，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仍然要从特殊开始，而不能从一般开始。一般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指导我们去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代替我们去进行这种分析。

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对上级指示、先进单位的经验采取照抄照转照搬的做法。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义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①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在一些单位所以不能很好地落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一般化、形式主义、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和懒汉思想在作怪。有鉴于此，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要独立思考。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一味跟着别人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曾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胜利，是独立思考的胜利。

为了反对机械地形式主义地照搬、照抄上级指示的错误做法，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深入实际，进行个别指导。他说：“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②他建议并号召中央和省、地、县委的领导同志要定期（在半年到一年内）亲身研究一个合作

① 《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便指导全面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在没有取得具体经验以前，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点上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的向前发展。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一般号召要与个别具体情况相结合，依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例如，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他指出要依各种不同的地区，而采取不同的方法，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具体时间、地点、条件解决问题”。①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依据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②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他特别强调在不同的地区实施土地法时采取不同的策略，必须根据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的强弱采取有步骤、有区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以防止“左”的急性病。

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工作其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总有先进、中间、落后这三种情况。先进和落后总是少数的，中间状态总是多数。在实行个别指导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抓好先进和后进两种典型，以带动中间。抓先进，一是可以总结好的经验，做到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使中间和落后学有榜样，推动全面工作。二是可以使先进更先进，从而推动整个面上的工作不断前进。抓落后，就是要分析落后的原因，促使它转化为先进。落后转化为先进对原来是中间和先进的部分也是一种促进，而落后转化为先进的具体经验，对中间和先进也有很大的启发。这样，抓住了先进和落后这两种典型，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所以在领导工作中，在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时，应实行“抓两头，带中

---

①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 1948 年版，第 75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1 页。

间"的领导方法。

根据要善于找出主要矛盾的原理，毛泽东同志在实行个别指导时曾经提出了"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他认为，"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为了认识麻雀，并不须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只要解剖几只就够了。要了解社会，只要深入了解一、二个农村、工厂、商店、街道就够了。同时，他又强调在实行个别指导、抓典型时，要注意所抓的个别是否有典型意义，所总结的经验是否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要区分哪些经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哪些则没有。切不可将某些片面的、局部的、甚至是错误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而拿到面上去推广。要防止把某一具体经验绝对化。在推广典型经验时，同样也要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把这种工作方法叫"一切经过试验"。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反映了客观世界本身以及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过程中，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领导方法的组成部分。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都必须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即"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这样无限的循环往复，使领导和群众的认识与实践不断地进到高一级的水平，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可以随之而不断地向前发展。

二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同志在提倡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主张的同时，又提倡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方法，认为这个方法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时都必须采用的方法，都不能违反的原则。

党和毛泽东同志向来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还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①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在土地改革和整党的伟大的群众斗争中，教育了和产生了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联系群众的，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可宝贵的财富。”②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说过：“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③又说：“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④

然而，问题的重点在于怎么样才能保证实行正确的领导呢？这就要求领导不能脱离开群众，而必须和群众紧密结合。

对于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有过很多论述。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里还专门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希腊神话里面有个无敌的英雄，叫安泰。他在和任何一个敌人决斗时，当遇到困难时，只要依靠着大地，就有无穷的力量，并一次次取得了胜利，成为无敌的英雄。但是后来敌人知道了这一点，就设法把他提到空中，结果就被掐死了。斯大林用这个故事说明，共产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也有过许多论述。他曾经把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的关系、游泳者和水的关系，比作种子和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2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7页。

土地的关系，比作刘备和孔明的关系等等。他用这些比喻反复说明一个意思，就是领导者不要害怕群众，不要脱离群众。

无数的经验说明，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厂，这个加工厂所需的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而这个加工厂制出的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他曾经这样说过："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了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①

在工作中，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发扬两方面的积极性，"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②

在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时，毛泽东同志还强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领导者要和多数群众相结合，一个是领导者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和造就。

因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③又说："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1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853页。

的观点。"①在这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都是错误的。

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领导者和群众的组成也不可能固定不变。"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② 这种思想也体现了工作方法中的辩证法。

三 "弹钢琴"——抓住中心，兼顾一般

列宁曾多次指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中的特殊环节，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③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运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原理，提出了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发展了列宁的上述思想。他把这种工作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弹钢琴"。

毛泽东同志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④又说："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⑤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在领导工作中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49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③ 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71—372页；第3卷，第526页。

④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6页。

切忌不分主次、轻重、缓急、先后，平均地使用力量或乱碰乱抓，造成很多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在工作中不分主次地平均使用力量的工作方法，是一种否认矛盾不平衡性的形而上学方法。

每一地区和部门的中心工作的确定必须依据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而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无疑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但各地的情况不同，具体的中心工作也有所不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里指出，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经济与教育成为大多数人的中心工作，第一位的工作。边区的党、政府、人民做好了经济工作，就是极大地支持了抗日战争。他批评了轻视经济工作而空谈抗日与革命的错误倾向。又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但在已经进行了土改的老区和已解放了的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就成了中心任务。由此可见，领导要善于依据每一地区和部门的具体情况，分析各种工作在其总的任务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地找出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和安排好工作秩序，切不可根据某种刻板的公式到处套用。

中心工作是各种工作中带关键性的工作，抓住了中心工作，就能把握住整个链条，抓住全局，并以此带动其他工作，做到"纲举目张"。因此，领导应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能带动全局的中心工作上。领导对全局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又是相关联的，中心工作可以带动其他工作，其他工作反过来也可以促进中心工作。所谓抓紧中心工作，当然不是说可以放松其他工作，而是要围绕中心工作，有步骤地开展其他工作。例如，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党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可以放弃其它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配合，武装

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相配合，革命就会失败。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① 领导工作决不能只抓中心工作，而忽视或放弃其他工作。各方面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工作而把别的丢掉。把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对立起来，只抓中心工作的单打一的工作方法，同样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工作方法。

"弹钢琴"的工作方法还有一个适时地变换曲调问题，即要求我们注意中心工作和非中心工作在一定条件下的转移。弹钢琴不能老弹一个曲子，而新曲子对老曲子来说，就要变调，变主旋律。对于工作来说，也是这样，由于情况的变化，原来是中心工作的后来不再是中心了，而原来处于一般工作中的某一项工作倒成了中心工作。这时就要变，就要不失时机地实行工作中心或叫着重点的转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而一九四九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领导全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由乡村变为城市的转移。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必须记取的严重教训。

为了避免抓了重点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片面性，毛泽东还提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土洋并举。又如，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劳逸结合；大集体与小自由结合；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等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发展。

四 胸中有“数”——注意量和质的对立统一

任何事物都是数量和质量的辩证统一。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要正确认识事物，不仅要认识事物的质，而且要认识事物的量，从质和量的统一上加以把握。毛泽东同志运用数量和质量辩证统一的原理指导革命斗争，提出了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他指出：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①就是要注意量和质的对立统一。

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不仅注意敌我军队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而且十分注意数量上的多少变化。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有关指挥战争的文章，用较多的篇幅列举有关敌人兵力的各种统计数字，分析敌人兵力分布情况，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的战略战术，规定一定时期的歼敌数量。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程度等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对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的多少，各有多少土地，以及各阶级、阶层对土地革命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中 间 的 有 多少等等，都有一个明确的数量统计的分析，然后根据这种分析，制定出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见，在领导工作中，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注意他们的数量方面。

同一事物的数量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对每一个具体事物来说，都有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数量关系是基本的、最能反映事物的性质的。因此，正确认识事物，不仅要认识事物一般的数量关系，而且要从一般的数量关系中找出基本的数量关系，即要“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①毛泽东同志紧紧抓住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十这两个百分比，详细地论述了这一基本数字如何规定和产生了我党的战略、策略和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他还谆谆告诫全党，谁要是忽视了这一基本情况，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这说明，掌握事物的基本统计和百分比，对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并据以制定正确政策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在把握事物数量关系时，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要“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所谓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是指一事物转变为另一事物的关节点。超过了这个数量界限，事物的性质就起了根本变化。所以把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对于划清事物的界限，掌握从一事物转化为另一事物的规律十分重要。在土地改革中，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界限。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土改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有剥削收入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8页。

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①有了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数量界限，这就划清了中农和富农的界限。这对克服和防止土改政策中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路线有重大意义。在实现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划清界限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第十二条中就指出要“划清两种界限”，即“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他指出：“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②

胸中有“数”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③

五　留有余地——把握需要与可能的辩证法

针对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高指标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特别说明了留有余地的工作方法。他说：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不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后来他还说过：“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④这就是要掌握需要和可能的辩证法。

所谓留有余地，是指我们说话，写文章，办事情，订计划时，不要把话说死，把事情做绝，不要满打满算，而是要留有回旋的余地，留有机动数。俗话说的要有后手，也就是留有余地的意思。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④ 转引自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在订计划，办事情时，为什么要留有余地呢？

这是因为：第一，客观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是十分复杂的，会受到诸种因素的影响。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事先预想不到的因素。如果事先不留有余地，不考虑事物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原来的任务、计划、方案就有落空的危险。

第二，由于受客观事物发展进程的限制，和人的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人们的认识、计划、方案、办法，总不免带有某些缺陷、不完善、不精确。留有余地，就使得人们在实行的过程中随着情况的变化和认识的完善深入，能及时地修订、调整原有的任务、计划、方案，使之立于主动的地位。

第三，留有余地，可以使我们的任务、计划兑现，这可以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主动，提高党和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誉。留有余地，让群众超过原定的任务、计划，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群众的称赞，而且可调动和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如果订计划，办事情，不留有余地，满打满算，甚至超过了实际的可能，在执行过程中，便容易出现浮夸、说假话、强迫命令等不正之风，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一旦完不成计划，又造成悲观失望。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在订计划时，一定要谨慎些，给下一级留有余地，给群众留有余地，这也是给自己留有余地。这是因为，留有余地不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也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声誉、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的政治问题。

留有余地的工作方法体现了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主观需要和客观可能相结合。留有余地决不是右倾保守。右倾保守是指本来能办到的事不力争去办，在困难面前束手束脚，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任务愈小愈好，指标愈低愈好。而留有余地是在对客观情况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以便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当然，留有余地，也有一个度。不留有余地，超过了实际的可能，那是

"左"。使所留的"余地"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把本来能完成的任务降低，那就成了右。

留有余地，是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留有了余地，取得了成功。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由于"左"倾思想作怪，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留有余地"的工作方法并没有真正实行。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除了上面谈到的五种工作方法之外，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多谋善断"、"波浪式前进"等等工作方法，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为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更为广泛的、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完整的方法论的体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一系列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不应看作马克思主义工作方法体系的彻底完成，更不是要人们机械地去搬用。它还要和新的实践相结合，并要在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列宁曾经说："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板公式和想由上面规定一个统一办法的企图。"①又说："方式愈多愈好，共同的经验也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②但是，必须坚定地承认，党和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所包含的许多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的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过去是，现在和将来仍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方法论原则。谁违反了这些被实践反复证明确切无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谁就肯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9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400页


2 020 3907 0

定要犯错误。重视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这一切积极成果，并且沿着正确方向去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